

A5930

## 目 录

### 回忆录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刘志坚 (1)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回顾

..... 马文瑞 (45)

### 人物介绍

刘少奇视察黑龙江林区..... 元仁山 王正清 (71)

### 专题资料

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 通信兵史编审委员会 (84)

陕甘宁边区文艺概观..... 苏一平 艾克恩 (120)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回民支队..... 魏福凯 (150)

平津战役中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潮..... 俞 悦 (17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京(北方)区委同

冯玉祥的联系.....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滇军的工作

..... 蒋文中 (205)

《 大 事 记 》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  
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建国后视察黑龙江  
活动年表 ..... 龙 言 (220)

《 小 资 料 》

卢福坦其人 ..... 陆友山 (243)

#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产生前后

刘 志 坚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sup>①</sup>。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出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任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加并了解这次“座谈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

---

<sup>①</sup> 《红旗》1967年第9期。

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 一、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起，经过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上当时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影响，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后十条”，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11月，有人向中央报告，“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1/3的问题，而是不止1/3的问题。”1965年1月在制定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在九十月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如果中央出了

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2月，由于林彪等人制造了罗瑞卿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要夺权），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并考虑防“政变”问题。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问题的发端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他写条子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接着江青发难，她于1963年5月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点名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掀起了文艺界的公开点名批判运动。9月到11月间，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多次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对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示，说：“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

示》之一)。根据这个批示，1964年4月，文艺界进行整风，检查问题。5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正在修改的时候，江青得知，硬把这个报告草稿要去送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二）这个批示引起了更大震动，文艺界不得不再次整风，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检查问题，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8月，康生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认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借此机会，大施淫威，任意捏造罪名，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一些尚在讨论中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文学主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理论”。对文艺界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很快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相互影响，“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党内有人认为如果说全国有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文艺界还

要超过 1/3，有的单位已经发生了“夺印”的问题。一些文艺作品被无中生有地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从 1962 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1964 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开始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 年 2 月，在上海，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未同中宣部打招呼即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彭真等人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对批判进行了抵制，中央内部分歧加深。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文艺领域的批判，成了完全政治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还是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还设法对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对批判运动也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 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她极力插手党的文艺工作，尽管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特殊

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他们批《海瑞罢官》，遭到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1962年底，江青以蹲点为名，到北京京剧一团搞所谓京剧革命，遭到北京市委抵制。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在会演总结时，周扬针锋相对地指出：“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本身也是对的。”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拒绝。于是江青只好到上海找张春桥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



攻他们。”<sup>①</sup>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求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二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 二、“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谈。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

---

<sup>①</sup> 《为人民立新功》。

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部长的谢镗忠还正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肖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象“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好的作品，有的经毛主

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

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16日至20日为一。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

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两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

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sup>①</sup>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

<sup>①</sup> 这封信1951年在《戏剧报》上发表过，当时题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作者的信》，其中还有一段话：“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此次，这一段没有了，题也改了。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追记”，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 1、自我吹嘘，抬高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

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象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 2、吹捧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 3、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 24 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 17 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 4、攻击、诬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



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攻击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我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象《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攻击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还攻击、诬陷周扬、夏衍等同志，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还诬陷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攻击文化部不象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 5、指责和否定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看一部电影就否定一部，无端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

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也横加指责，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个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对江青上述谈话，我们4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她的恶毒用意，认为主要精神主席在“两个批示”中都讲过。我只是感到江青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否定过多”。我们4人在吃饭时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对江青说八一厂“组织不

纯”，“部队文艺方向上也有问题”等也有意见。我还感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对江青反对写中间人物也有看法。我在2月10日休会回北京后，11日上午即向肖华（当时肖劲光也在坐）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我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我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肖华、肖劲光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肖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总之，整个座谈，主要是看电影和江青“一言堂”的谈话。

### 三、“纪要”的炮制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样稿，反复修改达

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肖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

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艺术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

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3、“在 1967 年 10 月 1 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

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

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 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 30 份。当时我们 4 人还研究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 月 21 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 日下午，我们一行 6 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 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

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肖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象《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

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 1.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把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2.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席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

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 24 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 15 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 15 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三十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

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

6.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sup>①</sup>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

<sup>①</sup> 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sup>①</sup>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10日上午，我同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

---

<sup>①</sup> 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11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三十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日修改完毕，15日我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在第一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增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sup>①</sup>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

---

<sup>①</sup> 江青 1966 年 3 月 19 日给林彪的信。

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



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

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

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

要”就最后定稿了。

####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

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

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

《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 10 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 年 1 月 4 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 年 5 月李曼村、谢镗忠也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79 年 3 月 26 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作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5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 1979 年 3 月 26 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 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

这样，那个由江青策划，以不寻常的方式召开的所谓座谈会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恶劣作用的“纪要”，最终被党和人民彻底否定了。

## 五、历史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座谈会”召开和“纪要”产生的介绍，联系“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可以使我们从认识中认识一些问题：

1.“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利用的罪恶阴谋。

如前所述，“座谈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党和国家面临内乱的急风暴雨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此时，文艺战线形势紧急，总政党委和我们这些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根本无意开什么座谈会。而党内的正义力量对“左”倾错误的抵制，使江青感到需要借用林彪的力量。她曾经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膨胀。他长期揣摩“登龙术”，以“大拥”“大顺”、“得一人得天下”为“总诀”，千方百计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当江青想利用林彪的权力时，林彪也想到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两个野心家互相勾结、利用，结果就产生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

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费苦心的。又如，江青既想通过“纪要”反映她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和观点，又不想用她个人的名义，而要用部队的名义；她既想通过“纪要”吹捧自己，又不愿话出己口，而要用他人的口来说。所以她不满意我们4人写的、记录了江青“指示”的“汇报提纲”，只好请能领会她的意思的陈伯达、张春桥来进行修改、加工，炮制出了江青满意的“纪要”。

2.“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纪要”的内容是同意的，有一些重要观点，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毛泽东对“纪要”的三次修改都是认真的、字斟句酌的。他在许多地方删去了歌颂自己的词句，但却保留了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

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和他后来多次所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甚至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同他认为“全国基层有 1/3 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也是一样的。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理论的发展。他早就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小说《刘志丹》和《海瑞罢官》的所谓问题，加深了他的错误认识。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就是“纪要”所反映的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心。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说法，不但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也否定了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胡乔木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及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

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sup>①</sup>

### 3.“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如当年《红旗》一篇社论所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sup>②</sup>“纪要”确实起到了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煽风点火、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作用，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座谈会”以后，江青立即插手军队文艺工作，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刀。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60多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把一些对“纪要”提了意见，有过不满、怀疑，或者在讨论时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

①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② 《红旗》1967年第9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各部门和许多地方文艺单位，都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来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而军队文艺工作者，则成了“纪要”的第一批“罪犯”。不久，参加过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我和李曼村、谢饒忠也被打倒。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双百”方针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整个文艺领域“万马齐喑”。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推动下，很快蔓延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由此而来的是，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被全盘否定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人物”，一大批文化战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被“全面专政”。进而掀起了文化战线的夺权狂潮和所谓“斗、批、改”，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纪要”的错误不是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集中反映。它是江青、林彪政治阴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我和许多有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下，未能认识它的危害，直到自己被打倒，才开始认识到江青的阴谋，认识到文艺领域“左”倾错误的危害。今天回顾和研究“纪要”产生的历史过程，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深刻的教训。

# 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 党的建设的回顾

马 文 瑞

陕甘党组织是在大革命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党的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始终坚持斗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陕甘党建立初期，党员成份主要是中小知识分子，大部集中在中、小学校，只有少数农民党员。党的活动主要在城镇，在一部分农村中也开展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逐渐由城镇转入农村，在一些农村发展了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1931年以后，大批党员由秘密活动转到搞武装斗争，组织起游击队和红军，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特别是1934年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经两个苏区党组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红二十

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今志丹县）、靖边等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35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扩大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是两位杰出的领导人，有着卓越的贡献。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消灭了第三次“围剿”西北红军和苏区的部分敌军，取得重大的胜利。正当这个紧要时期，苏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被逮捕，使这个全国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幸而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这时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挽救了危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会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一仗，消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和一个团，最后粉碎了蒋介石的这次反革命“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进行了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陕甘宁边区。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各项政策，取得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里，我着重回顾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历程。

##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概况

### （一）边区党领导机构的组织沿革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发展，陕甘宁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发生了变化。1935年冬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将原来的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省委。同时，在关中、神府、三边、伊盟等地区设立了特委和工委。1936年夏，在红军西征期间又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1936年冬“西安事变”后，重建了地下党陕西省委。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后，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边区党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先后将陕北、陕甘、陕甘宁省委撤销。各地党组织统一由边区党委领导。边区党委下设地区党委（以后又称分委）和分区党委。陕北分设为两个地区党委，一个是西地区分委，辖靖边、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今富县）等县委和蟠龙区委。另一个是东地区分委，辖清涧、绥德、固临、延长、延川等县委。1937年冬将这两个分区党委撤销，所属各县委直归边区党委领导。陕甘宁分区党委，辖定边、盐池、赤安、环县、曲子、华池、固北等县委。1938年春，将陕甘宁分区党委分设为庆环分区党委和三边分区党委。庆环分区党

委辖环县、曲子、华池、固北等县委。三边分区党委辖定边、安边、盐池等县委。关中分区党委辖淳耀、新正、赤水、新宁等县委。1938年春成立了绥德警备区特委（后改称地委），辖绥德、米脂、清涧、葭县（今佳县）、吴堡等县委。1938年7月间，将庆环分委与陇东特委合并，改名为陇东地委，除原属环县等四县委外，增辖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委。1940年10月，中央把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西北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西北局下属五个地委，即关中地委、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延属地委、陇东地委。当时的陕西地下党工作归关中地委管，甘肃地下党工作归陇东地委管，宁夏地下党工作归三边地委管。

1941年春，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县委，基层组织已遍布边区广大乡镇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着54000多名党员。这时，边区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是：

直属县委：延安县委 延长县委  
延川县委 固临县委  
甘泉县委 邠县县委  
安塞县委 保安县委  
安定县委 靖边县委  
延安市委  
关中分委：赤水县县委 淳耀县委  
新正县委 新宁县委

三边分委:	定边县委	盐池县委
陇东分委:	庆阳县委	镇原县委
	合水县委	环县县委
	华池县委	曲子县委
	固原工委	
绥德分委:	绥德县委	米脂县委
	吴堡县委	葭县县委
	清涧县委	(1942年后增设子洲县委)

神府分委

洛川特委

伊盟工委

## (二) 边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数量、分布状况

1937年5月边区党委成立时：原陕北省各县共有60个区委325个支部（包括61个机关支部），党员13679人。原陕甘省各县共有19个支部，党员1844人。原陕甘宁省各县共有党员2960人。神府地区各县共有64个支部，党员3400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19个支部，党员1866人。到1937年9月，边区共有156个区委，585个支部，32418名党员（1937年5月、10月统计）。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将要开始时，延属各县共有79个区委，503个支部，党员21566人。陇龙地区各县，共有34个区委，331个支部，党员5844人。绥德地区各县，共有48个区委，275个支部，党员7802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20个区委，68个支部，党员3976人。神府地区各县，共有6个区委，81个支部，党员2594人。

三边地区各县，共有 14 个区委，68 个支部，党员 1846 人。以上总计，共有 200 个区委，1789 个支部，43628 名党员。加上边区一级（机关、学校）党员 2599 人和军队中党员 8597 人。此时边区共有党员 54824 人（西北局组织部 1941 年 10 月统计）。

1945 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绥德地区各县共有党员 10514 人（其中男 9915 人，女 599 人）。关中地区各县共有党员 3131 人（其中男 2994 人，女 137 人）。延属地区各县共有党员 16628 人（其中男 14666 人，女 1962 人）。陇东地区各县共有党员 5051 人（其中男 4951 人，女 100 人）。三边地区各县共有党员 4021 人（其中男 3934 人，女 87 人）。边区一级（机关、学校），共有党员 2850 人（其中男 2334 人，女 516 人）。以上边区地方党员（不包括军队中的党员），总计 42195 人，其中男 38794 人，女 3401 人（西北局组织部 1945 年 3 月统计）。

关于边区党员成分、文化程度、年龄、党龄等，在 1945 年春的情况是，在 42195 名党员中，就出身成份而论：工人 952 人，雇农 2598 人，贫农 26632 人，中农 7563 人，富裕中农 77 人，富农 785 人，地主 466 人，商人 313 人，资产阶级 39 人，小资产阶级 373 人，其他 320 人，不清 2077 人。就文化程度而论：留学外国 23 人，大学 331 人，高中 581 人，初中 1563 人，高小 1842 人，初小 2686 人，稍识字 6196 人，文盲 23781 人，不清 5192 人。就年龄而论：25 岁以下 4209 人，25 岁—45 岁

28026人，46岁以上4747人，不清5213人。就党龄而论：1927年以前403人，1928年—1936年14652人，1937年—1945年19838人，不清7302人。

## 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党组织自建立以来，经历了秘密的与公开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斗争，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获得比较丰富的革命经验，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形成了边区党的强有力的骨干，担负起艰巨的工作任务。边区党和政府以及地方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大都是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出来的。到1936年，全边区的党员人数已有14000多名，党的组织也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但那时党员的流动性还很大，党的组织还不健全，党的生活还不经常，党的教育还很薄弱。

在抗战八年期间，陕甘宁边区虽然一直受战争的威胁，日寇多次对我河防发动进攻，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对我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不断对我边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但它与敌后其他根据地相比，毕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处于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这就使边区党有条件有可能比较扎实地加强党的建设工作。抗战期间，边区党的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到1939年，是大发展阶段，侧重于组织建设。1940年到1941年是巩固党的

阶段，侧重于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育。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进入了普遍提高的阶段。

1937年5月2日至5月15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同全国党代表会议合并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284人，其中，苏区地方代表120余人，红军代表70多人，中央一级机关代表20多人，列席代表74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具体组织下进行的。张闻天在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苏区党的任务就是要“使特区（当时苏区改称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并指出：“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存在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张闻天选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在结论中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

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边区党的建设，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对我们现在整顿党风，该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啊！

毛泽东报告后，会议按苏区和白区分别举行，博古在苏区的代表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问题》的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逐步撤销陕甘省委、陕西省委和陕甘宁省委，成立特区（后改称边区）党委，各地区党委归边区党委统一领导。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已有党员 32418 名。此后两年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到 1939 年底，党员发展到 54000 多名（包括军队中党员 8000 多名），在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中，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党的各级组织按照中央的规定，建立起工作制度，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生活也逐步纳入正规。党洗刷了一批自首分子、腐化分子和堕落分子，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选拔了一批新干部，提高了一批老干部，党的干部队伍加强了。尤其是党员干部开始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自己在 1937 年 3 月到 8 月，在抗大二期四大队学习了五个多月，受到很大的教益。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抗大的教育工作，他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

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负责人亲自到校讲课。毛泽东同志讲的《辩证唯物论》对大家的教育最深刻。他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二三个小时，从三月间讲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四个多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大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后来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期讲授的《辩证唯物论》的一部分。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70人，其中地方代表122人，军队代表44人，工厂代表4人。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紧要时期召开的。这时国民党的投降、分裂与倒退已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向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八项决议，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会，高岗当选为书记。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重要报告。他讲了群众工作问题和党的工作问题。他指出“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要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边区的老干部很多，是我们的骨干，但他们的文化



程度低，有的字也不会写，书也看不懂，所以要下决心学习。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第二，要提拔新干部和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特别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工农干部应和知识分子干部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三，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第四，要纯洁干部队伍。他还讲到党的支部要做群众工作，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应当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这样才能使党变为群众的党。如果党是一个光杆子，那就不成为党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对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这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主要关键。并且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大会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认真的学习，努力的学习，谁学得更多更好，谁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好的拥护者。这次大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大会之前，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巩固党的决定，其中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知识教育。所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般地没有发展党员，党的建设的重点放在组织党员首先是干部的学习

上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大会的决议，边区党委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教育。

在干部教育方面：（一）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二）扩大和提高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三）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下级干部训练班。（四）有系统地认真开展在职干部的学习，实行中央号召的每日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在职干部的学习大致可分为四类：甲类，有相当文化理论的老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革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老干部，先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文化课与党建课同时并进。文化课必须提高到能够阅读普通书报，党建课学完后学中国革命问题。

在普通党员教育方面：（一）由县委直接帮助区委，到乡上办理党员训练班。（二）由边区党委供给适合的教材，主要内容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三）从边区干部中和小学教师的党员中选择训练班的教员。

在提高党员文化方面：（一）有计划地在短期内改变区级以上干部不识字的情况。（二）动员支部中所有党员参加当地的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经过两年的学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第一，区以上干部不识字的现象基本上克服了，大多数原来是文盲的干部，能够看报写信了。

第二，党员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了，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党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第三，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有了一定的改进。

但是这个期间内，党内还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在一部分同志中还相当浓厚，不少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从根本上说，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遗毒还没有肃清。这些问题，在1942年整风运动普遍展开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 三、广泛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运动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与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提高了路

线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这次整风运动，在边区党的历史上，在边区党的建设上同样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一）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

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开始发动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五个系统进行，即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决定》之后，4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下设边区党和民众团体系统、边区政府系统、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三个分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初期，西北局规定，各单位的整风学习一律由行政负责人兼任该单位学委会的主任。党的组织，尤其是各支部，必须切实地保证整风计划的实现。支部的一切活动，必须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中心。支部与行政负责人及各单位学委会，必须密切配合，搞好整风。凡属参加整风学习的机关干部，部队排以上干部，各校师生，根据文化程度高低、工作经验的多少、党龄的长短，成立三类学习小组，每组10人左右。甲类多是领导干部，乙类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丙类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甲、丙类人数较少。陕甘宁边区一级参加整风学习的有2000人左右，组成200多个学习小组。

## (二) 整风学习的过程和收获

整风学习的过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是克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终肃清王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正确路线下团结和统一起来，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必要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在认真学习领会整风文件精神 and 实质的基础上，对照检查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毛病，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边区整风运动的步骤，与中央一级单位基本相同。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准备阶段，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的右倾错误后，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边区党组织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第二阶段，是高级干部学习中央文件，初步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第三阶段，是普遍整风时期。这一时期又大致分为普遍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整风五个阶段。第四阶段，是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时期。

普遍整风从1942年4月开始，至1943年3月前后结束，历时一年。

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局规定，边区一级各机关要切实执行上午不办公，所有干部一律参加学习；高级干部除自身学习外，都要参加中级干部的讨论会，各单位负责干部，都应积极领导学习，及时解答学习中的问题。4月21

日，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举行边区整风学习动员大会，2000多名干部参加，任弼时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在会后3个月内，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宣部规定的22个文件学好，并就整风的目的和计划作了说明。大会以后，学习整风文件就成为干部学习的中心内容。6月2日，边区系统总学习委员会召开了各单位学委和学习小组长的联席会议，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学习的成绩和问题。会议认为，全党这样热烈的学习文件，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领导学习，都是空前的，学习已收到一定的效果，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学习中的主要缺点是：咬文嚼字者多，发挥中心思想者少。有的就文件讲文件，而不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反省；有的进行反省也只是轻描淡写，或者只谈别人不谈自己；有的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应当“脱领导同志的裤子”；有的认为学完22个文件，就算完成了整风任务。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整风的意义，明确指出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议要求各学委和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要自己反省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精神，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只有这样，才利于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学习，与中央直属系统采取同一步骤，延长了学习时间，学风、党风、文风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学习。在学习掌握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检查。

首先是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在检查中，大

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每个同志都写出思想总结，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检查，经过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反复进行修改。这种自我检查的过程，实际上是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改造思想作风的过程。

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检查。大家根据整风文件精神，对本单位的工作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共同分析原因，研究改进的办法。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在延安的机关、团体、学校中，在山上山下河畔村边，在大家住的窑洞里，人们都在谈论整风，整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在大小会上，大家以满腔热忱，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正形成了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延安各系统学委会经常互通情况，介绍经验和问题，推动运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学委会除了抓紧学习文件，自我检查这个中心环节外，还就学习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问题，组织大家展开热烈的争论。例如：关于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个人工作兴趣和党的需要的关系问题；科学工作、文化工作同马列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批判反动言行和发扬民主的

关系问题；坚持党性原则和发挥个性的关系问题；个人前途和日常平凡工作的关系问题；技术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问题；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问题；等等。有些单位用十天半月时间集中讨论这些问题，并吸收其他单位同志自由参加辩论。会议上各种不同意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达到比较一致的认识。

在整风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成为整风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当时延安的报纸对上述争论问题和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事迹做了大量的报道，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社论和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边区一级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局向各地党委所发的指示中对各地、县的整风运动也做了全面的部署。边区所属的各分区、县、区干部和学校师生等共有 10000 多人。他们处在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工作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对全边区的工作影响极大。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武器。各分区、各县从 6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组织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 22 个整风文件。西北局于 5 月 23 日又发出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将学习整风文件作为 1942 年下半年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并以领导整风学习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经常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干部的实际困难，西北局规定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 6 个月，县级干部的学习从 7



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的学习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时间学和学不懂，“解不下”，原因是许多干部经常下乡，在机关的时候很少；许多干部文化程度低，看不懂文件。针对这种情况，各地采取了许多办法，如每月集中五天或十天学习，举办训练班，抽调干部离职学习，或请文化程度高的同志给大家上大课、讲文件等办法进行整风文件学习，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效果。为了正确指导各地的整风，西北局于9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各分委、特委和直属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提高党员素质和支部建设问题、干部问题、新区和边境区工作问题、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问题。这次会议进行的方式和过去各种会议完全不同。先由西北局的负责人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采取活泼的座谈方式，自由交换意见，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求得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次会议是一次整风会议，对于推动各地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会后各地委、县委对于整风运动作了更加切合实际的部署，把各地区的干部组织到整风运动中来。多数区以上干部都受到整风教育，转变了思想，改进了作风。至1943年春耕开始时，各地整风先后告一段落。

我在整风运动中也受到很大的教育。1942年和1944年我曾两次进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彭真同志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的一

个缩影。那时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个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我于1942年夏第一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时，一开始就学习整顿三风文件。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整风学习是在校部领导下，主要靠各支部自觉地进行。学习制度是很严格的，除星期天外，一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大家一心扑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学习文件，思考问题，寻求自己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的答案。大家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很认真，逐段逐字地学，两遍三遍地学，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边学边想边讨论。学习中都记笔记，写心得，写体会，互相交换意见，交流心得。经过学习，大家对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有了比较深刻的意识，思想方法较前有很大的进步。

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是1944年。这时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这次学习的前一阶段，主要总结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和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肃清其流毒。当时学习了中央编印的《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个文献。在第一阶段学习中，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对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政策的得失等，经过充分的讨论，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这次学习的后一阶段，在掌握文件精神实质和认识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写出书面材料，在小组会上自己讲，大家评，高标准，严要求。我也检讨了我的全部历史和思

想。我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只有14岁，革命道理懂得很少，只知道旧社会不好，要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来救中国。在上中学时和工作中，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了一点初步的理论知识，但不会也不懂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后来搞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有了根基，但从上级来的人又指责我们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思想上想不通。那时在我们地方党的领导成员中，并没有什么富农或富农思想，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怎么就成富农路线呢？再后来又进行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抓起来了，我也被抓起来，思想上更结了大疙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经过学习，才深刻地认识到这都是左倾错误路线在作怪。它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结果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我们由于马列主义修养不够，也有经验主义的毛病，所以对教条主义者的一套往往辨别不清，教训是很深刻的。我在这次整风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人，如果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避免要招致失败和挫折。这可以说是在革命道路上的一条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

### （三）西北局高干会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召

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 300 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经常到会，协助领导。毛泽东同志在开幕、闭幕之日到会讲话，中间在大会上讲解了《联共（布）党史》的六条结论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为大会写了一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 10 余万字的报告。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都在大会讲了话。大会在开幕、闭幕会上和讨论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时，还邀请了政府的党外负责人士参加。这次大会对于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边区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次大会解决了三个大问题：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党的一元化的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大会开幕后，10月 21 日起，由陈正人报告整党整民（指民众团体）问题，而整党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的统一。因此，在讨论中就不能不涉及党的历史上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大会主席团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达之前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边区党内老干部如习仲勋、张秀山、李卓然、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 46 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我在会上对边区党内的历史问题也作了发言。大家列举了种种事实来说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怎样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与群众的关系，怎样制造了错误的“肃反”事件

等，要求犯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痛改前非。过去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但已觉悟了的同志，一面进行自我批评，一面督促没有完全觉悟的同志赶快觉悟。而个别犯有严重错误的负责人，由于承认错误不彻底，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大会气氛热烈，情绪激昂，每天散会后，在宿舍、饭堂，山道上、炭火旁仍然继续进行研究和讨论。在错误的“肃反”中遭到迫害的一些同志，过去认为“肃反”是当时的个别负责人品质不好，陷害好人，故意整人，没有完全了解问题的实质。这次讨论，把历史争论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使大家弄清了边区党内历史问题的争论的实质。认识到错误路线的根源，就是因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作怪。高岗在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央分工指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基本上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有的同志还有不同的意见，并在近年引起一些争论。中央于1983年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沟通了认识，我们应当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团结起来向前看，不再在历史问题上进行纠缠。

大会在历史问题讨论告一段落后，从11月24日起，用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力量来批评当前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偏向。会上发言的有70多人，从县团级干部起，直到边区许多高级负责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如地方的同志检讨了分散主义、政出多门、政策法规不统一、对军队支持帮助不够等倾向，军队的同志检讨了军阀主义的

残余、闹独立性、对党和政府及群众尊重支持不够等倾向。

会上，林伯渠做了整政的报告，贺龙做了整财的报告，谭政做了整军的报告。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会议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西北局领导，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决定地方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军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以密切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决定认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三三制”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等。会议还决定整顿党的组织。党在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的统一，保证了边区各项事业的胜利进行。

这次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明确规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两大中心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位，其他任务都应围绕中心任务去进行，克服“百端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等不切实际的思想。这次会议上，奖励了王震、习仲勋、王维舟、马锡五、贺晋年、王丕年、刘建章等 22 位领导生产成绩卓著的同志，我也荣幸地获得奖励，得到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成绩来自陇东的广大干部和人民，我只不过他们的代表。王震同志代表受奖者讲了话。

高干会后，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边区工作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尤以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这证明经过整风，边区的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提高了，作风转变了，党性

增强了，因而更加为群众信任和拥护。

正当全党深入开展整风之际，身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却趁整风中进行审干之机，搞了一个所谓“抢救运动”。1942年11月间，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在社会部制造了一个“敌特”假案——“张克勤案件”。并以张的假口供将一大批在甘肃、陕西、河南工作的同志打成“红旗党”特务。1943年初，康生亲自批准，让保安机关在延安抓了200多个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之后，强令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开始了“全线进攻”。许多革命同志，热血青年在政治上、人格上备受凌辱。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一严重问题后，在干部会上首先承担责任，并立即对审干和反奸问题作了指示。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严禁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要求对所有案子进行甄别。这样一来，康生的倒行逆施才得以遏制。西北局从1943年12月开始，对边区一级和各地的冤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甄别平反。把错关押的同志放出来，对所有搞错的人给予平反。在整风中所发生的“抢救运动”，给全党同时也给边区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党中央纠正了这一错误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全党的整风运动一样，继续健康地发展，做到了善始善终。通过延安整风，提高了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坚定了无产

阶级立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对中国革命起了转折作用。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 刘少奇视察黑龙江林区

元仁山 王正清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起到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相继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年7月18日，刘少奇在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张昭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哈尔滨。离京前，他在所在的党支部会议上谈到此行的任务时说，我们这次去黑龙江，任务是考察林业经济。来到黑龙江之后，他对省委领导同志说，我们到各地去是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了解情况。通知要去的地方，不要有什么举动，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律不准搞额外的招待。到伊春林区以后，他又对当地负责同志说，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森林，看看人工林长得怎么样，看看是人工更新好，还是天然更新好。

从7月18日至8月10日，他在黑龙江视察工作，调查研究的20多天时间里，利用大部分时间，昼夜兼程，

实地考察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等主要林产区的带岭、丰林、东京城以及根河、伊图里河和图里河等6个林业局的6个林场。他在这些林业局所属的16个基层单位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8次，直接接触各级干部和群众。详细考察林业资源、森林更新、林业的价值规律以及森工企业的领导体制等关系到我国林业兴衰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黑龙江期间，他先后两次接见了正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和与会同志。还在省委领导陪同下，视察了东北林学院（今东北林业大学）。

刘少奇在这次考察林业经济的过程中，同省委领导、林业干部以及群众、专家们反复探讨有关林业长远发展的问题。他所谈到的关于采育结合、关于木材的综合利用、关于贯彻按劳分配、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为林业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 （一）

刘少奇在林区视察时，针对当时林业生产和发展的现状，反复强调林业工作要坚持采育结合的方针，做到青山常在，后继有林。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主要林区和木材供应基地。森林覆盖率、木材蓄积量和年产量当时都居全国首位。建国以后，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采取高强度地过量采伐，特别是经过“大跃进”，导致

森林资源急剧下降。仅1950—1960年的11年间，黑龙江林区的活立木蓄积量就减少10%左右，加之普遍忽视抚育更新，因而出现了采育比例越来越严重失调的状况。反映出我们在林业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此，刘少奇在林区考察过程中，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光吃“老祖宗”留下来的饭，而要想到将来，想到子孙后代，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森林财富。如果我们光拿木头，不栽树，后继是否有林将成为大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国家每年下达给林业局的采伐任务太重，没有时间和人力进行幼林抚育等更新方面的工作。对此，刘少奇明确地指出，林业工作要坚持采育结合的方针。他说，国家要坚决把采伐任务减下来，要把任务和政策统一起来，使林业局不是只考虑一时的经济效益，而是要考虑到怎样有利于水土保持、生态平衡，特别是森林更新这些长远的建设问题。他多次同林业干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森林工作目标。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做长期的艰巨工作。

刘少奇在考察过程中，紧紧围绕采育结合问题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忽视森林更新，忙于采伐的现象，强调指出，采育结合的思想应当在所有林业部门和林业干部、林业工人中明确地树立起来。解决好采育结合，最重要的是育，也就是解决后继有林的问题。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座谈会上，刘少奇得知林业部门有一种说法，叫作采伐是硬任务，更新是软任务，更新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于是，他指出，这里既有思想认识

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主要是林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应当明确，林业局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生产（采伐），一个是更新。现在每公顷林子出木材 100 至 200 立方米，将来可以达到每公顷出材 300 至 400 立方米，木头越砍越多，而不是越砍越少，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感到更新是硬任务了。

我国的森林更新，是靠天然还是靠人工？这在当时没有统一的说法，林业部门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刘少奇在考察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说，针叶树几百年更新一次，要针叶树长的快，就要人工更新，人工栽植。阔叶树靠天然更新还是可以的。但是，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各有利弊，因此，不同的树种要用不同的更新方法，不同的地域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他在接见林业工作会议同志和黑龙江省委的同志时，曾经提出一系列实践中的问题，启发大家认识森林更新的规律。他说，针叶树老死之后生长阔叶树，在阔叶树底下生长针叶树苗，待阔叶树老死了，针叶树才长起来，大约 200 年到 500 年轮换一次。要试验一下，通过人工促进能不能使针叶树快点长起来。他又说，杨、桦树的种子风吹四五里，它的母树留多远为好？落叶松的种子风能吹多远？母树留多远比较合适？落叶松成材往上长，而红松单棵往两边长，它的周围是不是应该有杨树和桦树？我们现在造落叶松有成功经验，造红松的经验还不成熟，造白松完全没有经验。因此，我们要重视森林更新工作。采伐也要讲究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皆伐、择伐都要因地制宜，因树制宜，要有

利于促进更新为目的。

在考察过程中，刘少奇多次强调森林更新要“两条腿走路”，实行两个办法，即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林业三十条》中明确规定，坚持“人工更新为主，天然更新为辅的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森林更新原则。从那以后直到“文革”前，我国林业工作一度出现了转机，国家调整了木材生产任务，确定了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营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林业工作方针。

20多年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当年关于采育结合的森林更新思想和他所提出的方针、原则是有利于发展我国林业生产的。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规律，从而搞好林业工作，给予很大的启发。

## (二)

“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这是刘少奇此次考察林业经济过程中谈到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又是个少林的国家。如何把有限的森林资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呢？他在伊春林区经过五天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亲切接见了伊春市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在对他们的讲话中说，一方面山上有资源，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都很需要，如何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林业部门，从管理局到林场，都要做这个工作。他强调指出，能否把资源和需要很好的结合起来，是衡量林业工作好坏

的重要标志。在谈到需要时，他说，大体上是基建用材、生产用材、人民生活用材几大类。这些用材量都很多，仅包装用材每年就需要四五百万立方米，还有农村建房用材，城乡家俱用材、造纸用材、生活烧柴等等，有很多用途，很多需要。伊春这个地方是个大林区，得天独厚，被誉为“红松的故乡”，可是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缺少木材。你们要研究木材的多种用途和多种规格，最大限度地把林区一切有用之材都利用起来，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刘少奇认为，充分利用森林资源，首先要教育干部、群众爱惜资源，珍惜林区里的一草一木，树立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惜木如金的思想观念。他在一些林场的采伐迹地看到堆放着许多小径木，梢头木以及采伐剩余物时，总是指给随行的林业干部们看，并且说，关里有的地方找个镰刀把都不容易，这些枝枝杈杈、棍棍棒棒扔在山里太可惜了！都可以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嘛。他认为林区群众的生活烧柴尽烧木头，尤其是烧好木头是个很大的浪费。他具体分析说，伊春一年要烧掉 60 万立方米，大兴安岭一年烧掉 100 万立方米，全东北烧掉的就更多了。这样烧法，要烧掉多少木材啊！他主张林区群众应当改烧树杈，可以有组织的让老百姓进山打柴，多余的卖给缺柴的地方。这样木材不受损失，减少资源的浪费，群众又方便，于国于民都有利。他在鹤岗听煤矿的同志反映，运给矿区做矿柱用的都是大木头，用的时候还要破开，有的可以破成两三根。他对这种既费工费时，又损害国家资财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不爱惜资源就不能做到合理用材。在东京城

林业局的汇报会上，谈到柞木等次生林的抚育和利用时，刘少奇又一次强调充分利用森林资源问题。他说，柞木的用处很多，是农具、家俱、坑木的理想用材，粗一点的可以做矿柱。他要求林业部门，把采伐下来的木材按照需要，在集材的时候就分成类，随时准备提供给社会利用。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他针对一些部门分配木材不用心思，人为地浪费了木材，严肃地指出，作冰棍杆还用木头，而且用大木头，有关部门还分给他木材，岂有此理！今后木材分配要由用材部门提出需要规格，做到合理分配木材，减少浪费。

刘少奇在强调爱惜资源、合理用材的同时，还十分关心木材的综合利用和发展林区的多种经营。他从小兴安岭腹地五营林业局视察返回伊春，没有休息就来到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的各个车间视察。当时林区综合利用能力还比较低，产品数量还不多。这个厂利用次等木材加工各种规格的板材，加工木锹板、马夹板等小型农具，再用板条、板头等制材剩余物作造纸原料，生产出来多种林产品。刘少奇察看了板院里堆放着的各种规格板材以后，走进各个车间，一边观看工人们的操作，一边同陪同的领导同志分析研究木材综合利用的前景。当他看到他们用那些只能作烧柴用的边材废料造出雪白的纸张时，非常高兴，赞扬他们做得很好，要继续坚持下去。佳木斯造纸厂是我国大型造纸企业之一，是用木材的大户。刘少奇在该厂视察时，了解到造纸都是用较好的红、白松原木做原料，他感到可惜，对厂领导说，林区里的树墩、树杈都要利用起来。

红、白松资源有限，生长又慢，你们能用其它速生树种代替红、白松生产工业用纸就好了。后来，这个厂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工人共同努力，研究成功用落叶松和其它次等木材作原料，造工业技术用纸，既节省了国家上等木材，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多年来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20多年过去了，黑龙江林区的木材综合利用能力和产品产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如今重温刘少奇当年在离开伊春前夕留下的“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的题词，倍感亲切。

### (三)

60年代初期，随着“一大二公”而来的“大锅饭”在我国城乡很盛行，林业工作也不例外。结果，许多山头被“吃”光了，资源越来越少，广大林业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被压抑。面对这些现实，刘少奇在林区视察过程中，反复同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商量、讨论，研究解决不吃“大锅饭”，调动群众和企业积极性的办法。

刘少奇在林区基层的座谈会上，在随时随地的谈话中，多次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没有积极性，工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不利于林业事业的发展。当时，林业企业内部都是执行以林业局为基本核算单位，以进贮木场的木材总量来计算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刘少奇认为，这种“算总帐”的办法不科学，不合理，是一种“吃大锅”的办法。他说，劳动生产率应该是一项一项计算，采伐、集



材、运输、贮木场等等都有自己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你只按到贮木场的木材计算，就会把许多人的劳动算丢了，这是平均主义的办法，“平均主义不能鼓励人们去做艰苦的工作”。他进一步提出，要把核算单位划小一点，比如以林场、制材厂、森铁、贮木场等单位进行核算。林业局作为总公司，收购林场生产的木头，各算各的帐。在各个核算单位内部实行几包几定，把任务和效益落实到工段、班组、直至个人。

为了发展林业生产，也要处理好木材价格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林区视察过程中，许多林业部门反映，在林业企业中长期存在着伐大不伐小的现象，因为大木头挣钱多，费工少，小木头挣钱少，费工费时，这样下去，势必出现无计划采伐，破坏森林资源。对此，刘少奇指出，这就反映出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起作用，需要我们去研究。他说，可以把木材分为两种价格，一种是出场价（即收购价），一种是销售价。在定价的时候，大木头出场价要低，向外售价要高；小木头的出场价要高，向外销售价要低。要按采伐、装卸、集材、运输等环节的难易来定价，这样才能有利于调动林业生产部门充分利用小径木的积极性，减少木材的浪费现象，达到合理用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刘少奇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木材价格要彻底改，价格可以促进生产，促进木材节约。”他说，为了解决好木材问题，要全面提高木材的销售价格，也要相应的提高木材的运费，再提高小木头的价格，否则妨碍生产、妨碍节约，要下决心搞好这项工

作。他还指示由国家物资、计划、物价、林业部门共同研究落实。

长期以来，国有林区都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林区里的一切事业都是由国家统包，加上重采轻育的现象又比较普遍，许多林业生产部门缺乏长远打算。因此，林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困境，个别地方显得十分突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刘少奇认为，光靠一般地号召不行，必须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寻找解决的办法。他根据基层干部和林业工人的建议，又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调查研究，在哈尔滨召开的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营林村的设想。他说，在国有林区划分若干个林地，设居民点，经营森林。以3000公顷国有林为例，定居10户人家，每个劳动力管理300公顷林子。10户人家组成一个小合作社，主要是营林、护林，也种点地，逐步实现粮食自给。国家帮助盖点房子，解决必要的农具和生活用品。把这个地方按照规章制度包给他们，林业局在更新和抚育方面给予技术指导，他们生产的木材由国家收购，山产品归自己所有，可以出售。这样，国家省钱，个人方便，林子会管理得更好，双获利。他要求各林业部门先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刘少奇当时所提出的建立这种营林村的组织形式，是否定了林业企业上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固定模式，主张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放开经营权，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一种好的方法。

刘少奇多次强调“林业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来完成。他提出，为了提高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凡是

有人的地方都要造林，但责任要明确，要有报酬，栽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积极性。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当地干部说，黑龙江的许多宜林荒山、坡地、岗地和“四旁”都应该栽树。可以给老百姓划分2亩地，让他们栽树，也可以考虑给群众搞点自留山，将来农村用材由他们自己解决，多余的卖给国家。有条件的国有林要交给地方分级管理，包给老百姓也可以。国营林场内部也要实行责任制，集体和个人，包括职工家属，都可以承担造林任务，实行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按照1年、2年、3年的成活率分别付给报酬。

刘少奇当年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如今我们的林业工作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 (四)

为了进一步发展林业生产，必须下力量培养林业技术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刘少奇从林区回到哈尔滨后就亲临东北林业大学，听取汇报，看望师生员工。在实验室里听介绍，看标本，了解科研成果，还到实验林场去观察那些在林海里多次见到过的幼树林。他详细询问每个树种的栽培、抚育和年轮，指示要把东北林区的主要树种都引进来，供科研和学生实习。他还亲切地对校领导说，林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这些大学生是未来的林业专家，有了他们，科研工作才能不断深入，森林事业才能发展的更快。刘少奇在视察林区时，请林业大学教授周重光同志随行，并且不时请教林业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教育人们要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要求林业部门的同志克服困难，尽快提高我国林业科学技术水平，改变林业企业的落后面貌。

刘少奇在林区视察期间，一方面考察林业经济，他明确指出，要端正林业生产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从气候、土壤和树种的生长习性等环节，具体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树种的更新规律，为科研工作提出许多要求和希望。他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启发和引导干部学会运用科学技术于林业生产。他多次说，森林更新是林业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地区又都有自己的更新特点。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知识，要找专家、教授和专门人才共同研究。作为林业管理干部，对这些技术问题不研究不行，长期不懂更不行，不能总当外行，要使自己变成内行。带岭林业实验局长期承担林业部交给的营造红松、落叶松速生丰产林的试验研究任务，在老林业工作干部张子良的带领下，经反复试验研究，取得成功。刘少奇到那里以后，看了他们的苗圃、标本园和移栽在山上的幼树林，充分肯定他们的示范作用。他非常高兴地说，多好的林子啊，全国都要这样绿化起来。森林防护也是一门科学，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位“老木把”对打火很有研究，就亲自同这位同志一起探讨打火的学问。他教育人们，要搞好林业工作，也要听土专家的意见。

刘少奇非常重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他要求选拔一批知识分子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担任领导职务。要选那些懂专业知识、精通业务的人管生产、管技术。他提出，林

业局应当有林业机械师或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林业局的局长中应当有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场场长中要有一批林业大学或者专科学校毕业生。为了尽快提高干部、工人的业务素质，林业部门要重视干部和工人的培训，工段长要分批参加轮训，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工段长中也要有林业大学或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他还要求从管理局到每一个基层单位，都要加强技术力量，建立技术责任制。

由于左倾思想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我国林业面临着危机。今天，在各条战线进行改革的新形势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林业复兴这个严峻的现实。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大林区开始走上了一条适合我国林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新路子。当年，刘少奇来黑龙江考察林业经济期间的有关论述，对于加快发展我国林业事业，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 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 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通信兵史编审委员会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经严酷战争的考验，出色地保障了红军的作战指挥和相互协同，为夺取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 党中央为红军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全国革命斗争形势迅猛发展，武装起义，组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其势如燎原烈火，锐不可挡。在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并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由于不能使用无线电通信，与各根据地红军的联系只能靠地下交通，严重地影响了党中央对红军的战略指挥。为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密切同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联系，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党中央决定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以建立与红军的无线电联络。

为了迅速创建无线电通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

## 1. 向共产国际申请代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1928年6月，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共产国际代我培训通信人员。共产国际当即采纳这一建议，并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佩夫、李元杰、程祖怡6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陈昌浩因调动工作中途退学，其他人坚持学完规定课程，于1930年秋毕业，然后相继回到国内。

1929年1月，共产国际另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留学生中，又挑选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4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有、无线电通信技术。他们学习结业之后，于1930年4月回到上海。

上述人员是我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培训出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他们回国后，在中央特科领导下，担负起建立无线电通信的工作。

## 2. 在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在共产国际为我党代培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同时，党中央在上海也秘密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1928年秋，周恩来亲自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学习无线电机务，准备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接受任务后，便开始自学无线电收发报原理，并在“绍敦电机公司”经理蔡叔厚掩护下，在该公司设一“地下工厂”，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练习组装。同年10月，周恩来又指示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设法学习无

线电通信技术。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电台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并于1929年5月毕业。

1929年10月，李强和张沈川分任机务和报务教员，开始秘密培训无线电报务人员。当时参加学习的有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喻杰生、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

1930年6月，党中央指示张沈川再培训20名报务员。经过一段筹备，10月，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现巨鹿路391弄12号）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为便于掩护，对外称“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由于隐蔽不周，12月17日，训练班遭敌破坏，工学人员20人被捕。在这之后，伍云甫、王子纲、毛齐华等遵照中央指示，吸取教训，以更隐蔽的方式，又相继培训了10余名报务员，其中有宋侃夫、徐萍、周德元、朱帮英、蔡威、杨兰史、刘进、胡白天、王逸群等。

### 3. 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通信人员

经过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和组装收发报机，党中央首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台，在香港建立了南方局电台，并于1930年1月，两台沟通了联络。此后，经过积极准备，从1931年1月起，开始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人员。

1931年1月后，派报务员喻杰生携带50瓦电台一部，到洪湖革命根据地。不久，喻杰生病逝，党中央又派报务员刘进、胡白天和机务员李文采到洪湖工作。2月至



9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翁瑛、杨兰史、朱帮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王逸群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派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到鄂豫皖根据地。这些同志到达根据地后，先后与上海党中央和以上各根据地之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由于无线电通信的建立，党中央和各根据地之间便架起了“空中桥梁”。敌人对根据地的任何分割、封锁，都阻隔不了党中央同各地红军的紧密联系。从此，党中央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加强了对红军的战略指挥；各地红军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互相呼应，协同作战，更加提高了战斗力。

党中央派无线电通信人员到红军中去，不仅建立了无线电联络，更具意义的是为红军输送了一批通信领导骨干，为以后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 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展无线电通信， 有力保障作战指挥

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此时，红军的作战形式，已从初期的游击战发展到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作战中，方面军首长深切体会到，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常常会影响到作战的胜利。9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八月攻长沙不克的原因

之一是“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sup>①</sup>为了适应作战指挥的需要，方面军总部在一无器材、二无人员的困难条件下，决定采取以下措施，迅速建立和发展无线电通信：

缴获敌军电台，用来装备自己。依靠战场缴获，是红军当时获得通信器材的重要来源。为此，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曾多次发出命令和指示，要求部队切实做好这一工作。1930年10月3日，在总攻吉安的命令中指出：“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的无线电机、电话……等交通工具，一律不准毁掉。”<sup>②</sup>12月29日，在《红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岗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中，特地加了附注：“各部需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1931年1月1日，在进攻敌谭道源师的命令中，更进一步要求：“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sup>③</sup>朱总司令、毛总政委的上述命令，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共缴获敌军电台35部，为红一方面军迅速建立和发展无线电通信提供了物质条件。

重视教育、使用起义和被俘的通信技术人员。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省宁都起义。随

---

① 引自《一方面军1930年历史档案汇编》。

②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二辑第二册第161—162页。

③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二辑第二册第32页。

起义参加红军的有 40 余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并带有 8 部收、发报机。另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断有敌军电台人员参加红军，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对这些人员，采取了团结教育和大胆使用的方针，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使之成为红军服务。王诤、刘寅参加红军的第三天，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就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接见后，王诤被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同年底被任命为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后成立军委通信联络局（简称三局）时任局长。其他许多同志，也都委以领导职任，如刘光甫担任军委通校校长，陈士吾、闫知非、沈毅力、张瑞等担任了通校教员，范文谦、闻述尧、海凤阁、荆振昌等担任了无线电中队队长或报务主任。在生活上，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仍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在党的关怀教育下，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红军通信骨干，他们同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同志一起，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为创建和发展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贡献了力量。

举办训练班、学校、培训红军通信技术人员。1931 年 1 月 28 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亲自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求各部队“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sup>①</sup>各部接到命令后，严格按照规定

---

<sup>①</sup> 引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文献》（一）第 128—129 页。

的条件选送了学员。2月初，第一期训练班开学，由王诤、冯文彬任训练班负责人，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任教员。学员分报务、机务两班。这些学员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连队指导员或党（团）支部书记，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年轻聪明，心灵手巧，思想觉悟高，学习刻苦努力，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就毕业分配了工作。训练班办至第3期，改称“军委无线电学校”，到第5期时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从第6期起，学校扩大招生范围，由过去的单一无线电队，增设了电话队、司号队、旗语队等。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通校办到11期，共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这些学员陆续分配到各级通信分队，扩大了通信队伍，为红军通信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修自制通信器材。方面军总部在重视战场缴获的同时，还不断教育通信战士自己动手，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自修自制通信器材，以扩大通信器材的来源。1931年11月，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通信材料处，专门负责通信器材的收集和维修工作。1932年夏，材料处改为材料厂，由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涂作潮任厂长，他带领几名工人和学徒，在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仅有4尺皮带车床1部、台钳2把、摇钻1台、2.5马力发动机1部），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以老带新，群策群力，克服许多困难，做出很大成绩。他们修理改装了一批缴获的收发报机，修复了不少电话单机、总机、手播

马达和充电机，自制了许多电容器、变压器、电源插头、齿轮等元、部件。还创造性地利用迫击炮弹，挖去装药，锯开弹壳，磨制成充电机上的活塞涨圈。这些器材发到部队后，对保证通信工作的正常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发展很快，1931年1月只有一个无线电队，至1932年初，仅一年时间便增加到14个无线电分队，在这之后又随着人员、器材的不断增多，军委总部相继向中央苏区临近的各根据地派遣了电台。至1933年，无线电通信便形成了三个以党中央、中革军委为中心的联络网路，分别担负：保障党中央（1933年1月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上海地下党、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中革军委同江西军区、福建军区、粤赣军区、闽赣军区、赣南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和赣东北（闽浙赣）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中革军委同一、三、五军团及下属师和七、九军团的无线电通信。

随着无线电通信的普遍建立与迅速发展，无线电通信便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重要通信手段，在保障军事作战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抄收与播发新闻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经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缴获了一部半电台（指一部电台和一部收报机），因不能组织互相间的联络，王诤等便开始抄收新闻。他们主要是

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电讯，另外也抄收一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翻译以后，送呈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及其他领导同志参阅。红军在此之前，由于没有电台，不能抄收新闻，加上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对国内外消息十分闭塞。为了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不得不经常派小分队到敌占区搜集报纸，为此曾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有了电台，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就为总部首长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提供了依据。

1931年11月7日，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了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召开大会时，要用无线电对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发出通电。王诤、刘寅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100瓦大电台，担负收发新闻的工作。他们每日抄收国内外新闻，翻译后油印成《参考消息》，发给大会代表参阅；同时，还以“CSR”（CHINESEY SOVIETY RADIO——中华苏维埃电台的缩写）为呼号，向全国播发大会的新闻和文件，以及根据地作战胜利的消息。上海和一些根据地都收到了这些喜讯。从此，“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正式成立，它通过红色电波，冲破浓云密锁的长空，打通了向全国人民、乃至国外传播革命根据地新闻的渠道。敌人的“新闻封锁”，随着军事“围剿”的失败也被红军粉碎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收发新闻的工作，1933年5月，中革军委专门建立了新闻台，由罗若遐（岳夏）任台长，王玉衡任报务员。根据地的新闻不断向外发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新闻台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表

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播发新闻的工作停止了，但抄收新闻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新闻台的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为进一步发展新闻工作，在西安设立了红中社分社。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每天除播发2000字中文电讯稿外，还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及日本同盟社和美英通讯社的电讯。党的新闻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 2. 侦收敌电，掌握敌情

红一方面军组建第一个无线电队后，在王诤主动要求下，开始对敌进行无线电技术侦察。由于侦收和破译了许多敌人电报，掌握了不少敌情，为总部首长定下决心，抓住战机，歼灭敌人，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为侦听敌人行踪，王诤等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发出的信号。5月15日黄昏，王诤侦听到驻富田的敌二十八师电台正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

师部电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答：“东固①。”

---

① 东固当时为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王诤同冯文彬一道立即向总部作了报告。总部首长当即进行战斗部署，下达了如下命令：务于拂晓前占领东固岭一带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人。16日晨6时，敌进入我设伏地区，我突然发起猛攻，歼灭了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师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5月27日，我军围攻广昌。下午2时，总预备队（三军团）投入战斗，近200挺轻、重机枪和数十门迫击炮齐放，战斗空前激烈。三号军团电台报务员韦文宫、曹丹辉，从收信机里侦听到敌第五师电台拍发的一份明码电报：“公鉴：共匪主力来攻广昌，现在激战中，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SOS（求救信号）……”收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并迅速将这一消息传遍全军，大大振奋起部队士气，激战至晚9时，即攻占广昌，敌五师一部被歼，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

7月1日，蒋介石亲自出马自任总司令，并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作战中，7月23日下午4时，红三军电台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白军的万万火急电报——“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暴露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敌人各路兵力的部署。电报呈送给总部后，总部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打了三仗，三战三捷。

红一方面军通过开展无线电侦察，逐渐锻炼出一支意志坚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侦察队伍，在以



后的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工作越做越好。特别是在长征途中，数十万敌军对我国追堵截，敌军飞机还不断在空中侦察骚扰。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明敌情，红军将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使敌对我国追堵截的企图一次次被粉碎。敌察觉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1935年5月2日，敌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给蒋介石发电称：“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收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指出：“查我军往来电文多为匪方窃译，危险甚虞，耻莫甚焉。”规定：“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 3. 保障作战的指挥与协同

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如虎添翼，战斗力显著增强。这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转移中都不乏其例：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一、三军团主力离开赣南，解放了赣东、闽西广大地区。蒋介石乘赣南我军兵力空虚，调集30万大军，于1931年6月，准备向赣南发动第三次“围剿”。针对敌情，总前委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进攻；同时急电一、三军团主力于7月10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由于通过无线电联络，保障了总部对部队的及时指挥调动，很快完成了战前准备。

等敌人发起进攻，我便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结果，六战五捷（一战打成对峙），击溃敌人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委每天都要侦察和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与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进行联络，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协同动作，这都要依靠无线电通信来实施。为了搞好通信联络，军委三局派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随军委总部行动，并以交替前进的办法轮流值勤，有效地保证了通信联络的不间断。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为保证中央军委与各军团以及各军团间的经常联络，军委三局专门召开了一、三、四、五、六、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等10个无线电分队负责人参加的前方电台干部会议，总结交流联络经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为了把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全军，无线电一、六分队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把一份份电报及时地发往一方面军各军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以及各革命根据地。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采

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央军委依靠顺畅的无线电通信，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了敌人。战役期间，及时收发了大量电报，其中由朱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电报就达半数以上，可靠地保障了作战指挥。至5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一、三、五、九军团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全部被甩在金沙江以东、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狂妄企图，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6日，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路军，准备经草地北上。为加强左路军的通信联络工作，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校、电话队一部随红军总司令部跟左路军行动。另外，还从一方面军调出7部电台、30余名通信技术人员到四方面军工作，从而使左、右路军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更为密切。

#### 4. 保障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

由于有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通信技术人员，我党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联系。

1931年秋，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国际台，由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程祖怡担任报务员，负责同共产国际通报。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时，上海留有两部电台：一部电台继续由程祖怡与共产国际联络，另一部电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中央苏区军委无线电五分队，经上海台转报，与共产国际保持无线电联络。

1934年10月5日至1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捕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理经费的沈子修，管电台的周秀珠，两部地下台的台长王有才、程祖怡，以及译报员杜单强等10人。两部电台、7部收发报机和大量通信器材，全被敌人劫去。由于两台同时被破坏，党中央在与上海中央局中断联络的同时，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根据党中央指示，军委无线电五分队曾试着呼叫共产国际台，对方电台发射功率大，五分队可以听到其信号，但五分队电台功率比较小，对方听不到，回答不通，未能联络上。

红二方面军积极建立无线电通信，  
为粉碎敌人“围剿”，胜利实施  
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这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和红三十二军一起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此之前，二、六军团先后创建了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两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就是在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创建和

发展起来的。

### 1. 红二军团无线电通信的创建

1930年7月，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第四军和第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1931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派喻杰生来到红二军团，建立起湘鄂西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喻杰生病逝后，党中央派来刘进、胡白天和李文采，他们积极工作，同上海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

1932年7月，蒋介石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因反“围剿”失败，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于9月底退出洪湖，转向襄北大洪山地区。在突围转移中，电台人员走散，机器被埋掉。从此，红三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无线电通信，便遭受到挫折，同党中央和其他苏区的联系即告中断。

### 2. 红六军团无线电通信的创建

1933年6月，湘赣边根据地红军和湘鄂赣边根据地红军一部，组成红军第六军团。1934年8月12日，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构，由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在六军团未成立之前，湘赣省委为建立无线电通信，于1931年10月26日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要求派遣无线电人员。报告中写道：“无线电机及人材此次必须请求你们兑现，交代表（指湘赣省委出席在中央苏区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带来,以便打通湘赣省、湘鄂赣省到中央区的交通,这正是建立全苏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苏区有重大关系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实行交通上的计划。”<sup>①</sup>

根据湘赣省委的要求,中革军委于1932年6月,派肖英(队长)、徐萍(政委)等带50瓦电台1部,由中央苏区到湘鄂赣根据地,建立了湘鄂赣军区电台,担负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西军区的通信联络任务。

继湘鄂赣军区建立电台之后,中革军委又两次向湘赣根据地派遣电台和人员。第一次是1932年11月,中革军委派闫知非、周德元带50瓦电台1部,随萧克(红八军军长)到湘赣军区工作。到后不久,便和党中央(此时,党中央已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建立了无线电联络。第二次是1933年5月,党中央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江文和温亮彰带5瓦电台1部随其到湘赣军区工作。同月,棠市作战中缴获一部损坏的电台,后被修复。该台报务员王永浚参加了红军。为加强对电台工作的领导,湘赣军区成立了无线电中队,由闫知非任中队长,江文任中队政委。

湘赣军区有了电台以后,较好地保障了作战指挥。1934年1月4日,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红

---

<sup>①</sup> 引自《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史——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长征至黔东会合红二军团资料选编》(五)。

十六师，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吸引牵制赣江以东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十七师执行这一任务时，张有年带5瓦电台1部随该师行动，担负与军团部和红十六师的联络任务。由于联络顺畅，2月上旬，两师顺利会合，并向南浔路开进。电台除执行联络任务外，还开展了无线电侦察。1934年4月初，由于侦收到敌军行动的情报，我军于4月5日在沙市地区设伏，结果歼敌第十五师四十三旅，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1000余人。

为了增强无线电通信技术力量，给以后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创造条件，湘赣军区无线电中队在永新县城先后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员的有张有年、王永浚，学员有彭富九、孙勇、赵瑾和龙振彪、旷泉吉、萧荣昌等。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迅速成长起来，成了红二方面军通信工作的领导骨干。

1934年8月，红六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命令，为给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并与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取得联系，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地区挺进。

### 3. 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无线电通信迅速发展

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后，与中革军委保持了密切的无线电联络，特别是在引导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上，无线电通信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9月20日，中革军委电告红六军团“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3日，中革军委又电告红六军团：“二军团

已占印江”，要六军团“迅向江口前进”，与二军团靠拢。在中央引导下，10月24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

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西后，由于未补充新的电台，一直未同中央恢复联络。同六军团会师后，从六军团调了一部电台及数名无线电通信、侦察人员到二军团总指挥部工作。至此，红二军团与党中央断了2年之久的无线电通信才得以恢复，来往电报频繁不断。

为策应中央红军进行长征，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以永顺为中心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湘鄂两省敌人集中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2月1日，中央来电对反“围剿”作了重要指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劳，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上述指示，对红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在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反“围剿”作战过程中，二、



六军团团结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共缴获电台 5 部，还俘虏了部分电台人员。随着电台和技术人员的增加，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成立了无线电大队，闫知非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下辖 5 个无线电分队和 1 个侦察台，分别配属在军团部和下属各师。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和各师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作战指挥的能力有了明显增强。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由此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二、六军团的无线电侦察，开展得十分活跃。侦察台由张有年任台长，萧荣昌、胡鹤、贺回仔、孙勇等先后任报务员，王永浚、陈琮英负责破译，任弼时有时也亲自参加破译工作。在任弼时的关怀和指导下，同志们的侦译技术提高很快，截获了许多重要情报。1935 年 4 月 13 日，当侦察获悉敌五十八师进至陈家河附近时，二、六军团首长分析，该敌远离桑植，孤军深入，比较好打，于是果断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隙，集中 11 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向敌发起进攻，全歼该师一七二旅，接着于 4 月 15 日，又在桃子溪歼该师师部和一七四旅。6 月 12 日至 14 日，二、六军团围攻宣恩，无线电侦悉敌援军的行动路线和出发时间，贺、任首长遂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兵力围城，主力则星夜赶到敌援军的必经之地——忠堡地区，为敌人准备了一个“大口袋”。结果，敌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被歼，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被我活捉。8 月 8 日，我军又在巴蕉坨击溃敌陶广纵队 10 个团。至此，敌人“围剿”遂告失败。8 月 27

日，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驻湖南澧县大堰档，一天午夜，电台侦收到一份敌人电报，内容是第二天要来轰炸。江文立即将这一电报送交贺、任首长，贺、任首长当即决定马上转移。第二天一早，果然飞来五、六架敌机，对大堰档反复轰炸，但总指挥部已转移到五六十里以外的地方，避免了损失。

#### 4. 无线电通信在长征中经受严峻考验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在此之前，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于6月份突然与中革军委电台失掉了无线电联络，现在受敌重兵包围，又得不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上，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决定，二、六军团主力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作战略转移。

为得到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想方设法与党中央、中革军委恢复联络，为此，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后，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仍用原联络频率、呼号坚持守听与呼叫中革军委电台，但连续3个多月联络无效，直至9月29日，才与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总司令部电台沟通了联络。总司令部电台用的是中革军委原先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频率、呼号，因此，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便误认为与中革军委的电台恢复了联络，更不知道这时的总司令部正为张国焘所控制。

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络后，对二、六军团非

常关心。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即指示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设法与二、六军团恢复联络。1935年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还作出决定，要尽快地“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sup>①</sup>王诤、陈士吾等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和中央决议精神，亲自上机值班，细心寻找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的信号。

1936年1月27日，二、六军团进驻贵阳附近的龙里县。一天晚上12时左右，总指挥部电台由龙振彪值班，正与总司令部电台通报，当总司令部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的时候，中革军委电台插进来呼叫，因其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有变，引起了龙振彪的怀疑，便问：“你是何台？”中革军委电台是王诤上机，回答道：“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闫队长（闫知非）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闫知非上机后，双方约定了保持联络的办法。在以后的联络中，中革军委发来了一份明码电报，内容为：“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sup>②</sup>这份电报是周恩来（他曾化名为伍豪）发给任弼时的，说明原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留在了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同中革军委的联络虽已恢复，但由于没有密码本，不能正常通报。为此，

---

①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七辑第一册第2页。

② 引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第10页。

中央曾致电张国焘，让其把密码告诉中央与二、六军团，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用临时约定的简便密码告诉二、六军团：约定的密码不一定可靠，来往电报经由四方面军代转有利于红军团结，双方暂停联络。于是，二、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直接联络又告中断，双方来往电报，只好经由四方面军电台代转。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时经朱总司令批准，从四方面军要来了密码本；江文、闫知非在总司令部三局局长宋侃夫帮助下，解决了同中革军委联络用的频率、呼号。很快，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便同中革军委恢复了联络。沟通后，曾收到中革军委三份重要电报：一份是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辖二、六军团（称二、六军）和三十二军。另一份是中革军委发给任弼时亲译的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与一方面军会合，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三份电报规定了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主要内容是迫蒋抗日，紧密联合东北军，发展甘南根据地。由于及时得到中央指示，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最后，在党中央的再三敦促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尔后，两个方面军经过三个月的行军作战，至10月9日和22日，终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革军委与红二方面军（原

二、六军团) 在从失掉联络到恢复联络的过程中, 通信战士忠于职守, 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发挥通信联络的保障作用, 作出了重大贡献。

### 红四方面军积极开展无线电通信 和技术侦察, 为保障反“围攻”、 长征和西路军奋战作出贡献

1931年11月7日,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 下辖红四军(由原红一军和红十五军组成) 和红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 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 历经川陕根据地时期和转入长征之后, 逐步发展起来的。

#### 1. 无线电通信的创建

1931年10月, 党中央从上海派遣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到鄂豫皖苏区。他们利用商(城)潢(川)战役中缴获的收发报机, 在新集附近小潢河南面的钟家畈, 建立起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 并于1932年1至2月间, 先后与湘鄂西苏区、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沟通了无线电联络。与上海党中央虽未沟通, 但来往电报可经中央苏区代转。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 红四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苏家埠战役, 缴获无线电机5架, 电台人员金乃绍、马文波参加了红军; 这时, 自己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已培训出一批学员, 其中有游正刚、徐定

选、冯志禄等，于是又组建了第二部电台。这两部电台的创建不仅保障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对四方面军的战略指导，密切了鄂豫皖苏区和其他苏区的互相联系，同时，也为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经鄂北、豫西、陕南，于年底进入川北，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

## 2. 无线电侦察显露锋芒

川陕根据地的建立，使敌人大为震惊。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頌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令其乘红四方面军入川立足未稳之机，迅速组织围攻。2月中旬，敌38个团约6万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三路围攻。四方面军两部电台，除坚持完成通信联络任务外，以主要精力开展了无线电侦察和破译敌电的工作。宋侃夫、蔡威、王子纲、马文波等日夜侦听敌台，细心破译敌人密码，多次获取敌人情报。5月下旬，空山坝战斗打响之前，电台及时、准确地侦收到敌军的作战行动企图，总部遂决定集中主力打敌左纵队，并以部分兵力秘密穿插到敌人侧后，突然向敌发起猛攻。经过三天激战，敌左路13个团大部被歼，其余两路仓皇败退，我军乘胜猛追，取得了重大胜利。

敌三路围攻被粉碎后，乘敌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际，红四方面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从8月中旬到10月底，进行了仪（陇）南（部）、

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取得了新的胜利。其中的宣（汉）达（县）战役，在未发起之前，电台侦收到敌军兵力部署的电报，总指挥部决定以中间突破的战法，分左中右三路进攻敌人，先后攻占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歼敌 6 个团，俘敌旅长以下 4000 余人，缴枪 8000 余支。

敌遭我打击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又委任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纠集四川各路军阀部队 110 多个团约 20 余万人，于 11 月初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在反围攻作战中，宋侃夫、蔡威、王子纲等不顾疲劳，日夜侦收敌台电报，敌人每次大的军事行动，我军都一清二楚。后来，敌人发现其电报不断被我破译，就经常变换密码，单日双日不一样，上午下午不一样，一份电报前后不一样。这虽给破译工作带来了困难，但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敌人的密码还是不断地被破译出来。1934 年 1 月下旬快过阴历年的时候，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接到他太太电报，催其回万县过年，并料理私人家产财务。2 月上旬，王陵基秘密溜回万县。我军及时侦收到这一电报，遂乘机反攻，直捣王陵基总部。王陵基因此被刘湘软禁。又一次，敌军企图强攻我军笔架山阵地的电报，被我破译后，我军立即迂回包围了敌人，敌人在招架不住时，又在电台上用英语呼救。我军不失时机，在总部首长指挥下，一鼓作气，打了一场漂亮歼灭战，歼敌近 3 万人。1934 年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四方面军会合，调集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这时，红四方面军又主动地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为中央红军掌握敌情，打破敌人的堵截阴谋，起了积极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和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无线电通信有了较大发展。总部成立了电务处，由宋侃夫任处长，统管无线电通信、侦察和机要译电工作。电台数量由2部增加到5部，在方面军总部和各军之间建立了顺畅的无线电联络，开展了无线电侦察，有力地保障了作战指挥，为粉碎敌人的三路、六路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川陕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委的无线电通信，一直进行得比较顺利，为相互间经常交流情报，在军事上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22日至29日，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广昭战役。战役发起后，收到中央和军委1月22日来电，要求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转入川西”，根据中央来电，四方面军进行了陕南战投，为渡江创造战机。2月16日，中革军委又电告四方面军：“1月28日在土城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sup>①</sup>红四方面军接电后决定，强渡嘉陵江，密切注视中

---

<sup>①</sup>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396页。



央红军转战动向，伺机进行有力策应。3月28日至4月21日，四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然后即转入长征。

### 3. 传递中央指示，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

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会师。13日，张国焘电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我已有五团开懋，兄方主力可来懋”。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于8月组织左、右路军北上。为加强左路军的通信工作，中革军委曾对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和通信人员进行了较大调整，使四方面军的电台由5部增加到12部，通信保障能力明显增强。8月28日，又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名义“委任宋侃夫为总部第三局局长，伍永福（即伍云甫）为政委”<sup>①</sup>。以进一步加强对通信工作的领导。这样，左、右路军之间的通信联络更为密切，无线电通信畅通无阻，有效地保障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对左、右路军实施不间断的指挥。特别是在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时刻，能及时将中央的声音传递到四方面军，为最后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引导四方面军北上，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抵制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先后电令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部队扣留中央纵队，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要“彻底展开党内斗

<sup>①</sup> 引自《中央军委1935年历史档案汇编》第123页。

争”<sup>①</sup>，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不得不于9月10日凌晨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在当日到达阿西后，党中央立刻致电陈昌浩等，指出：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后前进。同日，中央还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右路军应立即北上……”与此同时，还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节节胜利，于10月20日到达陕北苏区。而张国焘率兵南下，则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同年11月百丈战斗后，红四方面军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份电讯，知道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歼敌一个师，打了一个大胜仗，经徐向前提议，出了捷报，消息传开，引

---

<sup>①</sup> 参见1937年3月中共中央“延安会议”第二项议程记录，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时的发言。

起巨大反响。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和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成了鲜明对照，不少同志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四方面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趋高涨。

尽管张国焘坚持南下，并另立“中央”，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中央仍通过无线电联络，不断发出电报，对他采取争取、团结和斗争的方针。1935年11月，林育英（张浩）从共产国际回国到达陕北，多次致电张国焘做争取工作。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在致张国焘电中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苏联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以后，经过党中央的一再说服和斗争；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这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 4. 与中央保持不间断联络，引导西路军余部安全抵达新疆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九军、五军3个军，共21000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沿甘肃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任务。党中央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

前为副主席。

为保障西路军的通信联络，当时随西路军行动的共有7部电台，分别配属在总指挥部及3个军的军部。西路军与中央、军委可进行无线电通信；西路军总指挥部与各军之间，以及各军相互之间，可保持密切联系。

西路军过河后，为了查明敌情，徐向前、陈昌浩指示负责通信联络的宋侃夫、王子纲，尽快把马家队伍的情况搞清楚。他们认真抓电台工作，除完成通信联络任务外，以主要精力侦收破译敌台电报。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很快破译了马家军的密码，掌握了甘北地区的全部敌情，包括兵力部署、行动时间、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为西路军首长提供了可靠情报。

在西进作战中，西路军同优势敌人进行了艰苦奋战，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1937年2月，党中央为援救西路军，以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林育英率领下，由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援西军与西路军之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系，保证了来往电报的及时传递。与此同时，宋侃夫等更注意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联络，保证西路军首长能及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并及时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

3月12日，西路军在危急情况下，致电中央军委：“西柳沟激战四天……到番地康龙寺……现全军不足三团”，“现全军决死斗待援”。中央军委主席团接电后于当日

(12日) 24时复电西路军：“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之目的。”3月14日，西路军到达石窝，处境更加困难，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根据上级指示，宋侃夫等忍痛除留下一部电台与中央和援西军保持联络外，将尚随队的其他电台砸烂或埋掉。在砸埋电台时，同志们想到这些电台来之不易，无不心情沉痛，泣不成声。3月23日，电台收到党中央来电，电称：现有部队可以向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

按照党中央指引的方向，部队向西进发，走到石包城后，西路军工委于4月16日17时给援西军“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发电，电称：“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息，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共产国际）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然后，又向西走到红柳园子。在这里遭敌骑兵包围，突围时，按照上级命令把最后一部电台砸毁埋掉了。4月底，余下的700多人到了星星峡。5月1日，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来3架飞机，送来了衣服和食品。几天后，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带了40辆汽车，将大家接至迪化。

随西路军7部电台的通信人员共30余人，到达新疆的只有10余人，他们是宋侃夫、王子纲、徐明德、刘寅、汪名震、荆振昌、贾善、郑执中、唐士吉、聂鑫、王玉衡等。这部分同志到达迪化后，遵照中央来电中关于“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于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学员20余人，于1938年

初，由刘寅带领，经兰州回到延安。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接着又办了第二期，又培训了一批学员，其中大部分于1939年回到延安。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2万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将永放光彩。随西路军行动的通信战士，一面行军作战，英勇杀敌；一面进行通信联络和无线电侦察，圆满地完成了肩负的光荣任务，为西路军最后突围到达新疆作出了贡献。

### 发展通信工作，积极准备 迎接抗日战争

为保障新形势下的作战指挥，和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军委三局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积极采取措施，发展通信工作，使通信保障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1.积极培训通信技术人员。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红军已办两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报务人员10余名。中央红军到后，训练班扩编为军委通信学校，担负全军报务人员的培训任务，由吴泽光任校长，曾三任政委。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通校办到第8期，共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84人，加上一、二、四方面军原有的112名机务、报务人员，共196人。这为抗日战争中开展通信工作在人员上做好了准备。

2.积极筹措通信器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过东

征、西征，缴获了6部电台。后来由于统战成功，到西安购买了大量电池和其他电料器材。上海地下党也给陕北运来了电台。到抗战爆发前，我军无线电台发展到34部，其中中央、军委直属电台5部，八路军总司令部电台3部，115师电台5部，120师电台4部，129师电台4部，留守兵团电台7部，其他7部。另外，随着有线电通信器材的增多，有线电通信也有了较快发展。这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迅速开赴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能够实施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创造了条件。

3.积极做好统战中的通信保障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为搞好统战中的通信联络，1936年7月3日，党中央进驻保安后，即先后派曾三、彭绍坤、申鸣鸿、吴希圣、梁茂成等去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处建立电台与中央联络；8月底，又派刘克东到西北军特务二团通信排任准尉见习排长，利用排里的电台同中央保持联络。西安台的联络对象，除党中央外，还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和陕南红军。此外，还同山东韩复榘的电台、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电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电台建立了联络。

4.积极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1934年10月，党中央设在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遭到敌人破坏，自此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11月），我党派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偕同报务员赵玉珍，带着电报密码，从苏

联回到陕北瓦窑堡。于是，党中央立刻把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2月17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决定尽快“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为实现中央政治局决议，军委三局专门成立了无线电十一分队，由赵玉珍任分队长，殷金荣、廖辉、邓光洪先后任机务员，俞占鳌任报务员，使用劳山战斗中歼敌一一〇师时缴获的50瓦电台，在年底至1936年1月之间的一个夜晚，和共产国际沟通了联络，并收到一份来报。我党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之久的无线电联络得到了恢复。

1936年6月下旬，党中央转移至保安。无线电十一分队将电台架在城郊西北山边的一个窑洞里，继续同共产国际联络。此时，电台因缺油发电，同共产国际有中断联络的可能。为此，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4日电告彭德怀并转杨至诚、萧劲光，命令杨至诚“即组织一批运输队迅速到曲子将汽油运回吴起镇保存”，命令萧劲光“应即刻抽一批骡马到曲子先运回四十瓶汽油来保安保证与国际通电不中断。”这一生动事例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亲自过问电台的用油问题，对电台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7月2日，洛甫致博古电中提到“国际电台已畅通”，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亲切关怀的结果。

1937年1月中旬，无线电十一分队随党中央迁至延安，电台架在宝塔山下的一个窑洞里。他们先用汽油引擎带动马达发电，后改用“霍姆莱特”充电机，一直同共产国



际台保持着顺畅联络。

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意义十分重大，它对密切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席杰整理)

# 陕甘宁边区文艺概观

苏一平 艾克恩

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是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中国文艺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同其他各个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一样，都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强盛的新中国而斗争。他们不负于时代的要求和党的重托，开创了一个革命文艺的新纪元。今天，记述这段光辉历程，展示这些丰富经验，无论对继承延安文艺传统，发扬延安精神，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均会得益甚多。

##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烽火四起，大批爱国热血青年，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纷纷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追

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但是，“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在未和新的群众结合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保留旧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甚而一言一行都和群众“格格不入”。毛泽东同志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认为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首先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还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艺术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艺术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16日，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盛况，说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

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者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会上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否认世界观转变、不写歌功颂德文章等看法，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毛主席接着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主席针对大会提出

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明确地阐明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在“结合”过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唯其如此，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唯其如此，才能开掘“矿藏”，深挖“源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毛主席指出：通过这次座谈会，同志们会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百余人合影留念。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团结胜利的文坛盛会。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编者按语指出：“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艺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

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重要材料，要普遍宣传。”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界从此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讲话》的热潮。11月21日，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说，自《讲话》发表和中宣部指示下达后，文艺界作了很大努力。今后的任务是到实际工作中学习，认真贯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会议决定：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到绥德分区；边区文协的民众剧团到关中分区；西北文工团到陇东分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学校剧团到三边分区；延安平剧研究院到延属各县。11月27日，西北局召开会议，欢送各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陈正人、统战部长贾拓夫、秘书长杨清相继讲话。柯仲平代表各剧团作了发言。

随之，剧团人员英姿飒爽、豪情满怀，浩浩荡荡地奔赴陕甘宁边区各地。这预示着《讲话》即将迎来文艺的春天。

## 二、边区的文艺社团

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边区的各种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首先，作为边区文化运动领导机构的各种文艺协会相继建立。

中国文艺协会是陕北苏区成立的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徐梦秋、洪水、危拱之等 34 人，1936 年 11 月 22 日在陕北保安县举行成立大会，李伯钊主持会议，丁玲报告筹备经过。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相继讲话，毛主席对协会评价很高，称赞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协会纲领提出：“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使其“成为革命文艺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大会推选丁玲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长，徐梦秋为总务部长，李伯钊为俱乐部主任，洪水为图书馆主任。从此，陕北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的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 年 11 月 24 日，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

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艺团体。该会为全国文协的一个分会。最初由艾思奇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后由吴玉章任主任，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任副主任。其间赵伯平也任过一段主任。1942年以后由柯仲平任主任。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1940年1月，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明、洛甫、吴玉章、罗迈、杨松、李初梨、陈康白、饶正锡、萧向荣、萧三、丁玲、柯仲平、杨醉乡、高波等分别讲话。毛泽东抱病向大会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报告。1944年10月11日，边区文协和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联合召开边区文教会议，历时一个月。朱德、吴玉章、徐特立以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大会还作出《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等。

与“边区文协”并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成立于1939年5月14日。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艾思奇、柯仲平、马健翎等为理事，周扬、萧三、沙可夫、柯仲平等为常务理事。丁玲



曾任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延安文抗”更名为“延安文协”。它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

陕甘宁边区其他专业性的协会，虽属边区文协领导，但它们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计有：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以及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这些协会活动的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这里仅就戏剧、音乐、美术、电影、杂技等若干主要艺术团体作一概述。

#### 戏剧团体

人民抗日剧社与抗战剧团。人民抗日剧社的前身是工农剧社，主要负责人有危拱之、刘保林、杨醉乡、温涛、黄植等。先后在保安、安塞、吴起镇、定边、盐池等地演出《亡国恨》、《侵略》、《丰收舞》等节目。1937年3月7日，在该社基础上成立人民抗日总剧社，中央剧团、平凡剧团、青年剧团统归总剧社领导。同年夏，他们同中央、平凡、战号三剧团合演《阿Q正传》，演出十分成功。1937年8月，人民抗日总剧社更名为抗战剧团，叶石任主任，杨醉乡、李柯任副主任。杨醉乡曾荣获“群众文艺的先驱”奖状。该团活跃在绥德、云阳、三原、富平、韩城等地，也远去西安、山西等地。影响大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消灭汉奸》等。1942年3月，边区文协决定以抗战剧团为基础，创办边区地方艺术干部

学校（简称“边艺”）。

西北战地服务团。它是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的一支文艺劲旅。1938年8月12日于延安成立。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被毛主席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不仅写剧本《重逢》、《河内一郎》，还登台演戏，被传为佳话。毛主席对西战团十分重视，在欢送晚会上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件大工作”，希望出去“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西战团一行40多人，途经山西临汾、太原等地，转程西安，为军民演出秦腔、京剧、大鼓、相声、快板、话剧等多种节目。1938年7月返延。稍事休整后，西战团又在新任团长周巍峙率领下，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直至1944年5月底返回延安，历时五年半。

部队艺术团体。主要有烽火剧团、边保剧团、联政宣传队。烽火剧团全称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队，简称“留政宣传队”，对外称烽火剧团，于1937年10月成立。蔺子安任大队长，后高波任团长。活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等地。1939年开赴河防前线，进行战地宣传。同年8月，改为烽火剧社总社，将各部队原有宣传队改为分社或支社。陈明接任总社主任。1941年4月10日，该社与鲁艺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部队艺术学校”。边保剧团全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剧团，成立于1939年8月。它以宣传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为己任。联政宣传队全称为陕甘宁晋绥边区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

队，成立于1943年11月1日。由联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兼任队长。侧重为兵服务，强调写兵、演兵、为兵演出。演出剧目不少，如《刘顺清》、《强治国》、《徐海永锄奸》、《沁源围困》等。曾获得“先进集体”奖，并受到多次表彰。

陕甘宁边区文协领导的三个艺术团体：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杂技团，都是以扎根民间、服务于群众而著称。民众剧团成立于1938年7月4日，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贺龙曾捐赠经费和战利品，柯仲平写的团歌表达了该团的宗旨：“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他们演出的《十二把镰刀》，成为秧歌运动的先声；演出的《血泪仇》、《穷人恨》，更是影响甚大，风靡一时。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该团被授予“特等奖旗”，剧作家马健翎被评为“特等模范”，荣获“特等奖状”和“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进驻西安后，该团扩展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北文工团成立于1940年9月1日，原称陕北公学文工队，队长王亚凡，副队长彦军，指导员苏一平。1941年9月1日，该团改称西北文工团，团长苏一平，副团长朱丹、白依。1943年5月4日，该团与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杂技团合并，团长为边艺校长张季纯。抗战胜利后，团长一直是苏一平，副团长林丰，秘书长方杰，党支书裴然。该团主要演出自己创作的秧歌剧和歌剧，如《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红鞋女妖精》、《睁眼瞎子》、《回娘家》、《选好人》、《边境上》、《打

斑蝥》、《红布条》、《红土岗》、《二媳妇纺线》、《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等。1948年绥德文工团合并到西北文工团，编为一、二两团。进驻西安后，组成西北人民歌舞剧院。延安杂技团成立于1941年4月20日。团长王地子，副团长宗池、石畅，教练张金奎。宗旨是：锻炼体格，启发智力，调剂生活。逢年过节演出甚多。1943年并入西北文工团。

延安平剧研究院。它是平剧改革的重要阵地。1942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属贺龙管辖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领导。第一任正副院长由康生、邓洁兼任；第二任正副院长由张经武、柯仲平兼任；第三任院长由刘芝明兼任；最后专职正副院长为杨绍萱、罗合如。在祝贺该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该院演出影响最大的戏是任桂林、魏晨旭、李伦改编的《三打祝家庄》。毛主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1947年撤离延安后，移居张家口，改为华北平剧研究院。建国后，组成北京京剧团。

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它是1941年9月下旬成立的，属中央青委领导。其宗旨是：“积极发展剧场艺术，掌握中国典型的戏剧，介绍世界名剧及理论，在奠定中国的民族的演剧艺术中，尽一份力量。”院长塞克，副院长王真、吴雪，党支书高沂。演出的第一个戏是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还演出过《铁甲列车》、《伪君子》、《刘家父子》、《抓壮丁》等。1943年12月与部队艺术学校合并，组成

联政宣传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剧团，成立有早有晚，活动有多有少，但都有一定影响。如1937年3月7日归并到人民抗日总剧社的原苏区老剧团中央剧团；1938年8月1日成立的鲁艺实验剧团；1940年4月5日成立的鲁艺平剧团；1940年4月成立的、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中央青委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以及陕甘宁边区所属各分区的绥德分区文工团、三边分区文工团、陇东剧团、关中剧团、八一剧团等。

### 音乐团体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它是音乐团体中影响最大的，于1939年3月5日在延安鲁艺成立。会长吕骥，会员达110多人。会刊为《民间音乐研究》。在八年抗战中，采集出版了10种研究资料。

延安合唱团。它是延安音乐爱好者的业余组织，1940年9月27日成立，属文化俱乐部领导，时乐濛任团长。1941年8月，参加者扩展到25个单位，成立了合唱团第二团。每星期天活动，对普及群众音乐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鲁艺音乐工作团。于1940年7月15日成立。团长由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兼任，后由冼星海兼任。他们曾开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安塞等地做音乐普及工作，深得群众欢迎。

延安业余国乐社。它是由20多位国乐爱好者组成的，负责人李鹰航。1942年6月27日成立，属边区音协

和文化俱乐部领导。他们自带二胡、三弦、秦琴、笙、箫、笛子进行练习与演奏。隔一段时间到文化沟艺术台公演一次。

中央管弦乐团。它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大型乐团。团员 70 多人。属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文工室领导。主任邓洁，副主任李伯钊、刘仰桥。团长贺绿汀，副团长张贞麒、金紫光。下设组织科（孟波）、行政科（卢肃）、教务科（梁寒光）、弦乐队（陆地）、管乐队（湛亚选）、合唱队（贺绿汀代）。指挥李德伦。1946 年 7 月 19 日举行成立大会，朱德、徐特立、王明、陈伯达、何思敬、张季纯等出席了会议。邓洁致开幕词后，朱总司令、徐老、李伯钊相继讲话。该团堪称为延安最正规、最有气魄的音乐演出团体。由孔厥、袁静创作、梁寒光、金紫光谱曲的大型歌剧《蓝花花》演出后，引起重视。

### 美术团体

边区文协新洋片组是美术团体中最活跃的一个。他们从 1944 年至 1948 年间一直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城镇乡村，群众赠送锦旗，称为“群众喉舌”、“普及教育”。画家石鲁、李梓盛、张明坦自始至终出了大力。1949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们应邀演出新洋片，获得好评。鲁艺内部还有三个美术组织：一是，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任团长；二是鲁艺漫画研究会，华君武任负责人；三是鲁艺美术工场，先后由江丰、钟敬之、华君武负责。此外，延安美术工作者自愿结合，组成大众美术研究社，编辑出版《大众美术》墙报和举办美术作品展览。

1942年2月1日成立的延安D·H·孚版画研究社，由刘岷、辛可、蜚生负责，目的是“团结版画爱好者，介绍中欧版画，相互研究版画技术”。

电影工作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完全是靠自己动手，白手起家的。从四个电影团体的演变看，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1938年4月1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是最早的一个电影团体。高朗山为主任，赵品三为副主任，徐肖冰为技术部长，沙可夫为技术顾问，康生为政治顾问。该社系电影初创阶段，拍摄不少抗战素材和边区生活照片。1938年9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全称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直属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领导。他们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纪录片。1942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被誉为“纪录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1945年拍摄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成为唯一的历史文献资料。抗战胜利后，该团多数人奔赴东北，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7月。习仲勋、陈伯达、安子文、李伯钊、江青等组成董事会，习仲勋任董事长。陈永清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凌子风编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因故停拍。解放战争中，他们拍摄了14部纪录片，真实纪录了西北战场的动人场面，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的工作情景，颇有史料价值。1947年10月在西北局领导下成立了西北电影工学队，钟敬之任队长，成荫任党支书。为电影事业培养了一

批骨干力量。

为了培养艺术工作干部，边区还设立了艺术院校。除业余的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艺学院外，属专业的正规的学校有三所。其中创建最早、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4月10日成立于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名发出《成立缘起》，称这所综合性艺术学院的宗旨是“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开始设有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渣）三系。沙可夫任副院长兼教务主任（后为赵毅敏），徐以新任训育主任，魏克多任秘书长。第二届招生，增设文学系，周扬兼系主任。另创办普通班、前干班、干部班、地干班。1939年5月，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宋侃夫为政治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为加强艺术实践先后成立木刻研究班、实验剧团、漫画研究会、美术工场、平剧团、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俱乐部、美术供应社等。还组织了宣传队、秧歌队、访问团、工作团，并出版了《草叶》校刊。学院设有必修、专修、选修三种课程。教员多为名家：萧军、何其芳、周立皮、沙汀、严文井、陈荒煤、舒群、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麦新、周巍峙、李焕之、何士德、杜矢甲、孟波、吴晓邦、塞克、张庚、王滨、田方、姚时晓、钟敬之、张水华、袁文殊、舒强、王大化、凌子风、江丰、蔡若虹、沃渣、王曼硕、张汀、古元、王朝闻、华君武、胡蛮、彦涵、罗工柳、刘岷等。茅盾曾来校讲授“中国市民文学”课。罗迈（李维



汉)作过教育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鲁艺创建周年纪念会上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院两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又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来校作重要报告，号召学员从“小鲁艺”走到群众的“大鲁艺”中去。鲁艺八年来，共招收五届学生，培养人才685名。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

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简称“边艺”。1942年5月1日成立。属边区文协领导。柯仲平为校长，张季纯为副校长，程秀山为教务主任，杨柳为党支部书记。学员主要是抗战剧团的一群娃娃，分甲乙两班，文化课和艺术课各半。1943年5月，并入西北文工团。

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全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1941年4月1日成立。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兼任校长，王震之任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史行、晏甬任教务处副主任。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和一个培养演员的普通班。翌年，延安、陇东、富县设立三个分校。4月10日，部艺在鲁艺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朱总司令讲话指出：“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方法要艺术。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的生活与宣传的才能。”谭政、萧劲光、周扬、吕骥也相继讲话。该校曾演出《怪吝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剧。1943年冬，与青艺合并，改为“联政宣传队”，属边区联防司令部政治部领导。

### 三、边区的文艺运动

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创建了第一个剧团——列宁剧团，后改称西北工农剧社——人民抗日剧社——中央剧团。他们继承了中央苏区革命文艺传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徐特立、吴亮平先后负责领导，长征女干部危拱之担任主任。成仿吾、冯雪峰编写剧本。美国朋友斯诺观赏了该团演出的短剧《侵略》、《丰收舞》、《统一战线舞》以及《红色机器舞》后，说它们都表现了两个中心主题，即“抗日和革命”。他认为“演出生气勃勃，幽然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中央剧团改为抗战剧团后，杨醉乡任团长。这位“杨妈妈”带领一帮娃娃竟能演出《送哥哥当红军》、《亡国恨》、《上前线》、《死亡线上》、《送公粮》、《打回老家去》、《梦游北平》、《锄头舞》、《叮铃舞》、《海陆空军舞》等几十个节目。他们不仅踏遍陕甘宁边区 23 个县的偏僻山村，而且冒着风险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临潼、渭南、大荔、富平、蒲城、合阳、淳化、旬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在陕北苏区文艺活动中，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负责人廖承志、朱光被誉为出色的演员。廖承志在日本名剧《炭矿夫》中饰老矿工，朱光饰儿子，邓颖超和史沫特莱的译员王汝梅（黄华）各饰一个角色。演出获得“非常满意的效果”。接着又排演了反映西班牙工人斗争的《秘密》一剧，廖承志饰警长，朱光饰工人，王玉清饰半疯工人，王

汝梅、黄植各饰一个警察。毛泽东、朱德、博古高兴地看了演出。毛泽东还对廖承志讲：你们好好的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戏出来，让我们可以多看好几个好戏。

红军初到陕北，带来的是江西苏区革命性、战斗性很强的战火文艺——零星的分散的以小型歌舞和短剧为主的匕首和投枪。而抗战爆发之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大城市亭子间涌进黄土高原的贫瘠山沟里，他们带来的自然是他们所熟悉所掌握所习惯的大城市那些剧目。所以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竞相上演大戏。这些戏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如鲁艺的《日出》，青艺的《雷雨》、《上海屋檐下》，西北文工团的《蜕变》、《北京人》等；二类是仅映战争生活的，如部艺的《李秀成之死》，鲁艺的《扬子江暴风雨》、《太平天国》，青艺的《塞上风云》，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的《八百壮士》等；三类是古典戏曲，如鲁艺的《宋江》，战斗剧社的《嵩山星火》，平剧院的《梁红玉》、《岳飞》等；第四类是移植外国的，如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包哥廷的《带枪的人》，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等等。上演这些大戏，无论对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开扩眼界，提高鉴赏能力，丰富演员的表演技能，沟通文化交流，都是很有益处的。尤其那些反映十月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戏剧，更富有直接的鼓舞教育作用。

不过，总观当时的延安舞台，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的偏向。边区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很少，直接反映边区群众斗争生活的更少。只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大批文艺工作者（有的跟随剧团）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走进工厂，下到连队，短短几年内，迎来了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空前繁荣。

### 戏剧方面

首屈一指的是大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兄妹开荒》，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毛主席说：“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的重任。首演周而复、苏一平编写的秧歌剧《牛永贵挂彩》，一炮打响，影响甚大。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刘顺清》、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写的《红布条》、张季纯写的《保卫和平》、杨醉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的《边境上》、萧汀、方杰写的《回娘家》等等，各具特色，争芳斗艳。据统计，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就有400多出。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艺界有35名获奖者：艾青、杨绍萱、吴印咸、齐燕铭、陈波

儿、古元、王大化、张水华、周巍峙、钟敬之、欧阳山尊、吴雪、姚仲明、周而复、柯蓝、史雷、黄俊耀、贺敬之等。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当时，不仅陕甘宁边区秧歌声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歌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兴奋地讲：“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随着大秧歌运动的深化而崛起，如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史行、金紫光的《反抗的吼声》，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马渠游击小组》、《周子山》等等。《白毛女》以民间故事为基础，以民歌、戏曲为基调，突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在剧作、音乐、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为《白毛女》问世，鲁艺投入众多名家：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王大化、舒强导演；王昆、林白、张守维、邸力、赵起扬、李百万、陈强、李波、王家乙、韩冰、吴坚、张成中、杜德夫等饰演。1945年6月10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毛主席和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黄世仁应该枪毙；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并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

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果真不出所料，《白毛女》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刘胡兰》、《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歌剧也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无论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土改的农村，到处响彻“为喜儿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呼声。郭沫若在为《白毛女》作序时盛赞：它“相当成功”，“非常感动人”，“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

陕甘宁边区的戏曲改革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毛泽东同志1942年10月间给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推陈出新”，始终是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平剧院最初演出的多是反映抗日内容的新剧曲，如《松花江》、《松林恨》、《钱守常》、《夜袭》、《学不够》、《小过年》等。后又推出《上天堂》、《难民曲》、《回头是岸》、《边区自卫军》、《鬼变人》等。同时选演了大量传统戏曲剧目，如《群英会》、《四进士》、《玉堂春》、《四郎探母》、《法门寺》、《十三妹》、《珠廉寨》、《打渔杀家》、《宇宙锋》、《宝莲灯》、《辕门斩子》、《黄鹤楼》、《捉放曹》、《鱼腹山》等等。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中央党校编演的《逼上梁山》，毛主席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赞誉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不久，延安平剧研究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

再次赢得了声誉。毛主席写信称赞“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另外，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以陕西特有的秦腔剧种，创作出不少新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血泪仇》和《穷人恨》。王震将军在给剧作家马健翎信中说：“我很久想给你写信，因为《血泪仇》和《穷人恨》的演出，前后我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它“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彭德怀司令员在新区洛川冒雨同军民一起看了《穷人恨》，写信说：“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

话剧艺术要搬上延安舞台，条件是相当困难的。无论服装、道具、布景和观众的欣赏水平均受到很大限制。但令人惊喜的是，从1937年至1949年的十多年间，延安上演的225个剧目中，话剧就有135个，占总数的60%。可见戏剧工作者是作了极大的努力。早在1937年12月，沙可夫等人就编导了《广州暴动》，受到好评。接着朱光、左明等人编导了《血祭上海》，并由此引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之后，多幕剧、独幕剧接踵而来，有《大丹河》、《流寇队长》、《秋瑾》、《一心堂》、《一年间》、《打虎沟》、《棋局未终》、《闲话江南》、《先锋》等。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出许多新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青年艺术剧院的《刘家父

子》、《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我们的指挥部》、《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等。毛泽东同志看了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虎列拉》、《求雨》、《自家人认自家人》三个独幕剧后，亲笔写信鼓励说：“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这类好戏。”周恩来同志看了《同志，你走错了路》和编导者的有关文章后，立即对作者和导演说：“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印刷前，得到一读的机会。”该剧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几乎轰动了整个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苏联话剧《前线》的上演，是毛主席推荐的，《解放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并登出全剧，起到了特殊的教育作用。

### 音乐方面

冼星海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指出：“边区音乐运动成了全国的中心……大部分参加救亡运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也都集中在边区。”是的，这里荟萃的全国著名音乐家甚多，如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马可、麦新、张寒晖、李劫夫、王莘、周巍峙、孟波、时乐濛、安波、金紫光、刘炽、向隅、任虹、李伟、李凌、李鹰航、杜矢甲、彦克、梁寒光、卢肃、瞿维、李德伦、谌亚选等等。在边区文协领导的西北文工团和后来的二团中有关鹤岩（关键）、岳松、彦军、



刘烽、姜丽山、高田、航海、王元方（梅丝）、曾刚、季作桂、马倬、王焱、梁文达等有成就的作曲家。边区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甚广，象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象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等等。特别可喜的是：许多领导同志和著名诗人主动与音乐家合作，象萧向荣与李鹰航合写的《歌唱共产党》，胡乔木与冼星海合写的《青训班之歌》，冯文彬与吕骥合写的《“五四”纪念歌》，成仿吾与吕骥合写的《陕北校歌》，沙可夫与吕骥合写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艾青与张棣昌合写的《留守兵团军歌》，萧三与冼星海合写的《抗战剧团团歌》，公木与郑律成合写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由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塞克与冼星海合写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茅盾讲，听了《黄河大合唱》，“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感动”。萧三甚至觉得，听了《黄河大合唱》简直对星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的气魄是如何的大呀！他的才能是如何的高呀！他的创造力是如何的丰富呀！

## 美术方面

陕甘宁边区的美术工作，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彩色，没有工具，缺乏纸张。但出于满腔热情服务于群众的决心，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创造出各种版画、漫画、油画、年画、连环画、雕塑、剪纸等作品，张贴在墙壁上，贴在农家炕头上，陈列在展览会上，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用于“拉洋片”。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处处可见新颖美观的彩画。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翻身解放、自力更生、男耕女织、支援前线的喜人景象。

在边区 160 多位美术家中，古元、力群、彦涵、刘岷、张映雪、夏风、杨廷滨、马达的版画，华君武、张谔、钟灵、蔡若虹、张仃、朱丹的漫画，王式廓、庄言、邹雅、胡蛮、莫朴的油画、素描、速写，王朝闻、王曼硕、许珂、钟敬之的雕塑，胡一川、罗工柳、沃渣、江丰、施展、李少言的年画、剪纸，石鲁、李梓盛、张明坦、程士铭、杨青、吴劳的连环画和洋片，均得到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装点了陕甘宁边区的锦绣河山，显得更加绚丽多彩，气象万千。

延安和边区一些主要城镇，经常举办美术展览。1942 年春节，边区美协举办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展，反映强烈，盛况空前。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参观，并予以表扬，勉以努力。据报道：展览展出大小 60 余幅作品，观众“拥拥挤挤，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边区的美术作品，以它新颖的内容、独特的

风格和民间的形式，赢得广泛的好评。美术大师徐悲鸿十分赏识古元的木刻，称古元是“卓绝之天才”，“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版画界的“巨星”。叶浅予说：古元“不愧为创造木刻新风派的第一个人”。重庆许多知名人士同样对画展赞不绝口。在画展题字本上，邵力子题：“拓荒的精神，建设的表现。”李德全题：“只有真正解放，才能使人民如此活跃起来！”陶行知题：“主人做了主，公仆都为公。”曹禺题：“看过这次展览会，我深感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逐渐显出自己的伟大力量。”

### 文学创作方面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毛泽东同志 1939 年给诗人萧三信中提出的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创作，也适用于文学创作。

人们常说，诗歌是匕首，是投枪，是号角。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量诗作，正无愧于这一美誉。萧三说得好：“延安的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风。”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文协的“战歌社”，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打出“街头诗运动日”的红幅，发布《街头诗运动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啊，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攻边区》，高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张季纯的《给

我一支枪》等街头诗，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对敌斗争生活。“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哪个能够再忍让！”多么富有战斗性、鼓动性。王汶石为此撰文《谈开展群众街头诗画工作》，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功绩、作用和意义。

在边区的诗歌明珠中，狂飚诗人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可谓是陕甘宁边区最早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毛主席在清凉山听了柯仲平朗诵的《边区自卫军》后，甚为高兴，当即批示“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不久即刊登在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萧三曾这样赞誉道：“延安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同志，他是朗诵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在长篇叙事诗中，还有从三边小山沟里崛起的新秀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它一问世，就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陆定一撰文称它“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郭沫若在为它写的序言中赞道：“《王贵与李香香》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孙犁誉它是“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并赞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除诗歌外，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也都是极好的斗争武器，边区作家们充分运用各种文学形式，发挥战斗作用。

报告文学是一种轻便灵活、真实感人的艺术武器，难

怪有那么多名家在这方面尽力施展自己的才能。如茅盾写《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写《朱总司令的话》，丁玲写《彭德怀速写》，周立波写《王震将军记》，荒煤写《刘伯承将军会见记》，萧三写《续范亭先生》，周而复写《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廖承志写《遥献》，杨成武写《一个胜利战斗的回忆》，王向立写《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沙汀写《随军散记》，黄钢写《我看见了八路军》，陈学昭写《延安访问记》，柳青写《空袭延安的二日》，范长江写《陕北之行》，黄炎培写《延安五日记》，赵超构写《延安一月》等等。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盛大劳模会上，众多作家挥毫放怀赞颂新的英雄人物。1944年6月间，《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和欧阳山尊的《田保霖》与刘建章的《活在新社会里》之后，毛主席当即写信勉励：“你们的文章引得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之后，毛主席又在一次高干会上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在长篇小说中，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是获得高度评价、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这也是实践毛主席指引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得来的丰硕成果。柳青是典型的“陕北人”，一口陕北腔，一身陕北装，象“农村后生”，又象“区乡干部”。1943年之后，他在米脂县乡里担任三年乡文书工作，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任务，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具备了在“困难中

微笑的品质”。所以他把全部的爱倾注在《种谷记》里以王加扶为代表的先进贫苦农民身上，赞颂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互相合作的非凡事业。在《铜墙铁壁》中，他描写了以米脂沙家店粮站为中心的护粮斗争，歌颂了石得富等人的英雄业绩。整个小说真实、感人，十足的乡土气息，形象地体现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一真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写了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所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武力较量及其赢得的辉煌胜利。冯雪峰曾给小说以高度的评价，赞它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

民间说书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的陕北“说书组”，在边区文协安波、陈明、林山的扶植和帮助下，自编自演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他们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主席、朱总司令听了说书，甚为赞赏。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还给予热情款待和物质奖励。陕北说书，是民间最为活跃、最为普及的一种艺术形式，韩起祥率先编写和说唱新书，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深得文艺界的重视和赞誉。

为了反映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边区的出版事业也很兴旺发达，仅发行的文艺期刊就有24种。计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和《中国文艺》，萧三主编、方纪编辑

的《大众文艺》，艾青主编的《诗刊》，萧三、高敏夫先后主编的《新诗歌》，奚定怀、徐明等编辑的《山脉诗歌》，刘白羽主编的《文艺突击》，艾思奇主编、林默涵编辑的《中国文化》，丁玲、艾青、舒群、萧军合编的《谷雨》，萧军、舒群、刘雪苇主编的《文艺月报》，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合编的《草叶》，周文、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和《群众文艺》，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还有《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乐》、《部队歌曲》、《音乐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其中1/3的刊名是由毛泽东题签的，他还就如何办好刊物发表过具体意见。此外，《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以及《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报刊，也经常辟有文艺专栏或发表文艺作品。

总览延安文艺的成就，不禁使人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成果宣传出去”，要使“文艺工作服从于党的总任务”。延安文艺运动虽然已成为过去，但不管它的成功经验还是它的某些不足，都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

## 回民支队

魏 福 凯

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在我党领导下发展成长起来的一支民族抗日武装。是冀中地区八路军野战化较早的一支部队。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鲁、豫广大敌后战场，进行了500余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寇敌伪顽叛和地主武装近2万余人，在抗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回民支队的发展和成长，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是我党团结少数民族武装抗日的一面鲜红的旗帜。也是回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 一、回民支队的建立

1937年9月，河北省委（当时书记是鲁贲）任命萧秉钧（地下党员）为抗日义勇军第九支队长兼政委，在冀中西部地区定县、安国一带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为了便于在回民同胞中开展工作，萧秉钧动员在当地回民中有一定



影响、同情我党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刘文正，在这一带回民村庄组织回民抗日武装（遂即吸收刘文正为中共党员）。广大回族同胞热烈响应，到10月份已组织起二、三百人。当时称为“回民队”，这时萧秉钧奉命到冀西三分区向王平同志汇报，分区决定把这支回民武装同其他群众武装一起，调往冀西补充八路军主力兵团。

由于对回民的生活习惯考虑不周（冀西没有回民聚居区），萧秉钧、刘文正虽经极大努力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但终究只有马永恩等十二三个觉悟较高的抗日积极分子，自愿随刘文正到冀西去。其余仍留在冀中地区，划归当时驻扎在安国县伍仁桥镇的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由唐朴农领导。

1937年底，鲁贲、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根据晋察冀党组织决定，回冀中开辟工作时，决定把这支回民抗日武装掌握起来，在此基础上开展回民工作。当时这支武装只剩下80多人。经过初步整顿之后，命名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萧秉钧任政治主任，刘文正任副主任，马永恩任队长。

这支回民抗日武装建立之初，遇到了许多困难。当时冀中的斗争形势很复杂。敌人利用宗教迷信，破坏我发动回民同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成立了回教总会，各地有回民的城镇，也成立了回教分会或支会。这个伪组织，收买回奸、土匪，破坏抗日，利用宗教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妄图瓦解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力量。他们暗中煽动回族战士说：“萧秉钧是有名的共产党，跟他在一起就赤化

了”，“赤化就是反教”。“刘文正跟着共产党跑是出卖回教”，等等。萧秉钧、刘文正、马永恩等同志，经过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终于争取团结了广大战士干部，各班、排自动组织了“宣传组”、“纪律遵守组”、“学习组”等。这些组织，逐步扩大成为班、排、连以至“干部教导队”的群众性组织。战士们主动提出了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打骂士兵，反对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回汉关系等口号。为了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还请了刀儿师傅，在部队负责屠宰牛羊、主办回族战士牺牲后的丧葬事宜。经过整顿教育，调整领导干部，巩固了党对这支回民抗日武装的领导，战士情绪很高，各地回民群众闻讯纷纷前来要求参加这支队伍，到1938年春，由80余人又恢复发展到二三百人。

萧秉钧、刘文正很关心这支回民武装的党的建设。他们首先发展了白灏、李梯云、刘世昌等几个青年学生为秘密党员，以这些同志为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这支民族抗日武装的领导。

1938年三四月份，萧秉钧、刘文正奉命率领“回民干部教导队”从定县出发，到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部驻地安平县皇城村整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非常关心这支民族武装的发展和成长，亲自给这支年轻的部队上课，讲解我党我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抗战救国的方针、任务、政策，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经过短暂的学习训练，这支由回民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民族抗日武装，开始

具有了八路军的雏形，同时也为进行组织整顿，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安平整训期间，在刘文正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一举夺回被土匪占领了的距安平县城仅 30 里的子文镇。歼灭土匪 500 余人。首战告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大大鼓舞了这支年轻民族抗日武装的战斗士气。

1938 年五六月份马本斋在孟庆山（晋察冀军区派到冀中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的老红军）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协助下，在献县 48 村组织起了联庄会（武装保卫家乡的群众组织）。刘文正到献县后，首先与马本斋取得联系，宣传我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武装抗日的道理，动员马本斋与八路军合作抗日。

马本斋在旧军队中当过团长，是当地群众中很有威望的抗日积极分子。为人朴实正直，他很快接受了党的主张，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他的带动下，回民同胞踊跃参军，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冀中军区把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命名为“回民教导队”，任命马本斋为队长，刘文正为政治部主任。

1938 年六七月份，“回民干部教导队”和“回民教导队”奉命集中到河间县城内进行整编。这两支部队合编后共有七八百人，命名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杨铁城（汉族）和丁铁石（回族）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大队。以原回民干部教导队为基础编成第一大队，马永恩任大队长；以原回民教导队为基础编成第二大队，马永标任大队长。这次合并整顿，为回民支队的正式建立打

下了基础。

整编后，回民教导总队转移到河间城东沙河桥镇整训。这时，萧秉钧已调往河北游击军政治部，刘文正也调到冀中区回民抗日建国会工作。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者是马本斋和丁铁石。

丁铁石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首先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组织了青年训练班，训练青年积极分子，在训练当中积极发展党员。这些党员回到连队之后，负责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到1938年底，各连队已建立起党的支部。同时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全体指战员中系统地进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坚定干部战士抗战必胜的信心。丁铁石也很注意在政治思想上帮助马本斋。马本斋在军区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政治上进步很快，1939年初，根据冀中军区党委的指示，经丁铁石和刘世昌介绍，马本斋成为我党特别党员。通过这些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为过渡到正规的野战军，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日军转向敌后，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清乡扫荡，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半年时间之内，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扫荡，侵占了冀中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和一部分村镇。冀中军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展开了紧张的反扫荡。“回民教导总队”，遵照冀中军区的指示，在河间、献县、青县、

沧县一带活动。他们在反扫荡中，继续整训和扩大部队，并与当地军民密切配合，打击侵犯骚扰我根据地的敌特和地主土匪武装。

1939年3月，回民教导总队配合一二〇师第一支队杨嘉瑞同志所部，在交河县大小徘徊村一带歼灭了国民党六路军保安二旅、三旅约六七百人。缴获步枪六七百支，战马二三百匹，大大补充了部队的武器和装备。加上金民、杨杰一扩大的新兵一团，部队发展到一千四五百人。当地的许多汉族青年，也参加了这支民族抗日武装。

1939年5月，回民教导总队奉命到定县、无极、藁城、新乐一带活动。丁坚在定县一带也扩大了两个营，编为新兵二团。这时部队已达到2000多人。

1939年秋，冀中军区部队普遍进行了整军，根据斗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在各战斗团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1939年九月份，遵照冀中军区决定，将原来回民教导总队的名称，改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军区选派红军老干部郭陆顺任政治委员，丁铁石任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还先后派冯荫权、刘邦俊、冯克、张刚剑等同志任参谋长。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对干部战士进行了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指战员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

11月由叶明带领的中央考察团到回民支队视察工作。叶明亲自对党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党的生活教育。告诉党员如何过小组、支部生活，同时帮助部队党委制订党的会议、汇报、学习等各种制度，建立各级党组织的正常

生活。中央考察团在回民支队进行的这些工作，以及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这就为把部队党组织建设成为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打下了基础。

## 二、战斗在冀中平原

### (一) 坚持深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日本侵略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围攻和分区扫荡失败之后，采取了逐步蚕食我根据地的政策。1940年初，开始遍地筑堡修路，抽兵集中扫荡。企图全部占领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达到“以战养战”的阴谋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暗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进一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梧、石友三两股叛逆，窜入冀中地区，对我军民制造磨擦，煽动叛乱，妄图颠覆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尖锐和复杂。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投降阴谋，原在深南（河北省深县南部地区，以当时的沧石公路为界）地区活动的主力部队，于1940年初由军区程子华政委率领，同冀南军区宋任穷政委领导的部队一起，南下讨伐叛逆石友三。与此同时，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率领几个团到平汉路西与晋东南太行地区兄弟部队配合，讨伐叛逆张荫梧、朱怀冰。日本侵略军利用冀中我军南下讨逆的空隙，在深南地区修路筑堡，企图进一步分割封锁我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军区决定，调回民支队到深南地区，开展对敌斗争。

1940年2月中旬，部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从定县的邢邑村出发，为了隐蔽目标，防止敌人发觉我们的行动意图，部队没有直下深南，而是首先向东急奔，绕到冀中东部地区献县一带，并对李谢桥之敌进行袭击，以转移敌人的视线。2月28日下午又回师向西，尔后突然南下，于当日深夜通过沧石路，到达深南地区，在栖凤庄宿营。

当时敌人正集中兵力，对深南地区进行清乡扫荡。部队在通过沧石路前，未能与地方党委取得联系，过路之后又未及时找到地方党委，部队对当地敌情掌握不够，加上有些指挥员思想上麻痹大意，在栖凤庄连驻两天，暴露了目标，于3月3日，遭到千余敌人的袭击。这次战斗我牺牲19人，伤30多人。二大队教导员黄澄同志，在指挥部队突围中不幸牺牲。电台译电员高福昌同志，在敌人的重围下，从容地向军区和友邻部队发出电报后，烧掉密码，壮烈牺牲。

栖凤庄战斗引起了地方党委对部队的极大关注。深南县委书记魏震亲自找到部队详细介绍情况，大力组织群众，配合部队开展对敌斗争。

在地方党委的关怀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部队情绪迅速得到恢复。从4月份起（特别是在纪念“红五月”的日子里），到8月份，先后在南花盆、鲁科庄、小羊集、张谦寺、土路口、康庄、城东村、杨台、魏家桥、大张村、大安村、程家村、榆科、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3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两处，毙伤敌伪军500余人，缴获加

农炮 1 门，九二式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步枪 500 余支，子弹万余发，大车 10 余辆，掷弹筒 3 个，骡马 50 多匹，以及粮食、罐头、军大衣、军毯等大量物资，胜利地保卫了麦收，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在回民支队战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

5 月 30 日进行的康庄战斗，是我八路军在冀中平原缴获敌人重武器——加农炮的一次极为出色的围城打援的战斗。

康庄是衡水和安家村两个敌人据点之间的一个村庄，完全是敌占区，八路军从未到达过这里。安家村之敌经常出动烧杀抢掠，附近老百姓十分恐慌。为了保卫麦收，稳定和鼓舞群众情绪，部队决定在这里给敌人以狠狠打击。

5 月 29 日深夜，二大队的第七中队和衡水县的第五中队，急行军至安家村据点附近，在封锁沟外麦地里隐蔽，准备 30 日拂晓向安家村敌人发起佯攻，使之康庄打响后不能增援。马本斋司令员带领一大队急行军至邢家村（康庄附近）隐蔽，准备截击溃退之敌。郭陆顺政委和冯克参谋长，丁铁石主任带领二大队的第五、第六中队，急行军至康庄，在公路两侧麦田里隐蔽，准备拂晓前切断电线，诱敌出动，进行伏击。战场指挥所设在康庄村边靠近公路一家老乡的屋顶上，重机枪阵地设在距公路百米左右的一个破窑里，准备掩护战士冲锋。

30 日拂晓，在康庄切断电线后，我佯攻安家村据点的部队打响了。8 时左右衡水敌伪军出动 170 多人，当接近我伏击圈时，我军居高临下，向敌猛烈进攻，经 40 分



钟战斗，全歼敌人。缴获加农炮 1 门，九二式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2 挺，掷弹筒 2 个，步枪 150 余支，弹药万余发，军衣、军毯等各种军用物资一部。俘伪军 50 余人，其余敌伪军全部击毙。我无伤亡。

康庄伏击战的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赞扬。冀中军区发了锦旗，上书“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

于 6 月中旬，敌集中数千兵力，分几路对我袭击，开始了持续 52 天的大扫荡。在反扫荡中，马本斋、郭陆顺同志成功地运用了“旋涡打圈”战术，凭借经纬交织、密如蛛网的交通沟和青纱帐，昼夜在深南地区回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最后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与我决战的阴谋。

1940 年秋季，我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对敌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中外驰名的“百团大战”。在此期间，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由于回民支队的积极活动，拖住了 2000 多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兄弟部队的作战。

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的赫赫战果，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到处掀起了参军的高潮，许多村庄的自卫队、青抗先成队入伍。西里秋村的青抗先 100 多人集体入伍，编成了一个新兵连。在深南一年的时间内，参加回民支队的青年男女达 1000 多人。到 10 月底离开深南时，回民支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 2500 多人。

## （二）大清河畔反扫荡

1941 年初，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地区，采取了更加残

酷的分割封锁、逐步蚕食的政策，首先从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大清河一带开始，进行分区扫荡，逐步向我中心地区延伸，修公路、筑碉堡、挖封锁沟、抢粮、抓壮丁、强行组织联保等，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企图全面占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大清河两岸的斗争形势，急剧恶化。

遵照冀中军区决定，回民支队于1940年底，从定县出发，越过平汉路西，沿路北上，在神南镇稍事休息后，于1941年1月5日在保定、徐水之间又回到平汉路东，进入大清河地区，在容城、雄县、安新一带活动。1月中旬，首先接收了原在这个地区活动、由马玉如（1947年在大兴县牺牲）领导的“回民大队”，改编为第三大队，马玉如仍任大队长。这个大队的武器好，战斗力强，大大加强了回民支队的战斗力。回民支队在大清河两岸，积极配合当地军民破路、炸桥、割电线，大力开展交通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新交通政策”，密切配合了友邻地区的反蚕食斗争。

2月中旬，一大队在雄县一带活动时，围攻小庄据点，吓得敌伪军7天7夜不敢出动。在白沟河伏击汽艇2艘，毙敌伪军30余人。同时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了交通破击战。敌人受到严重打击之后，于2月下旬集中2000兵力，对我进行扫荡。一大队巧妙地避开敌人合击，钻进了白洋淀。

3月底，敌人又从各地抽集数千人向我活动地区进行大扫荡，以容城为中心，几路向我出击，妄图歼灭回民支

队。在反扫荡中，马本斋、郭陆顺运用了“推磨战术”。他们带领部队围绕容城县转了几个圈子之后，突然南下，急行军至白洋淀西北岸的流通镇渡口，动员了 200 多条渔船，一夜之间，整个部队进入白洋淀的芦苇荡，甩掉了敌人的尾追截击。

4 月下旬，一大队护送吕正操司令员回冀中军区，也是从西北岸上船，通过白洋淀到达南岸登陆的。

在坚持大清河地区斗争期间，为了避免敌人的包围合击，回民支队在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曾经三次进入白洋淀，在芦苇深处同当地群众打鱼织席，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只能望洋兴叹。

回民支队护送吕正操同志回军区之后，即跟随军区直属机关在定县、无极一带活动，在用新的胜利纪念“红五月”的号召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

5 月 26 日深夜，回民支队把无极县的南焦、北苏、东阳三个敌据点团团包围，同时发动几千名男女青年涌到正定至无极约 70 华里长的公路上，一齐动手挖了无数道沟壕。在群众完成破路任务之后，部队即向三个据点同时发起猛烈攻击，烧毁了岗楼碉堡。当地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进行“火线劳军”，把馒头、大饼、开水送到战壕里，在战场上军民同庆对敌斗争的新胜利。6 月 28 日夜，又发动群众 4700 余人破坏定县公路 24 里，并焚毁碉堡一座。

回民支队在定县、无极一带开展交通破击战的节节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进攻。

### (三) 子牙河东战山本

1941年下半年，回民支队奉命参加青（县）大（城）战役，其任务是在青县、大城的外围建国县境内钳制敌人，保证主攻地区兄弟部队取得战斗的最大胜利。

6月底，部队从藁城县的寨里村出发，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到达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辛庄村，渡过了子牙河，到达建国县境。

建国县的南界是沧石路，北界是沧河路，东界是崔（儿庄）会（王会头）路，西界是子牙河，东西南北各不到50华里。侵华日军山本联队和汉奸刘佩臣的快速部队（即自行车和马队），严密统治这个地区。县境内外的碉堡林立，公路网织，部队的行迹一旦被敌人发现，四面八方的敌人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把部队包围。

回民支队7月1日进入建国县境，7月4日在曹辛庄就遭到山本、刘佩臣的包围合击。4日上午，四周据点景和、献县、沙河桥、崔儿庄、王会头等敌人计300余人，同时向我驻地曹辛庄合击，激战五六个小时。傍晚，河间敌人出动汽车四辆增援，我集中火力向沙河桥方向敌人猛烈攻击，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毙伤敌伪50余人，缴获步枪、手枪10余支。

七八月份，青纱帐期间，是我主动进攻敌人的黄金季节。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两个月的时间，在沧河路、景和、曹辛庄、邵束州、护持寺、大屯等地，组织进行了27次战斗，歼灭敌伪军500余人，俘虏伪军100余人、日军少尉军医1人、准尉兽医2人，缴获步枪300

余支，轻机枪 2 挺，掷弹筒 1 个，以及弹药、军衣等胜利品一部，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在建国地区出现了“敌人露头就挨打，出动就遭我伏击”的大好形势。

山本妄图以武力消灭回民支队的阴谋失败之后，施出了对马本斋进行诱降的诡计。通过各种渠道向马本斋放出空气，说什么“马本斋如果拉着队伍过来，最低给个师旅长。”妄图以“高官厚禄”动摇马本斋的抗日决心。但是，山本的诱降，更加激起了马本斋和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的怒火，仗越打越大，给敌人的杀伤越来越沉重。

山本不甘心失败。当他知道马本斋不仅对国家民族赤胆忠心，而且对父母也是有名的孝子时，便又施出更加阴险毒辣的卑鄙伎俩——抓马本斋的母亲作人质，逼迫马本斋投降。

马老太太是一个有高度民族气节的英雄女性。她在敌人的监狱里进行了绝食斗争。于 1941 年 9 月 7 日为国捐躯，时年 68 岁。

英雄母亲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回民支队以后，全体指战员万分悲痛。在建国县张祥村与当地群众一起召开了追悼大会。建国县委书记、马司令员、郭政委都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化悲痛为力量，再接再厉，用更大的胜利，为马母报仇，为所有受难的同胞报仇。战士们怀着满腔悲愤，对山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9 月 23 日，丁铁石、张刚剑同志带部队在雅莪村一带伏击从景和出发去沙河桥的敌人。上午 8 时左右，从景和开出汽车三辆，距离拉的很远，先头一辆是军用物资，

放了过去，第二辆进入我伏击圈之后，地雷、重机枪、手榴弹齐鸣，20分钟结束了战斗，毙伤敌伪军18名，俘虏日本中尉军医1名、少尉兽医2名，缴获步枪10余支、手枪3支、子弹、药品等军用物资一部，烧毁汽车2辆。在一次战斗中活捉3个日本鬼子，这在回民支队是唯一的一次。这个重大胜利，受到冀中军区的通令嘉奖。

10月14日，景和出动敌伪军四五百，到刘庄（沙河桥北）抢掠，我回民支队闻讯，即以三大队向敌人进攻，激战1小时，将敌人击退。

11月1日回民支队发动群众5000余人，破坏沧河路古庄头至雅莪支线，挖路面6里，平封锁沟4里。5日又发动群众1000余人，填刘各庄桥至钩坦之封锁沟3里。

我们在子牙河东的胜利捷报，雪片般飞向河西，传遍冀中各地。

11月13日，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陆定一副主任联名致书勸勉冀中军民，深切慰问马本斋同志，高度赞扬了马老太太，指出：“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的例证。”总部的致电，给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把当时的冬季练兵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

### 三、转战冀鲁豫

回民支队完成青、大战役期间的战斗任务之后，于11月底回到牙河西，到冀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饶阳、武强一带整训。1942年3月初，奉命又回到了子牙河东，在建国、交河以及冀南地区的阜城、景县等地活动。这次的任务是与冀南兄弟部队取得联系，配合行动，粉碎敌人蚕食我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整训期间，丁铁石调离回民支队。赵文甫代理政治部主任。为了协助回民支队更好地开展工作，冀中军区派军区政治部民运部玉逸群副部长，带领工作组五六人和一个警卫排，到了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第二次回到子牙河东之后，环境急剧恶化，到4月下旬，敌人对建国、交河一带的清乡扫荡十分频繁。

4月27日，郭陆顺带领部队在交河县陈庄宿营，28日拂晓，遭交河、泊镇等地出动之敌1000余人袭击。我凭借街头工事的优势阻击敌人，激战一天，连续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击毙敌人200余，我伤亡七八十人。黄昏后我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冲锋，从陈庄村北口突出重围。在这次战斗中郭陆顺同志头部负重伤，不幸牺牲。当时年仅28岁。

郭陆顺同志的牺牲，是回民支队的一大损失，马本斋失去了完全可以信赖的亲密战友，广大指战员失去了十分

敬佩的政治委员。马本斋领导这支部队的担子更重了。

5月下旬，扫荡冀中中心地区的敌军5万余人，逐步延伸到冀中东部边沿的建国、交河等地，冀中军区急电回民支队立即离开这个地区。当时，我们对附近的敌情尚未弄清，马本斋想再观察一下敌情变化后，再决定转移的方向。过了两天，河间、献县、交河、阜城、东光等地的敌人蜂拥而至，我们处于万余敌人的重围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马本斋果断地把部队带到靠近敌人据点的高庄一带隐蔽起来。敌人的步兵、骑兵、装甲兵、坦克部队，从我们隐蔽地的南面、北面分两路由西向东推进。从早晨五六点钟到上午10时左右，万余敌人把我装进了一个大口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突围。关键是向哪里突围。向东，顺着敌人的方向不可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向南、向北，敌人立即会把部队合抱起来。这时，马本斋当机立断，率领部队迎着敌人向西猛扑过去。全军立即投入了白刃搏斗，我杀伤敌人100余人，戳穿了敌人的口袋底，继续向西飞奔，二三百敌人调转枪口，在我们的背后猛烈射击，机关枪、迫击炮弹象冰雹似的打来，我部队交替掩护撤退。在敌人主力转回增援时，我已甩掉敌人的追击，在夜幕保护下行进了。

在高庄突围中，回民支队的伤亡很严重。一大队长马国忠、副大队长薛××、教导员马德舜等牺牲200余人，加上当时负伤和冲散与部队失掉联系的，总计减员五六百人。政治部、剧社和供给处，当时是一个伙食单位，共计100人，突围后，仅剩有30人，而且每个同志身上都有



轻伤或打穿了军衣和背包。

高庄突围以后，部队分两路活动。马本斋同志带领二、三大队仍在阜东、交河一带，协助地方安置伤亡战士，收容突围中掉队的同志。另一路由张刚剑参谋长率领一大队和司、政机关，连夜通过德石路到冀南地区的衡水、冀县、枣强一带。6月中旬，一大队又回到德石路北与二、三大队汇合。此后，部队开始了战略转移。

于7月初，越过北运河、津浦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渤海之滨冀鲁边地区。这时部队的枪支弹药十分缺乏，装备十分简陋。渤海军区首长十分关心这支部队，补充了必要的军械装备，想方设法改善部队生活，鼓舞战斗士气。马本斋与参加支队领导工作的赵文甫、刘世昌（当时支队领导的组织形式是军政委员会，赵、刘二同志是军政委员会的成员），根据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的指示精神，对部队的行军路线问题，作了反复多次的研究，最后决定主力部队向冀鲁豫挺进。留下一个连由马振武负责在渤海地区活动，还派一个排的兵力，过津浦路西，回冀中侦察敌情。主力部队于8月下旬，由黄骅司令员带一支小部队作向导，亲自送回民支队到冀鲁豫军区。经过河北省的南皮、东光等地到山东的庆云、乐陵、陵县等地，沿马颊河南下，在平原县境内越过津浦路西，经过高唐、聊城、阳谷等地，于9月中旬到达冀鲁豫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县）一带。敌人大扫荡开始后，回民支队跳到鲁西北，先到清丰、观城一线，于10月中旬到达莘县、朝城一带活动。

回民支队到达冀鲁豫地区后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整顿。首先健全了领导班子。军区派张同钰任政治委员，董庆云任副支队长，提原锄奸科长刘世昌任政治部主任。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为了适应小部队活动的特点，撤销了原三个大队的建制，组成五个中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在中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样更便于各中队独立作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部队到鲁西北后，马本斋任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他的主要精力转到军分区的工作方面。回民支队的领导工作由张同钰、董庆云、刘世昌等负责。这时，赵文甫调走了。

为了储备干部，精简下来的近 200 名营连排干部，组成了“干部训练队”，马凤舞任队长，任振宇任政治委员，马进波任副队长，杨杰一任军事教员，王堪任政治教员。干部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训练，同时也担负一定的战斗任务。这批干部在后来的部队发展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民支队在鲁西北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叛军石友三残部齐子修（盘踞在莘县）、文大可（盘踞在朝城）。这两股叛军，抢粮、抓丁、残杀百姓，是鲁西北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

回民支队在鲁西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了许多胜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至 1943 年 7 月，回民支队在朝城、莘县地区攻克敌人据点 30 多处，烧毁碉堡 40 多个，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这是回民支队在鲁西北经受的一次巨大考验。1943年，鲁西北地区已是连续三年大旱不收了。这一年的夏收，一亩小麦有的仅收一二斤粮食，群众吃饭困难，军队吃饭也成了问题。群众靠挖野草扒树皮充饥，部队每人每天只能吃一两粮食。有时一天只能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半斤榨过油的花生饼。老百姓的耕牛都吃光了。这时我们部队挖野菜已成为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因为这是与群众争饭吃的大问题。

当时的对敌斗争，实质上已成为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有许多仗是对出来抢饭吃的伪军打伏击。伪军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听到枪声，便缴枪投降，这样可以避免被老百姓打死，也能得到一碗稀粥吃。我们有时用生火做饭的办法，引诱伪军出来打伏击。在冠县东南桑阿镇一带，我们半夜进入一个成葫芦形据点中间的村庄里，部队在村外呈三角形埋伏。清晨即在村内生火伪装做饭。三个据点的伪军都出来抢饭吃，当进入我伏击圈后，在一排手榴弹的攻击下，他们都交枪投降了。这次战斗俘虏伪军600多人，缴获步枪500余支，轻机枪3挺。

我们在坚持鲁西北的一年中，在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以及同严重自然灾害作斗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10月，回民支队奉命调到鲁西南的昆吾、尚和一带活动。在这里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五个中队改组成两个大队（相当团的编制），组成了新的三军分区，马

本斋任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刘星任分区政治委员，张同钰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回民支队政治委员，董庆云任回民支队副支队长，刘世昌任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整编之后，于11月16日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开展的反蚕食斗争的首次战斗，攻克伪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

当时，伪二方面军孙良诚以濮阳县的八公桥为中心，向四面扩张，步步蚕食我根据地，到处拆民房，筑碉堡，挖封锁沟，抓壮丁、抢粮食，逼得老百姓生存无路。清除这个祸害，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取得反蚕食斗争胜利的关键。

怎样攻打八公桥，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召集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进行了反复讨论。有的提出首先清扫八公桥外围据点，步步压缩，最后攻打八公桥。马本斋提出采取“牛刀子钻心”的战术。就是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挖掉敌人总部八公桥，回过头来再清扫外围据点。马本斋详细阐述了采取这种打法的理由：从敌人方面看，八公桥有层层据点保护，四面有一丈多深的围沟，沟内有一丈多高的围墙。又是孙良诚的嫡系部队特务团防守，“备周则意怠”，敌人自然认为这里我们不会攻击。加之，敌人正在步步向我蚕食，得意忘形，这些正是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我们的主力部队远在二三百里之外，尚未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急行军突然钻进他的心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攻克八公桥是有把握的。会议一致同意他的建议。

杨得志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军区决定由曾思玉率领七、八、九团担任主攻，其余各部队分别作预备队和在外围据点进行围困打援。当时的战斗口号是：强攻八公桥，活捉孙良诚。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

马本斋也参加了这次战役的组织领导工作。他选派回民支队作战参谋李国栋（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带领测绘员王纪中参加军区组织的化装潜入八公桥进行侦察的工作。一切战前准备就绪之后，于11月13日，回民支队与各兄弟部队同时行动。我们从尚租、昆吾一带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16日夜到达八公桥。这天夜里有五六级大风，漫天尘沙帮助主力部队顺利地越过外沟，爬过围墙，活捉了哨兵，严密地包围了总指挥部八大处。敌人发觉我们之时，已根本无法展开火力，在我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八大处的所有人员、特务团等全部交枪投降了。孙良诚的参谋长，特务团长都当了俘虏。遗憾的是，孙良诚前一天去开封开会，未能完成活捉这个敌酋的战斗任务。

攻克八公桥之后，我即乘胜前进。外围的据点碉堡，尤如秋风扫落叶，被我很快地清扫净尽。回民支队在这次战役中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

八公桥战役以后，敌人十分惶恐，孙良诚被迫与军区杨司令员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放回他的被俘官兵，他释放我们的人。不久，孙良诚又把进攻我冀鲁豫的几个师全部撤退了。八公桥战役，对冀鲁豫地区敌我斗争形势的根本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本斋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冀鲁军区的指挥员和广大战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

时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曾赞誉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 四、踏上新的征途

1943年之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好转，敌伪军不断遭我沉重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日军，钳制我军，在西北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以号称百万大军，向边区发起进攻。党中央命令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六个团，共计4万余兵力，开赴边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回民支队，光荣的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战斗任务。

1944年1月中旬，回民支队奉命集中到范、观、濮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每个战士发了两套草绿色新单军装，三双草绿色军鞋，一条草绿色棉被。子弹袋、米袋、背包等全部更新了。每个人还发了一把小铁锹或小铁镐，搪瓷饭碗、防毒口罩等也都换成新的。每个班还发了两个搪瓷盆，供作洗脸和盛饭菜。战士的子弹、手榴弹都作了充分的补充，使用年代过久的步枪，如德国老套筒、俄国水连珠、以及各式各样的土造步枪，都更换成缴获的新式步枪。这样崭新优良充足的武器装备，是回民支队从未有过的。每个同志在原来的棉便衣外面套上新军服，背起全副武装。部队空前的威武雄壮、英姿焕发。

这时，马本斋的颈椎部突然生了一个小疮，痛疼难忍，迅速恶化。中央决定留军区后方医院（当时驻濮阳小

屯村) 治疗, 未能随军出发。

部队在张同钰、董庆云带领下, 于2月1日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当时我们保卫延安的战斗任务和行军路线, 在基层干部和战士中是绝对保密的。

2月7日深夜, 在磁县、安阳之间通过平汉路敌人封锁线。这天夜间, 寒风刺骨, 行军至铁路附近, 北风吹打电线发出嘶嘶的声音, 使人心情很紧张。尖兵连长刘秀武带队误闯到敌人的碉堡下面, 守路伪军开枪射击, 刘秀武左眼负伤失明。部队越过平汉线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后, 就收到冀鲁豫军区发来关于马本斋病故的电报。为了避免引起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波动, 这个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 只是少数几个支队领导同志知道, 对广大指战员暂时绝对的保密。

3月6日上午, 部队从沁源县寨上村出发, 经过两天的行军, 到达终年积雪的绵山脚下郭道镇。绵山是一座上下各有100华里路程的高山。气候变化无常, 正在晴天, 顿时会风雪交加, 气温大幅度下降。当我们在山下休息片刻即通过绵山, 刚要出发风雪来临, 当即返回驻地休息。第二天待风雪停息后, 顺利地通过了这座雄伟壮丽的银白色雪山, 下山到达宿营地后, 已是黄昏时刻。这里是丘陵地带, 已可隐约地望见晋中平原了。

3月10日下午出发, 行军三四十里之后告别了中条山, 进入晋中平原时, 已经日落西山了, 正是我们通过敌占区的好时候。

晋中平原是敌人严密统治的敌占区, 也是我党地下工

作十分出色的地区。在这 100 余里宽的带形平原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干部、战士，不论少数人化装通过，或者大部队武装强行通过，都是地下工作人员把一切都精心安排周到之后才行动的。因此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成千上万的干部战士，从延安到敌后，从敌后回延安，在这块敌人严密控制，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织的大平原上，往返通过，很少受到重大的损失。这里名义上是敌占区，实际上是我们可靠的地下抗日根据地。

我们这支上万人的大部队，是由洪（洞）赵（城）支队为向导，一夜之间强行通过的。当时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我们回民支队属中央纵队，杨得志直接指挥，在平遥、介休之间一夜通过了同浦路、平汾路、汾河等五道敌人的封锁线。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在晋绥地区的离石县境内登上吕梁山。这时，战士们已经疲乏得脚步都迈不动了。在半天一夜的时间内，连续行军 210 多华里，几乎全是跑步前进，战士们累得气也喘不上来了。但是，情况迫使我们一步也不能停留。因为在如此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只要坐一坐就站不起来了，就要掉队，只能咬紧牙关奋勇前进。登上吕梁山后，部队才宿营休息。接着连续三天通过无人区。当进入晋绥根据地的中心地兴县一带时，部队携带的干粮、粮食，都已全部吃光了。

3 月 31 日，部队在第八堡渡过黄河。经过葭县，4 月 3 日到达米脂县城。休息后，在米脂县中学礼堂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张同钰向大家宣读了冀鲁豫军区给回民支



队的电报：马本斋患对口疮转肺炎，医治无效，不幸于2月7日逝世。噩耗传开，大家莫不万分悲痛。

在米脂工作的冯文彬接见与会同志，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马本斋同志的遗志，在新的战斗中，克服困难，英勇奋斗，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回民支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体指战员爱戴的司令员，人民群众广泛传颂的民族英雄，优秀的中共党员马本斋同志，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年仅42岁。根据他生前的遗嘱，安葬在鲁西北回民中心地——莘县张鲁集村。

部队从米脂出发到绥德，经过瓦窑堡、蟠龙镇，到达安塞，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翻阅了三四月份的延安《解放日报》，看到连续刊载的悼念马本斋同志的消息、报道和文章。3月19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17日，延安回族各界代表300余人，在清真寺举行了马本斋追悼大会。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送了挽词。毛泽东主席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总司令的挽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副主席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叶剑英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精神不死。’林伯渠、李富春同志的挽词是‘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河山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

马本斋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母子两代英雄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我们的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

的精神力量。

我们进入边区之后，中央原拟调回民支队到三边地区去对付五马兄弟。因形势变化，又改为仍随杨得志开赴甘泉县。5月1日进驻田庄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练兵运动。

回民支队到甘泉与杨得志率领的五个团合编为“教一旅”之后，部队的干部作了比较大的调整。中央为了培养干部，积蓄力量，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分别到中央党校、抗大总校、抗大第七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张同钰政委去中央党校学习之后，董庆云任支队长，刘世昌任政委，任振宇任参谋长，金民任政治部主任。

在劳动生产中，战士干部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是非常感人的。进到荒无人烟的田庄沟，首先用石块在河沟两岸打起炉灶，用棉被搭起帐篷，随即劈山打窑洞，解决住房问题。不到两周的时间，每个班都完成了两孔窑洞。

开荒更是一场鏖战。开始每人每天能开荒地二三分，很快发展到多数战士每天开荒一亩左右。支队劳动英雄、二大队战士刘春清，外号“气死牛”，最高纪录一天开荒七亩七分坡地。一匹马拉犁也不过耕地三亩。一个月的时间，平均每人开荒20亩左右，每个中队耕种土地面积都在2500亩左右。同时还组织了畜牧组、蔬菜组、基建组、烧炭组等等。当年的秋收以后，粮食、副食都达到了自给有余。

在劳动生产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事迹。一中队炊事班长李长明最突出。他的身体矮小瘦弱，眼睛高度近视，走

路看不清楚。中队的食堂建在半山坡上，吃水要到山沟里去挑，很费力气。李长明主动包下了挑水的任务，开始用一副扁担挑两桶水，后来用两副扁担一次挑四桶水。每天下午他就烧好两大桶水，一桶是开水，供大家饮用；另一桶是温水，供大家洗脸洗脚擦澡。

战士们看到李长明日夜为大家操劳，都千方百计为他减轻劳动强度。从山上往回扛木柴时尽量拣碎的，这样可以减少李长明劈柴的劳动。每天早晨不等他起床，战士们就争着担水，食堂大小水桶，每口锅里都装满了水。为争着担水，战士们一个比一个起得早，有的在头一天晚上藏起扁担。由于生产的前线后方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每天都听到有新的生产捷报。

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也很快。到1945年秋收时，除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外，副业生产更加喜人。每个中队饲养的羊100多只，鸡二三百只，牛二三十头。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洋白菜、西红柿、山药蛋等。每隔一天就宰两只羊或几只鸡。各中队用收获的小麻子土法取油，完全可以满足食用和照明。每个中队都烧了2万多斤木炭，供冬季取暖。各中队都用石板、桦树皮等建起了美丽的新餐厅，也是课堂和礼堂。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田庄沟沸腾了，从100多年的睡梦中惊醒。过去荒无人烟，现在成了米粮川。这是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田庄沟，人群象潮水一样涌上了山头，点燃起无数个桦树皮火

环，火龙在各个山头上欢腾翻滚，大家相互拥抱，尽情高呼“乌拉！我们胜利了！乌拉！乌拉！”通宵达旦，欢声不息。

“八一五”之后，回民支队作为我党我军一支独立的民族抗日武装，胜利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 平津战役中 人民群众的支前热潮

俞 悦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继辽沈、淮海战役所发起的又一次伟大的战略决战。东北、华北两解放区人民，为支援平津战役，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支前热潮。战役期间，数百万民工参加修路、架桥、抬担架……并将数亿斤粮食、柴草运往平津前线。在战勤和物资供应上，两解放区人民都不惜个人牺牲，尤其是冀东区人民，竟提出“以倾家荡产的精神支援平津前线”。没有东北、华北两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前，就没有平津战役的胜利！

平津战役发起于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其战线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现怀安县），长达1000余华里。平津支前物资由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sup>①</sup>承担；战勤任务主要由冀中、北岳、冀东、冀热察行署承担。

---

<sup>①</sup> 当时，东北解放区辖黑龙江、龙江、嫩江、松江、合江、热河、吉林、辽北、辽西、辽东、辽南、冀东、冀热察13个省（行署）；华北解放区辖北岳、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晋中7个行署。1949年1月15日，冀热察和北岳行署合并，成立察哈尔省，划归华北；同年3月7日，冀东行署亦划归华北。

平津战役发起之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东北解放区人民完成了辽沈战役巨大的支前任务，紧接着又投入了平津战役的支前热潮。华北解放区人民，他们在支援平津前线的同时，还担负着淮海战役和太原战役的支前任务（平津战役期间，华北调运淮海战役前线粮食 10153 万斤；运送太原粮 3700 万斤、弹药 373 万余斤）。

中央军委原部署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再行人关，于 1949 年 1 月至 6 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歼灭傅作义主力（主要是平津之敌）。由于全国整个战局形势的发展，1948 年 11 月，我军委获悉蒋介石有让傅作义集团军放弃平津南撤之企图，同时发现傅作义主力又有西退绥远之迹象，为将傅作义主力分割包围，歼灭于平津，因之决定东北野战军不作休整，提前入关。这就给平津战役的支前工作（诸如抢修铁路、公路、调运粮食、柴草等）增加了紧迫感和艰巨性。

但是，东北、华北解放区人民，尤其是冀东、冀热察、冀中、北岳老解放区，都曾先后实行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抗战胜利以后，这些地区人民又在我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平分土地”的运动，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对我党我军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军投降以后，他们又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及援助，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抓伕、派捐，横征暴敛，当地人民深受其害。上述地区人民深刻认识

到，只有打垮国民党军队，彻底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保住胜利果实。所以，尽管有前述困难，尽管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已作出巨大的牺牲，加之自然灾害，人民缺衣少食；当他们听说我东北大军入关，和华北野战军相配合，欲对平津之敌展开战略决战时，便高兴得夜不成寐，欢呼雀跃，誓以一切人力、物力来支援平津前线。

平津战役支前工作，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中共平津前线总指挥委员会（以下简称“前总委”）、中共东北、华北两中央局及其所辖各级党和政府的具体组织下实施的。

平津战役发起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支前工作曾有过许多重要文电指示，其中大多文电经由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审阅，有的文电由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

1948年10月31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克诚、东北局、华北局的文电中即指示：为“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需“争取于一月内外修通沈锦、彰武、义县、承德线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各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屯运粮弹……”

12月4日，由周恩来起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肖劲光、陈伯钧，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及东北局、李富

春、华北局的文电指示：“……华北大战在即，东北及华北均应大力支前是应该的，但如冀东真的以倾家荡产精神来动员人民支前，那就甚为危险，必致超过人民的最大负担能力，将来使元气难以恢复。因此，望东北局和富春根据肖、陈的提议，冀东主要困难，速设法为之解决，如肉及草料，可否由东北和锦州、热南运下大部，票价比值和柴草应速即定出军民两便的办法，运输工具能否由部队带来大车自己解决大部等等。”此文电不仅是对支前工作的具体指示，也体现了我党及军队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体贴。

12月15日，中央军委在给东北局、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华北局的文电中又具体指示：“我们预计东北部队进入平津地区作战两个月，休整两个月，休整后的行动又一个月，总计为五个月。关于供给部署，东北计划三个月，华北计划一个半月并准备半个月，共为五个月……”

同年12月26日，中央军委根据平津、淮海战役及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朱德、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的战争要用很大部分力量来支持，拿预算说，就华北区讲，要用95%的数目支持战争，换句话说，就是要95%的数目要由你们支配（其它区域还不知道，也不会少），所以现在差不多以全部人力、物力支持战争。”

平津战役前和战役进行期间，东北局和华北局根据中央军委和“前总委”的指示，都及时地做出了自己的支前供



应计划。先后指示所辖行署（省）、专署、县、区、村逐级建立由党、政、军（人民武装）干部联合组成支前组织机构，二级军区以上（含二级）以部队干部为主，二级军区以下以地方干部为主。各级支前组织机构，统一由东北野战后勤部指挥（当时东北分野战后勤和后方后勤。野战后勤部部长周纯全，副部长李聚奎，政委陈沂）。

东北、华北各级后勤支前组织机构建立以后，他们纷纷召开会议，发出有关支援平津战役的各种指示、动员令、布告、命令、通知等，声势浩大的平津战役支前工作，随即展开。

首先是抢修机车、铁路，架桥、修公路。东北、华北境内通往平津的铁路，主要有北宁线、平西线、平绥线、平汉线（北段）。战役前这些线路大多被破坏（有的被国民党军飞机所炸毁；有的由于战争需要为我方所破坏），修复工程甚为艰巨。沿线群众在各级支前组织的领导下，夜以继日，积极抢修机车、铁路。如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工人，仅用10多天时间，抢修好机车8台，并装修好“新唐山一号”、“新唐山二号”两台机车，还修好客、货车82辆，新制机车配件弹簧、风泵、水泵、轴瓦等2180件，相当于国民党军占领时两个月的工作量。再如抢修铁路，由新保安到宣化段铁路，长达110公里，途经大、小桥梁47座。修筑工程中需用枕木17万根、夹板2500副、道钉75万个、土方2万余方，当地人民踊跃应征枕木，不分昼夜赶制铁路器材，终于提前完成了该段铁路的修建。截止1948年12月底，由沈阳至平津前线1700余华里的

铁路修复畅通；横贯华北长达 800 华里的由榆次至德州间铁路，也于同年 12 月 20 日修复畅通。

工程更为浩大的是通往平津前线上千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公路的修建。仅冀中八分区即动员民工 23 万余人，修建了沧定、津保、平大、津沧、津黄等 11 条公路，全长达 1300 余华里。他们一边修路、一边修桥，为修建固安县境内的永定河大桥，上千名土工、200 多名木工、300 多名鞋工，还有县长、技师等，都参加了这一工程。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河水结冰，桩工们赤着脚跳进河里下桩，边打桩边唱着欢快的号子。为解决水路运粮，冀中区后勤司令部还组织一支 44000 多人的破冰队，用钢钎、铁锤、凌枪、柳木锤，砸开了由安新县至杨柳青全长 268 华里的冰河，使白洋淀、大清河的运粮船直达平津前线。

冀东区人民，为给东北大军人关铺平道路，全区齐动员，架桥修路。冀东区境内，东起山海关，西至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北起长城以外的兴（隆）、承（德）地区，南至渤海沿岸，公路干线 6500 余华里，连同境内支线，全长近 10000 华里；横跨大小河流的桥梁 500 余座。截至 1948 年 12 月中旬，全部修架完工，畅通无阻。其中有的公路展宽 2 丈至 2.6 丈，有的展宽 1 丈至 1.2 丈。兴隆县境内山地公路，大多用炸药炸开，重新铺修。全区境内主要公路干线两旁，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美式飞机的拦袭和轰炸，还普遍挖了防空洞和汽车隐蔽壕。仅蓟县一、二、六区群众在 24 华里长的一段公路两旁，就修挖了能容一班

人的防空洞 382 个，汽车隐蔽洞 15 个。香河县百家湾、王家坂村等边缘地区群众，还在当地武装民兵的掩护下，和敌人进行了“敌来拆桥埋木材，敌人走了又重修”的斗争，为修一座公路桥，曾几次修了拆，拆了又修，既不误进军，又避免了敌人的破坏。

平津战役期间，东北、华北两解放区群众，共修公路 13700 余华里，架设公路桥 372 座。

铁路、公路大部分修建完工以后，为屯粮、弹，接待过往部队、民工，转运伤员，收容俘虏等，在通往平津前线的主要铁路、公路沿线，各地区、各级支前组织机构建立起几十个大小兵站、上百个露天仓库、数千个茶水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平津战役支前最为艰巨的任务是筹集、调运粮料、柴草。战役期间，参战部队上百万人，还有随军民工、马匹等，每日需用粮食、饲料 300 余万斤，柴草 200 多万斤，还有大量的副食品及武器、弹药等。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冀中、北岳、冀东、渤海各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即为平津战役筹集粮料 6 亿多斤、柴草 8 亿多斤。仅冀东区，就筹集粮食 2 亿多斤。

所筹集粮料、柴草，各村、各户背扛、肩挑、驴驮、小车推，先向村里和后方仓库集中，然后分期分批用大车、汽车、火车、船只运往平津前线。如冀中区，为往平津前线调运粮料、柴草，动用大车 31 万多辆、船 400 余只、冰床 1000 余只。这些车辆和船只，有的连续运输一个月以上，有的一次往返千余里，共运粮 8500 余万斤、马料 3100 余万斤、马草 4100 余万斤、柴 1 亿余斤。

又如冀东区。平津战役开始后，每天约有2万余辆大车往平津前线赶运物资。截止1949年1月24日，该区共往前线运粮6000多万斤、柴草2000多万斤、蔬菜200余万斤、油盐140余万斤。

往平津前线运输支前物资的大车队，沿途服从指挥，上道去，下道回，母桥往，子道来。沿途虽设有草料站、军民饭店、卫生所、病畜治疗所等，但由于运输队伍庞大，途中困难还是很多的。如车把式们吃饭时大多用自带的小锅就地熬粥，吃带冰渣的玉米面饼子；天黑了休息，有的车工把被子给牲口盖上，自己抓把谷草盖身，抱着鞭杆儿在车上打盹；白天行车，有时风刮得睁不开眼，口、鼻、耳内塞满尘土，眉梢、帽沿结挂冰渣。冀中霸县大车团到永定河桥，见桥还没修好，车把式们火急跳下车辕，脱下棉裤，跳进飘流着冰块的河里，牵着牲口，推着车轱辘，大声吆喝着过河。束鹿县大车团中的苗家湾村马小王的牛病了，别人要把他车上的粮食卸到自己车上，他不让，自己在车轴上拴了条绳子，弯着腰，和牛肩并肩，从新镇拉到津西王庆坨，一直拉了220多里。

1949年1月8日，雁北专区接到命令，要他们运6万大石（约合2000万斤）粮食到平绥沿线的永嘉堡及下花园等地。时值隆冬，平均气温零下15度，道路崎岖且远，其中繁峙、灵丘、应县至目的地，约400华里至500华里，缺乏交通工具，主要靠背扛、肩挑、驴驮。此任务需半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专、县、区、村各级支前组织的领导下，干部积极带头，动员全地区所有人力、畜力投

人运粮，责任到人，不到两个月即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东北境内的粮食、大豆、武器、弹药、被服等，大多依靠火车、汽车往关内运送。仅据东北野战后勤所属汽车一、三、五团统计，战役期间，在由沈阳至平津前线1700余华里的运输线上，出车1000余次，运输物资2500余万斤。又据东北野战后勤三分部八大站在冀东区滦县的一个分站统计，为向平津前线运送物资，一个月即使用了850个火车皮。

为了抢救和转运伤病员，东北、华北各地都组织了随军远征担架团。如冀中区，组织远征担架5157副，计约21300余人，组成191个担架连。又如冀东区，共动员组织了270个前方担架团，青年妇女还组织了后方担架队，计约动员民工30万人。

随军远征的担架队都带着防空麻包、被褥、枕头，有的还带着白被单，预备雪地防空。他们不畏艰险，不怕劳累，夜以继日随军执行任务。担架队员们对伤员十分爱护：有的重伤员躺在担架上不能动，担架员往往用自己的饭盒、鞋子、帽子、甚至用手给伤员接屎接尿；伤员们饿了，担架员一口一口地喂；有的怕伤病员冷，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伤病员盖上；有的还用自己节省的钱给伤员们买烟、瓜子、花生等；当遇敌军炮火和空袭时，担架队员便扑到伤员们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他们……许多伤员感动得流着眼泪对担架队员们说：“你们真比亲兄弟还亲……”

各地在组织运粮队、担架团的同时，还组织民兵连，

随军担负护粮、押送俘虏、打扫战场等任务。仅冀中区，就组织随军远征民兵 16000 余人。与此同时，各地还组织起后方民兵，担负守护兵站、粮库、铁路、公路、桥梁等任务，并在交通沿线、村头路口遍布岗哨，抓捕、歼灭溃散逃敌。

各地还组织慰问团，前往部队慰问、劳军。东北大军入关前，松江、辽北、吉林、沈阳等各省、市人民纷纷组织慰问团，分赴野战军各部驻地进行慰问。在欢送某部入关的大会上，辽北省主席阎宝航向全体指战员们说：“东北 3800 万人的心，正在期待你们用更大的胜利，来完成中国人民彻底的胜利！”松江省慰问团代表松江人民送给某师一面大旗，希望该部把这面大旗插在北平（北京）城上。军属们也都纷纷写信鼓励自己的亲人进关杀敌立功。

东北野战军向关内开进时，沿途各村都建立了“进关部队招待所”和“米草油盐供应站”。当东北野战军进入冀东地区时，沿途城镇乡村都扎搭松枝花彩牌楼；墙上、树上遍贴欢迎、鼓励杀敌标语；乡亲们纷纷腾房子、烧热炕、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迎；老大娘们递茶水，年轻妇女赠送绣有“杀敌立功”、“人民功臣”等字样的慰问袋，有的还挤到部队行列中寻找战斗英雄，给他们佩戴光荣花。

据不完全统计，仅冀东区妇女所赠送的慰问品就有大米和白面 190 余万斤，边币近 4 亿元，鸡蛋 8 万多个，还有鸡、花生、水果、糕点、袜子、毛巾、肥皂、牙刷等。

春节期间，各地都先后派出慰问团，前往部队慰问。

如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兰公武，他带领的慰问团，赶着千余辆大车，满载着猪肉、红枣等，分赴平津前线参战部队驻地进行慰问。

平津战役期间，北京、天津等敌占区人民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在平津解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天津解放前夕，我地下党曾获取天津市敌城防工事分布图，并将它及时送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使我军炮击天津时，颗颗炮弹准确地落入敌之城防工事区。市内群众惊奇地说：“解放军的炮弹长着眼睛呐！”

东北、华北解放区人民，为支援平津战役，从人力、物力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战役期间共动员民工（包括民兵）260余万人，组织随军担架23000余副，转运伤员14000余名，动用大车61万余辆、牲口120余万头，往前线调运供应粮食2.8亿余斤、马料9000余万斤、马草1.1亿斤、柴2.4亿斤。在修路、运粮、抢救伤病员等支前工作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功臣和模范；数以百计的支前民工（民兵）在平津前线英勇牺牲。他们的事迹生动感人，广为传颂。

平津战役中人民群众的支前工作，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人民支援战争，战争解放了人民。平津战役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东北、华北两解放区人民的胜利！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北京（北方）区委 同冯玉祥的联系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京区委（1925年10月改称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冯玉祥进行过多方面的联系，对冯所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北京（北方）区委的工作，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旧军阀转而成为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将领。从而发展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大大促进了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 （一）

1924年1月，孙中山在我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全国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而革命群众反帝反军阀的爱国热情，对冯玉祥追求国民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加强对“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



小组织”<sup>①</sup>。由于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影响，促使冯玉祥思想发生转化。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从承德倒戈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强令曹锟给吴佩孚下令停止战争。吴佩孚失败南逃。在此同时，冯玉祥还派鹿钟麟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取消了对清廷的优待条件。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同胡景翼、孙岳等人开会研究改编部队的问题。冯玉祥接受《京报》记者邵飘萍的建议，与广州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决定将改编的部队定名为国民军。冯玉祥还下聘书请邵飘萍为高级顾问。<sup>②</sup>10月24日，冯玉祥又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军阀混战，主张一致对外。他说：“国家建军，原为御侮；互相残杀，中外同羞”。<sup>③</sup>

对于北京政变及其政变后冯玉祥建立的国民军，最初我们党内存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北京政变只不过是军阀之间的内哄，如陈独秀说：北京政变“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为的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

---

①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200页。

② 见曹金梦：《新发现两件珍贵文物》，《北京晚报》1984年8月24日。

③ 《冯玉祥等邀请孙中山北上通电》，见冯玉祥：《十三年首都革命》。

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这“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sup>①</sup>蔡和森说：这次政变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冯玉祥，在吴佩孚不利的形式（势）下，跑回北京，主持停战”，“这位基督将军一面固然是倒吴自建，别面却是替天（帝国主义）行道”。<sup>②</sup>彭述之说：“我对此次之北京政变，绝无何等希望之可能，也绝没有向英美帝国主义的新代办冯玉祥发表要求之必要。”<sup>③</sup>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说：“最反动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耍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不过是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sup>④</sup>也把冯玉祥和旧军阀不加区别地同样看待。

而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军的认识则比较全面、客观。北京政变前，李大钊就经国民党左派徐谦介绍与冯玉祥相识，进行过多次交谈。冯玉祥早在1911年，就曾响应辛亥革命，参加滦州起义。后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支持共和，参加了护国之役、声讨张勋

---

① 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向导》第89期。

② 和森：《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向导》第89期。

③ 述之：《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向导》第89期。

④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41页。

复辟等革命活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表示要为国民而战，将自己的部队改成国民军，发电要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这都表明他倾向革命。因而李大钊认为：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军与旧军阀有联系，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旧军阀。冯玉祥虽然还不是一个“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的革命家，但他可能成为“孙中山所提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热烈的信徒”，成为“有激进情绪”的军人。<sup>①</sup>国民军虽然还保留旧军阀的一些习气，还不是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但是冯玉祥对部下要求严格，训练有素，表示要“真爱民，不扰民”，因而冯部遵守纪律，作战勇敢，这是与其它军阀部队有很大区别的。

同时，李大钊也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还没有统一，军事力量较弱，被军阀包围处境困难；北方张作霖拥有 25 万军队，占据了东北、山东，并窥视长江流域；中部吴佩孚虽然受挫，但仍有 5 万人的一支军队，占有汉阳兵工厂，又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还可能东山再起。冯玉祥、胡景翼等建立的国民军拥有 20 万人，占据了直隶、河南与西北大块土地，实力雄厚。如能与之合作，借以发展北方的革命势力，与南方广东革命政府配合，南北呼应，攻打北洋军阀，扭转革命的形势，对于中国的战略全局是很有意义

---

<sup>①</sup> 纳乌莫夫：《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年至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4页。

的。有鉴于此，李大钊和北京区委决定对国民军采取联合政策，制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正确策略；并决心说服党中央某些领导人改变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看法。经过李大钊的努力，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就改变了以前中央对冯玉祥的认识。决议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sup>①</sup>到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表现出中央对国民军更加重视了。会议指出：“北方国民军……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因此，“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会议中，中央检讨了在北方军事工作中的“临时应付”情绪。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sup>②</sup>中央的决议使北方区委对国民军的工作更加明确了。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0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4页。

## (二)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虽然倾向革命，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sup>①</sup>。而且，国民军是刚从旧军阀中脱胎而出的，仍保留着许多旧军阀的习气。因此，李大钊认为，要使国民军坚定其革命倾向，使这支旧军队成为新式军队，首先就要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不断地灌输革命思想，发展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为此李大钊亲自做冯玉祥的工作，多次与他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主张。同时，决定派一批党员到国民军中去，做冯玉祥部下的工作。1924年11月，共产党员张兆丰被派到国民军中去工作，临行前李大钊亲自找他谈话，作了具体指示。张兆丰懂得军事，在国民军中也有一些关系，到国民军后先任团长后任旅长、师长，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不久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北京区委为了配合张兆丰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先后又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等同志到张兆丰部工作。

1925年2月，冯玉祥派毛以亨以他秘书的身份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等人。进行了两天的商谈后，李大钊、徐谦等在毛以亨的陪同下到张家口同冯玉祥会见。冯玉祥派副

---

<sup>①</sup>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

官张允荣到车站迎接，在冯的住处谈了一天。<sup>①</sup>

经过多次交往，冯玉祥很佩服李大钊、徐谦等人的识多见广，提出聘请他二人为高等顾问。李大钊认为徐谦是国民党常驻冯部的代表，聘为高等顾问有利于工作，而他自己则以不作顾问为好。冯对李不为名不为利的品德更加敬佩，冯尊重李大钊的意见，聘请徐谦为高等顾问。<sup>②</sup>

1925年5月，李大钊又专程前往张家口，就在国民军中设立政治俱乐部和派宣传员的事宜与冯玉祥会晤。李大钊还亲自拟订了一个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在国民军中成立10个政治俱乐部，俱乐部应该成为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还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设立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起初冯玉祥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经过李大钊等人的耐心诱导，冯玉祥批准了这一计划，同意先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俱乐部的政治工作。由12名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福林特在俱乐部里讲课，李大钊也多次到俱乐部讲课。他们分别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政治经济学和一些科学文化知识。还经常召开座谈会，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五卅惨案的经过、工人罢工的情况，讲述国民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起的作用。李大钊还多次向苏联顾问团介绍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政局以及

---

<sup>①</sup> 见陈天秩：《一战时期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河北党史资料》综合选辑第4期。

<sup>②</sup> 同上。

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讲述中国人民反帝力量的民众斗争情况。希望顾问们多对冯玉祥进行宣传。

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向北京区委提议，组织一批青年，派往国民军中去。同时他还亲自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建议冯玉祥设立干部学校和军官教导团等，收容各地流亡的学生和爱国青年，训练军事干部。北京区委组织了一批主要来自北京、天津的青年到张家口投奔国民军。共产党员张兆丰在本部办了个随军干部学校，由李林任教育长，学员大都是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地的爱国青年。张兆丰还亲自到天津，通过组织，介绍来几十个积极分子到该校学习，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国民军的政治工作，李大钊介绍宣侠父、陶梁（即陶新畲）随徐谦前往张家口。因为宣、陶是李大钊介绍去的，冯玉祥对他们很器重，亲自接见并将他们安排到俱乐部工作，给以宣传员的名义。不久，北京区委又派濂卿、钱清泉等8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分头主持10个俱乐部的工作。

李大钊和北京区委对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制定了循序渐进、以诱导为主、稳步前进的方针，要求所有党员遵守纪律，掌握分寸。冯玉祥是著名的基督将军，在国民军中有一大群牧师随队传教，讲圣经。虽然冯玉祥对三民主义也有一点浅薄的了解，但那不过是在基督教义上抹一点脂粉。北京区委预见到，时刻都有同牧师发生冲突的可能，那就会导致冯玉祥对政治工作的反感。因此，在对

牧师的问题上，北京区委采取“置之不论，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一切工作都经过冯玉祥同意，就连讲课提纲也经过冯玉祥审定。五卅惨案以后，冯玉祥呼吁全世界基督教徒谴责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但却遭到那些牧师的反对，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使他终于下决心送走了随军牧师，增加了宣传员，加强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

1925年9月，北京区委派萧三、江浩等到张家口，成立张家口地委，领导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区的工作，并加强同国民军的联系。江浩按照区委的指示，经常出入国民军营区，做一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地委军事委员王一飞还深入到国民军中，担任了国民一军独立旅的参谋长。1925年冬，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动员下，国民军支持召开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会场就设在冯玉祥的诚洁旅馆。北方区委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三)

要使国民军切断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联系，就必须帮助国民军实现联俄的政策，接受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影响，接受孙中山联共的政策，坚定其倾向革命的政治立场。北京区委和李大钊一开始就注意帮助国民军与苏联建立联系。1924年10月27日，李大钊偕同徐谦会见冯玉祥等人时，建议冯玉祥、胡景翼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武官格克尔会谈，争取苏联对国民军的军事援助。同时，李大钊又积极向苏联同志介绍国民军的情况，并以党的名义要求苏联政府对国民军



给予援助。

1925年3月29日，鲍罗廷从广州来北京，在徐谦、顾孟余等人陪同下到张家口会见了冯玉祥，加深了苏联同志对冯玉祥的了解，此后经过李大钊、徐谦与加拉罕多次商谈，苏联政府就援助国民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李大钊亲自来往于京、张之间进行联络。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冯玉祥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参加的代表团到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谈判，确定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即军队的主要装备步枪、机关枪、大炮及弹药等都由苏联无偿援助，并确定援助物资的具体运送办法。5月初，苏联顾问团分别到达张家口和国民二军驻地开封。<sup>①</sup>为了促使国民军支持民众，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李大钊建议冯玉祥派团以上军官到苏联参观。1925年10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派参谋长熊斌率参观团赴苏参观学习，并从学兵团挑选了25名优秀连排长送往苏联学习，其中一部分进入了莫斯科军事学院，另一部分分配到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军事学校，分别学习步兵、炮兵、空军等。党派刘伯坚、李一特、赵秀峰、曾涌泉等人到各军校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亲自了解苏联的情况，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出发，以访问德国的名义去苏联访问。23日到库伦时，鲍罗廷、徐谦、顾孟余等人与冯玉祥谈中国的前途。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强毅军队，口称

---

① 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sup>①</sup>冯玉祥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找不到别的出路，于是打消了“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决定加入国民党。

5月9日冯玉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蔡和森到冯的住处，与冯及其随行人员进行了多次交谈。蔡和森坦率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使冯玉祥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蔡和森的知识渊博也很是敬佩。5月17日，刘伯坚、曾涌泉和武胡景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到冯的住处欧洲旅馆去拜访冯玉祥，并赠送冯玉祥一套《前进报》。刘伯坚等人同冯玉祥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对国内政局的发展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如何才能彻底解放工农劳苦大众，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阐述了推行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必要性。这使冯感触很深，于是，冯玉祥要求蔡和森、刘伯坚、朱务善、周达文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他讲课。通过这些接触，使冯玉祥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冯在苏期间，李大钊一直与苏联驻华使馆和蔡和森保持联系，关心着冯玉祥的政治进步。蔡和森曾回信给李大钊，谓冯在苏“进步甚大，颇可乐观”。通过实地考察和蔡

---

<sup>①</sup> 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和森等人的帮助，冯玉祥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戒心，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改组军队，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国民军中设立政治部。他要求蔡和森和他一起回国，帮助他做政治工作。蔡因工作需要暂不能回国，遂推荐刘伯坚帮助他工作。在冯的要求下，刘搬来与冯同住，并多次向冯介绍苏联红军在缺衣少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战胜沙皇军队的经验、苏联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及群众工作等情况。

#### (四)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考虑到战争的形势，为了从北方策应北伐战争，特邀请于右任同翻译马文彦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回国重整国民军率师出战。冯同意回国，但希望能多考察些时候。由于战事紧急，李大钊又写密信催促，要冯早日回国。冯玉祥遂于8月17日秘密离开莫斯科回国。冯回国时，接纳了刘伯坚、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随他一起回国，帮助他做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途中冯玉祥给李大钊写信，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表示他联俄、联共的决心，要求北方区委给予帮助。<sup>①</sup>

9月16日，冯玉祥抵达五原，即同于右任、孙岳、邓宝珊、方振武等组织国民军联军。冯被推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即发表宣言：过去“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

<sup>①</sup>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在列举了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之后，他说：“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sup>①</sup>冯玉祥的宣言表示了他的革命决心。冯玉祥还写信给我党中央要求对国民军给予指导和帮助，在信中他阐明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对革命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数年来始终领导工农努力奋斗，“实在令人敬慕”，党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到了苏联以后，更是“恍然大悟”，因而“我现在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信中还要求我党派人到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要求我党帮助他在北京、上海、天津物色人才，并任择两处，办两个报馆，作为国民军“宣传的机关”。还请求中央经常从政治上加以指导，设法寄一些政治出版物“以供应用”。<sup>②</sup>

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12条决议，北方区委也提出了《北方区委对于三特区及西北

---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②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军中工作的意见》，规定了党在国民军工作的原则、内容和要求。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派他的警卫团长到北京要求李大钊帮助，李即派共产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转告党中央，派陈乔年抵包头同冯面谈。当时到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达200余人。除刘伯坚担任了国民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外，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贾从周、安子文、李世乐、曹力如等共产党人也都担任了国民军中的重要职务。这样，党就在国民军里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

北方区委和李大钊为了便于同刘伯坚联系，及时了解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情况，决定由共产党员刘贯一、贾丽南在国民军中创办《中山日报》社，作为北方区委和刘伯坚联系的枢纽。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同志的主持下，党在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建立了党的“得力的指导机关”，而且制定了我们党在国民军中进一步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还筹办了《新国民军周报》、《革命军画报》、《中山画报》、《新国民军》等刊物；发行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与中国》、《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希贤（即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国民军的自身改造。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虽经整顿，但因转战数月，械弹两缺，出师策应北伐面临困难。如沿京绥线向南反攻，难于取胜；如向秦陇和包头分道出师，则兵力更显单薄。

正当冯玉祥为难之时，李大钊派专人送来密信，信中除叙述了北京一带奉军张作霖的布防情况外，还建议冯玉祥：国民军应出师长安、潼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冯很高兴，当即决定采纳李大钊的建议，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国民军出师后，很快打败了陕西的刘镇华部，解救了西安杨虎城部，还牵制了北线奉系军阀的实力，支援了广州政府军的胜利北伐。正如同年11月7日党中央在关于《江西战争形势及奉军南下问题》给李大钊的信中指出的：国民军的出击，是阻止奉军南下，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重大原因”。

(赵秀德执笔)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滇军的工作

蒋文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统战工作后，又成功地对滇军进行了统战工作。由于我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滇军抗日，并参加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同时也为我党进一步团结和争取滇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抗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十分重视推动和促进西南武装势力，尤其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

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就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名义向龙云揭露蒋介石降日卖国罪行，劝龙不要为难北上抗日的红军。红军长征两次过云南途中不断呼吁滇军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投降卖国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号召“一致团结起来，打倒亲日卖国巨头蒋介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第

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央派周懋圆、黄齐生到云南专访龙云，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要求收容失散在云南的红军，并送回延安，得到龙云的同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龙云等地方实力派有了抗日的表现。8月，龙云在南京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上，表示“愿将云南的人力、物力贡献国家”，答应组织滇军20万分批参加抗战。龙云在去南京途经西安时，朱德、叶剑英利用与龙云在云南讲武堂的旧僚关系，同他进行了有关抗战的磋商。在南京会议期间，他们又进一步向龙宣传、解释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龙云表示拥护我党主张，并提出愿与延安建立电台联系和派人到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术的要求，朱德表示同意。龙云返回昆明后立即组建六十军开赴前线抗日，并从昆明军分校中选派学员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

为推动滇军出征抗日，云南地下党在省临委和昆明支部的领导下，在城市和农村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云南各族人民和各界群众的支持下，9月下旬，滇军6个整编旅组成第六十军，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3个师，约47000人，于10月上旬开赴抗日前线。六十军组建时，党组织通过一八四师师长张冲的关系，派地下党员张致中到一八四师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地下党员杨重、王立中、刘孟田等也到该师工作。

1938年春，六十军从九江调驻武胜关期间，张致中根据党组织安排，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叶剑



英、罗炳辉旋在汉口会见了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向张阐述了我党抗日主张，张十分赞成，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党派干部到一八四师工作。武汉八办经向中央请示，认为张暂留党外便于工作，同意派干部到该师。3月下旬，党派了从延安来的干部周时英、杨华、张天虚及武汉八办的薛子政、蒋南生等同志到一八四师建立了党支部，由周时英任书记，与武汉八办罗炳辉、黄络峰联系，由中共长江局（后为南方局）领导。党组织还在武汉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到一八四师，成立了师政工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六十军驻孝感、鸡公山期间，叶剑英、罗炳辉访问了卢汉、张冲等六十军军官，阐述了我党抗日主张。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来到武汉后，冼星海还为六十军谱了一首军歌，任光、安娥向滇军教唱抗日歌曲，进一步激发了滇军官兵的抗日热情。

1938年4月，日军在鲁南发动全面进攻，六十军奔赴台儿庄参加徐州会战。4月22日，六十军在台儿庄以东与敌展开激战。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在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六十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滇军拚死抵抗，不断挫败敌人的攻势。在四五个昼夜的战斗中，滇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队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运送弹药、救护伤员、鼓励士气，哪里艰苦就出现在哪里。25日，日军猛攻禹王山一线，企图夺取制高点，突破我军防线，战斗十分激烈。地下党员和政工队员临危不惧，一面参加战斗，一面救护、慰问伤员。战斗间隙，还组织士兵开展文娱活动，刻印《抗日军人》小报，教唱抗

日歌曲，不断激励着官兵的斗志。由于滇军的艰苦抵抗，坚守禹王山近1个月，挡住了日本军的正面进攻，破坏了敌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并牵制了敌第五、第十师团主力，掩护了我数十万军队迅速脱离包围圈。在这场血战中，滇军亦伤亡过半。

徐州会战结束后，我党继续加强对滇军的工作。党支部联络了武汉进步演剧队到部队宣传演出，召开当地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加强军队与驻地群众的联系。武汉保卫战期间，长江局又派云南籍党员张子斋及湖北、湖南党员吕德基、沈力、黄致平、沈维新、杨育堂、毕竟存等到一八四师。滇军中的党组织除开展抗日宣传外，还根据上级指示，帮助恢复了崇阳、通山、阳新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并给平江游击队以武器、弹药支援。这时，云南第二支抗日军队——滇军五十八军组成，党组织利用地下党员杨守沫和军长孙渡的同乡关系，派杨到该军工作，以后杨发展了范啸谷等党员，对孙渡进行了统战工作。11月，五十八军抵湖北后，六十军、五十八军各抽一师组成新三军，张冲升任新三军军长。滇军三个军组成第一集团军，卢汉任司令官。

1938年云南省工委成立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为南方局）的领导下，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继续深入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城市和农村、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掀起更广泛的救亡运动。汪精卫离渝投敌前，经过昆明，曾与龙云密谈。汪叛国投敌后，党组织召集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卖国、声讨汪精卫的群众大会。接着，在党的推动下，文协云南分会在楚图南主持下，召开讨汪大会，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拥护抗战到底。西南联大 1000 多名学生发出通电讨汪，拥护抗战。地下党通过报纸等揭露汪逆罪行。各县也先后开展讨汪活动。9月4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信给龙云，鼓励他“坚持抗战，发动民众，巩固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之伟力，同心协力，创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通过这些斗争及我党的努力，进一步坚定了龙云地方势力的抗日决心。龙云于 1939 年 2 月 1 日发表讨汪讲话，表示拥护国策，抗战到底，并对《云南日报》记者谈话，表示“要忍受绝大的艰苦，绝大的牺牲，支持抗战到底”。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期间，党组织通过途经湖北的云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浩然向张冲转达了在敌后应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但因龙云反对，未能实现。不久，由于特务告密，蒋介石以张冲通共罪名将其革职查办，后由龙云出面将张冲调回云南，任中将参议。国民党加强了对滇军的控制，党的工作受到影响，但党组织仍通过各种办法继续坚持工作。1939 年初，部队驻防浏阳，党组织举办了政治训练班，抽调一些进步的战士去学习。这时滇军中党的关系转到平江新四军办事处，该处负责人涂正坤等还到部队给党员作报告。党组织通过开展文艺宣传，使部队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1939 年春，随国民党逐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加紧了“限共”、“反共”活动，滇军中党的工作更加困

难，组织决定让周时英、张致中、薛子正、刘孟田、张天虚、蒋南生等同志撤离滇军，其余党员由杨华负责（后由张子斋负责）坚持工作。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后，滇军中党的关系转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 二

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团结抗战方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党对滇军的工作转到以“三坚持、三反对”为主要内容的斗争上来。1939年9月，南方局派方正到一八四师工作，并将党中央的这一精神传达到了滇军。

1940年9月，日寇侵占河内，滇军六十军调回云南加强滇南防线。方正、张子斋回南方局汇报并请示工作。李克农向方正传达了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指示滇军地下党要广交朋友，调查了解情况，争取掌握兵权。方正返回滇军后，即在滇军党组织中进行了传达贯彻。

这时，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在昆明设立总部，设置第一、二路指挥部，沿滇越边境之河口、屏边、金平、建水一带布防，六十军决定驻防蒙自，张冲被委任为第二路指挥。南方局决定派张子斋、宁坚等回云南，继续做张冲的统战工作，并以二路指挥部为据点，扩大滇军工作。张子

斋以张冲的秘书身份开展工作。1939年9月，中央组织部派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朱家璧返回南方局，1941年初朱回到云南，利用曾在滇军工作过的基础和关系，在卢浚泉第一旅二团三营任营长，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滇军中开展工作。1941年8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日寇占领贵州独山、云南腾龙的严重形势下，指示云南地下党在发动群众、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同时，作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同时取消滇军中的党支部，委派方正为南方局驻滇军特派员，单线联系六十军及二路指挥部中的党员。

为准备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云南省工委不断派遣或转移部分暴露的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关系进入滇军荫蔽起来。朱家璧及二路指挥部的张子斋、宁坚、张士明及方正等，对滇南及滇东南的盘江两岸进行了考察，研究了地理民情，进行了发动民众的工作。六十军地下党员通过交友，团结了一批有进步倾向的军官，开展了对一八四师师长万保邦的统战工作，逐步掌握了一些部门。在二路指挥部中的党组织，在张冲支持下，以合法名义吸收了驻地各县青年到部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培养革命力量，以后将这些青年编成一个由我掌握的整训排。为扩大党的影响，发动民众，他们办了《泸江小报》沿铁路散发；通过到石屏、建水部分中小学兼课，办民众夜校、识字班等方法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在第一旅，朱家璧一面通过原黄埔同学关系，广泛联络滇军上层，遵照周恩来“以进步面目出现，放手地在滇军中开展工作”的指示，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

一面同三营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一道，放手宣传团结、进步、抗战。他们在三营成立了“前锋剧团”，创办了《前锋》旬刊，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宣传。为提高官兵觉悟，还举办了一些时事、政治讲座，扩大影响。朱家璧并通过整顿军纪、革除旧军队的一些腐败现象等措施，使三营的面貌为之一新，从而影响并带动其他部队。1943年朱家璧所在的一旅扩编为十八师，朱调十八师三团任副团长。在他的倡议下，十八师成立了艺工队，经师长卢俊泉同意，到各部队巡回演出进步话剧、教唱歌曲，收到良好效果。

蒋介石为了控制云南，1942年，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驻军急增至10多个军，达30余万人。在此情况下，云南地下党遵照中央“一方面尽量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精干荫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及周恩来对云南“要充分利用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广泛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多渠道、多种关系不断争取龙云地方实力派。1940年党派陈赓雅以上海《申报》记者身份访问龙云。同年11月，又有《新华日报》记者访问龙云、李根源等，同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介绍了延安及敌后八路军的情况。1941年根据中央指示，省工委将揭露皖南事变真象的文件分送龙及周围人员，还通过张冲等把“陕甘宁地区五一施政纲领”等文件送给龙云等。在我党积极争取和蒋龙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如1941年2月，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和举办集中营的计划到昆明，准备进行大逮捕，

龙云拒绝合作，使其阴谋未能得逞。1942年云南省工委派刘浩面见龙云，向他陈述蒋介石借抗日排除异己的野心，要龙注意。之后，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张子斋等同志起草了一份抗日反蒋十条建议，交给龙云，内容包括扩充云南地方部队，改善云南部队政治工作，限制国民党中央军和宪兵团的活动及特务任意捕人等。之后，龙云下令：“不得藉故限制和危害民众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协助并领导各社会团体，共同保乡，以济时艰。”在我党多方争取下，龙云日益向我靠拢。1943年，龙云提出邀请周恩来来昆明面晤的要求，经省工委向南方局请示，南方局遂派华岗为代表，以云大讲师身份为掩护，与龙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蒋介石武力逼迫龙云下台。1944年，龙云还秘密加入了“民盟”。龙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主运动。

我党对龙云地方实力派进行的较为成功的统战工作，为党争取滇军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党对滇军的工作又支持和促进了整个统战工作的全面开展，为我党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进攻民主进步势力的困难时期，争取了云南地方势力积极站到坚决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和专制倒退的进步立场上来。

### 三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强，德、

意、日侵略者正走向穷途末路。但在这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抗日仍然采取避战和观望的态度，而且积极推行专制独裁的政策，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则镇压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根据党中央指示，云南地下党在南方局领导下，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在滇军中，地下党在深入荫蔽埋伏的同时，进行了大量工作。

1943年，在六十军中的地下党员杨重任补充团一营营长后，党组织又陆续从联大、云大及从缅甸归国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中，选择了一批人，如孙公达、赵雄、陆飞、陆毅、岳竟先、廖必均等派人补充营，加强工作。此时，六十军中其他地下党员王立中等也分别担任了连排长职务，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他们通过交友，团结了李佐、任孝宗、张维孝、李铮先、段明、朱光云等一批六十军的中上层军官，并搜集了大量情报。1942年4月，南方局派张文澄夫妇及杨才到云南，同方正一道负责联系滇军中党的工作，并搜集有关军事、经济、政治情报。党通过张冲将报务员安排到二路指挥部，建立了与中央、南方局的电台联系，将大量情报上报中央和南方局，并加强了南方局对滇军工作的指导。在二路指挥部，由于有张冲的支持和张士明任特务营营长等有利条件，党组织不断将石屏、建水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如高翔、李铁、张镇云、普占魁等派进来，在进行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在十八师三团，党组织继续以文艺宣传、政治教育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民主进步思想，揭露反动派



的专制倒退。艺工队在十八师各部队中演出了《杏花春雨江南》、《朱大嫂送鸡蛋》、《丈夫去当兵》、《十里相送》、《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话剧，教唱了《在抗日根据地》、《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游击队员之歌》、《军民团结》等抗日进步歌曲。通过艺术力量的感召和讲解歌词的政治意义，潜移默化地感化了官兵，促进其思想的转变。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拥护。为响应中央这一主张，云南地下党不断发动各界人士召开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提出“保卫大西南”、“废除独裁训政”、“实行宪政”、“保护人权”等口号。为保卫大西南并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指示云南省工委：云南要准备搞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在条件成熟时搞，切勿过早暴露目标。

按照这一指示，党继续在滇军中进行反对独裁专制和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在十八师，朱家璧等同志利用在三团及第一集团军大屯训练班和盘溪督训处（1944年上旬朱先后负责这两处工作）任职之机，给官兵讲课，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反对独裁专制，启发官兵觉悟。地下党还通过组织官兵讨论苏联卫国战争小说《前线》、介绍《西行漫记》、《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及鲁迅的著作，订阅《新华日报》及党的刊物《群众》等报刊，启发他们的革命意识，宣传革命道理，为掌握武装力量努

力工作。在六十军，尤其在二路指挥部，党为开展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张冲还用私款购买了一批枪枝，打算以水利监督署警卫营名义（张冲又兼泸西、弥勒水利监督），继续培养扩大革命武装，但龙云不同意建警卫营，张即将这批武器交弥勒圭西山地下党保存，为以后党在这里发动武装斗争打下了一定基础。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云南人民的革命斗志。年初，滇军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朱家璧调集团军任特务团团长，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云南地下党又动员了很多党员和“民青”成员进入特务团等部队中。4月，一、二路指挥部撤销，原二路指挥部中的党员张士明等人也分别编入第一集团军各部队中。张冲离开滇军，专职弥勒、泸西水利建设。张在任二路指挥时，尽管蒋介石对他怀有戒心，派特务邱开基监视他，但他仍在掩护我党、支持爱国民主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初，周恩来让黄洛峰来昆明看望了张冲，更增强了他的革命信心。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人越受降，滇军准备全部开赴越南。滇军人越前，南方局、云南省工委通过华岗、张冲等，不断提醒龙云提防蒋介石的阴谋，注意这次调动的危险性，朱家璧也向卢浚泉等提出劝告。但未引起龙云重视。滇军开赴越南时，南方局指示滇军中党组织：部队开到哪里就坚持到哪里，争取掌握兵权，若蒋介石发动内战，必要时把部队拉过来。

滇军人越后不久，10月3日，蒋介石亲自坐镇西

昌，指挥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武力解除了龙云政权，并将龙挟持到重庆，由李宗黄代省主席，开始向云南进步势力进行反扑。党组织针对蒋介石镇压革命力量的罪行，放手发动群众，于1945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在越南滇军中，党组织针对蒋介石武力解决龙云，残害民主爱国学生而引起滇军将士的强烈不满情绪，广泛地揭露了蒋介石镇压民主运动，消灭异己的罪行，激发官兵的反蒋思想。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为把滇军调到东北打内战，也加紧了对滇军进步势力及龙云势力的清理。10月，蒋介石根据特务密报，电令卢汉对朱家璧等“着即查办”，逮捕了朱家璧、王秉璽、刘峰、范仲平等共产党员。由于党组织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敌人准备将滇军中党组织一网打尽的计划落空。不久，卢汉即授意卢浚泉将被捕人员释放。11月，蒋介石召卢汉赴渝参加复员整军会议。在蒋介石诱逼下，卢汉同意离开军职，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驻越滇军8个师编为第六十、九十三两个军，辖6个师。被裁下来的军官中，大部分是亲龙势力，其中部分是受我党影响的进步分子，他们在回国途中，带动了很多不愿内战的官兵逃回国内。滇军整编完毕后，于1946年4月被海运到东北充当蒋介石的炮灰。

滇军整编期间，地下党按照南方局的指示，继续进行荫蔽的斗争，他们为策反滇军积极地进行准备。朱家璧离开滇军前，同张士明及靠近党的陈禄等人交换了到东北后即将队伍拉向解放区、能拉多少拉多少的意见。朱还同九十军军长卢浚泉进行了长谈，向他说明内战是失人心的，

蒋介石消灭异己，滇军到东北会被断送。这时张士明调十八师三团任副团长，他将陈禄等调三团七连任连长，派白华协助工作，准备拉队伍起义（后该连到东北不久，就首先起义）。滇军开赴东北前，方正离开滇军向南方局汇报，六十军党的工作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由张士明负责。

经过长期荫蔽埋伏和深入工作，党在滇军中扎下了根，积蓄了充分的力量。六十军中有党员杨重、王立中、马逸飞、孙公达、陆飞、赵雄等及靠近党的詹羽、蒋大年、卢存芳、李涛等人（他们到东北后即被吸收入党），其中杨重任六十军补充团团长，马逸飞任一八四师参谋长，其他人也分别进入军部机要、情报、军务、人事等重要部门，团结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中上层军官，如李佐、李铮先、任孝宗、潘朔端、魏瑛、张维孝、张秉昌、朱光云等。九十三军中党员有张士明、宁坚、黄致平、高翔、李茂春、郑南信、白华等人（有的到东北后才吸收入党），其中张士明任十八师三团副团长，后任暂二十师一团团长，宁坚任暂二十二师参谋长，其他同志也分别任连、排长职务及在一些重要部门工作。这均为党争取滇军在东北起义打下了基础。

滇军到东北后，党的工作即在党中央、东北局和冀热辽军区（后东北军区）的领导下进行。在我党我军强大政治、军事攻势和地下党的努力下，最后争取了滇军在东北大部起义，尤其是六十军在长春起义，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滇军进行的成功的统战工作，对推动、促进滇军积极抗战，使其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党在滇军中积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滇军最后走上反蒋起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董必武 彭德怀 贺龙等同志  
建国后视察黑龙江活动年表

龙 言

1950年

2月27日 下午2时许，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归来，到达哈尔滨。随同到哈的有滕代远、陈伯达、汪东兴、叶子龙等人。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同车到哈。下午4时许，毛主席、周总理一行，在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市长饶斌等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视察了锻冶、机械、机修三个分厂。毛主席、周总理询问了工厂的历史、规模、党团建设和职工队伍等情况，指出，要利用、保护和管理好这个工厂；党的领导要依靠老工人、培养新工人、学会管理工厂；工厂要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为全国机车车辆工厂树立榜样。下午5时许，毛主席、周总理在张策、饶斌、李延禄（当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陪同下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五楼平台，俯瞰哈尔滨全城，了解了哈尔滨的行政区划、工厂布局和人口状况。毛主席指示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并嘱咐李延禄，

下功夫写一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之后，毛主席、周总理一行回到颐园街1号住地，接见了松江省和哈尔滨市主要领导，听取了省市领导有关民族工商业和农村土改后的汇报。晚上，毛主席在颐园街1号二楼应省市领导的要求题词，为松江省委题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为哈尔滨市委题了“发展生产”，为正在召开的哈尔滨市第二次团代会题了“学习马列主义”，又为《松江日报》题了报头。

28日 早8时许，毛泽东、周总理一行离哈尔滨赴长春。

## 1952年

8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由吉林省到齐齐哈尔市。在齐齐哈尔期间，由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冯纪新、省政府主席于毅夫等陪同，先后视察了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和省园艺试验站。朱德由冯纪新陪同来到园艺试验站，仔细地听取了站负责人的汇报，观看了苹果园和葡萄园。朱德勉励该站职工说：你们在高寒禁区培育出苹果很了不起，要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离开园艺站之前，还高兴地和省市领导一起同职工在苹果树下合影留念。并且再一次勉励职工们，继续努力。

9月初 朱德由齐齐哈尔经北安前往松江省视察。途中，专程前往通北农场（即今赵光农场所辖）视察。朱德了解到农场条件很差，生活比较艰苦，劳动强度也大，便

指示场领导说：要发展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要抓生产也要抓生活。搞好多种经营，在不亏损的基础上，争取对国家有较大的贡献。在哈尔滨期间，朱德由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陪同，先后视察了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哈尔滨轴承厂、哈滨第一工具厂。在伟建机器厂视察时，朱德详细询问了工厂当时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情况，语重心长地对厂领导和工人们说，我们过去吃过不少工业落后的苦头，一定要抓紧时间把产品搞上去，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要钱给钱，要人可以从外地抽调，总之，要快！在视察哈尔滨轴承厂过程中，他同车间工人谈话时说，机械设备好比战士手中的武器，要爱护自己的机器，爱护工厂一切设备。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他抚摸着刚从国外进口的螺丝磨床对厂领导说，一定要发挥它的作用啊，保证飞机制造工厂所急需的特殊刀具。接着，朱德离开哈尔滨到佳木斯视察。他在佳木斯先后视察了佳木斯电机厂、佳木斯木材加工厂、佳木斯热电厂和莲江口油库。他对佳木斯电机厂的负责同志说，电机厂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你们不但要当好家，还要管好家。朱德勉励佳木斯木材加工厂干部和工人：要用你们的辛勤劳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建设。在莲江口油库，朱德登梯上到油罐顶端仔细检查，并一再嘱咐佳木斯市领导和油库同志说，这是国家急需的油料，一定要保管好，绝对不能出问题。

**9月5日** 朱德到达牡丹江视察。6、7两日先后视察了国营桦林橡胶厂和国营北方工具厂，并分别留下了“努



力工作，提高质量，减低成本，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和“努力工作，完成任务，支援前线”的题词。

9月7日 朱德游览了镜泊湖，当天下午赴吉林省。

12月31日 上午9时许，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了参加苏联将中长铁路移交我国最后议定书签署仪式，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下午1时，他出席在哈尔滨铁路文化馆举行的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署仪式庆祝大会，并讲了话。晚上，周总理出席了负责办理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铁路文化馆举行的招待会，观看了苏联艺术工作团演出的音乐歌舞节目，然后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周总理宣读了毛泽东主席为移交中国长春铁路于1952年12月31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的感谢电。

## 1953年

1月1日 周恩来总理在松江省省委书记李常青和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的陪同下，向苏联红军烈士墓和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献了花圈，参谒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总理先向解放东北而英勇牺牲的烈士献了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花圈，然后到东北抗日战争馆和解放战争馆，详细地看了陈列在那里的文物、史料和图片，听取了解说员的介绍。在参谒过程中，周总理说：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得了人民的解放和胜利。要广泛搜集革命烈士的事迹和文物，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临走时，总理还

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并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烈士纪念馆的工作要好好办。晚上，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感谢和纪念原中国长春铁路苏联专家在中苏共管期间的工作成绩及对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的帮助，在哈尔滨铁路文化馆举行授章典礼，周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 1300 多名苏联专家授“中国长春铁路纪念章”，并与受章的苏联专家合影留念。

**1月2日** 周总理离哈尔滨返北京。

**8月初** 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来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视察了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给团以上干部讲了国际形势和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上签字情况，并鼓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军事工程学院办得更好。他在视察伟建机器厂时，嘱咐他们加快建设步伐，多出产品，支援国家建设。

**8月6日** 彭德怀一行 10 人到齐齐哈尔。先后视察了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国营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及机场和步校。在和平机器厂观看新产品时，他赞扬了工人们敢想敢干的主人翁责任感。他赞扬工人们说：你们是国家的财富。你们为国家立功了。你们的产品很好，很有用呵。在建华机械厂参观产品陈列室时，他赞扬说，你们生产的产品很好，包装也好，使用起来很方便。在视察车间时，他指示工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想办法尽快搞出一套科学的计量仪器，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

**8月8日上午** 彭德怀一行到富拉尔基建筑工地参观。午间 11 时 30 分离开富拉尔基转赴外地时，他对送行

的和平机器厂负责同志说，外国曾答应装备我们一些东西，可是，现在一样也没到。所以，指望别人是很困难的，只有靠国内自己生产了。现在，国家非常需要你们的产品，你们要加倍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

## 1956年

4月 贺龙、聂荣臻、萧华等同志来我省，贺龙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市视察了国营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哈尔滨亚麻厂、哈尔滨轴承厂、哈尔滨中苏友谊宫、哈市郊区某军马场、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和国营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在军马场，他详细地询问军马驯养情况后，指示职工一定要养好军马，为加强国防贡献力量。

## 1957年

4月20日 党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到达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听取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工作汇报，并由强晓初、任仲夷、吕其恩等省、市领导同志陪同，先后视察了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亚麻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朱德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视察了几个车间以后，走进职工食堂同正在就餐的职工亲切交谈。

4月24日 朱德视察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和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由刘居英、谢友法等学院领导同志陪

同，与师生员工见面。朱德同志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学院第一批同学今年将要毕业，这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是很值得高兴的事，祖国对你们寄予殷切的希望。

**4月26日** 朱德由省委书记冯纪新陪同前往齐齐哈尔视察。在齐齐哈尔期间，朱德先后视察了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齐齐哈尔热电厂、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并详细询问了生产情况，对马恒昌小组同志的主人翁精神和劳动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齐齐哈尔期间，朱德亲切接见了嫩江地委和齐齐哈尔市委常委以上领导同志以及几家国营大厂的负责同志。他说，大家要兢兢业业地工作，要扎扎实实地搞建设。要把工厂管理好，把生产组织好。要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勤俭办事业，哪怕是一根铁钉也不要浪费。

**4月27日** 朱德返回北京。

## 1958年

**9月1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到哈尔滨，住在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他听取了该市领导同志关于香坊、新华两个人民公社情况的汇报，并在副市长王化成陪同下，视察了新华人民公社，在市委副书记郭伟人陪同下，视察了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和国营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在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着重检查了新技术研究设计工作，还亲自到试验现场观看研制的

水翼艇表演。当他听了研制过程的汇报后，对顾懋教授说，搞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失败后，总结经验，就能取得最后胜利。他还利用时间经常到实验工厂、学院教室同教职员工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并多次指示学院坚持为社会主义、为国防服务。在该学院，他接见了外国专家，又与40多位老教师座谈，给全院师生员工工作了形势报告。

**9月13日至16日** 彭德怀在齐齐哈尔视察了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国营碾子山华安机械厂、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市园艺试验站、第二机床厂、第一机床厂、齐齐哈尔医士学校、齐铁车辆厂及车辆厂技校，参观了“大跃进”成果“庙会”。他在园艺试验站说，北方种葡萄，应该发展，要多培养些果类，给人民造福。

**9月18日** 彭德怀离开哈尔滨。

## 1959年

**6月20日中午** 朱德和董必武由长春到达哈尔滨。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五和强晓初、吕其恩等陪同下，于20日至22日先后视察了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伟建机器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在伟建机器厂，朱德、董必武听了厂领导汇报以后，都关切地询问了产品的性能和产量，叮嘱他们尽快使产品定型，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哈尔滨期间，朱德、董必武听取了中共黑龙江省委

工作汇报，接见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并游览了松花江畔。

朱德、董必武在哈尔滨观看了文艺演出以后，应剧院领导和演员的要求，朱德高兴地题写了“哈尔滨歌舞剧团”的牌匾（即现在的哈尔滨歌剧院）。朱德还应哈尔滨市领导同志的请求，热情地为“哈尔滨青年宫”、“哈尔滨少年宫”题写了两幅字帖。现已成为永恒的纪念。

**6月23日** 朱德、董必武离哈尔滨回京。

**12月22日** 周恩来总理为了出席东北地区协作会议，到达哈尔滨。东北地区协作会议是自12月15日至25日在哈尔滨召开的。

12月23日，周总理视察了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对学校工作作了指示。

**12月24日下午** 周总理在省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要报告。他强调指出，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国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加速建设我们国家，就要加快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尖端的国防力量，培养出包括理论人才在内的大量的建设人才，加强党的团结。晚上，周总理视察了哈尔滨市三八饭店。他赞扬家庭妇女冲出家门，走向社会，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办起饭店的革命精神；并鼓励她们说：服务事业是崇高的事业，是光荣的，要好好为人服务。

**12月25日上午** 周总理离开哈尔滨回北京。

## 1960年

**11月12日** 贺龙与其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问团成员罗瑞卿、刘亚楼、王平、杨勇、萧向荣、陈锡联、周希汉等从朝鲜访问归来，到达哈尔滨。

**11月13日上午** 贺龙召集哈尔滨市几家大工厂的军代表到住地汇报情况。下午，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他指出，把展出的烈士，范围扩大。他指着关向应烈士的照片说，照片太小，位置放得也不当。

**11月14日** 贺龙一行在省长李范五等省、市领导同志陪同下，视察了国营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和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并在伟建厂会议室召开了有关工厂领导同志和军代表参加的会议，着重解决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会上，他直率地批评：“产品质量差，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会后，他又把省委有关同志和有关工厂领导找到住地开会，讨论产品的质量。他要求省委领导多关心中央在省的工业企业，抓好产品质量。他同省委领导同志商定，东安厂和伟建厂进行整风，解决存在的问题。

**11月15日**，贺龙一行在李范五等省市领导同志陪同下，视察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当天贺龙又视察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接见了校级军官和老教师，参观了学员教室、宿舍、食堂，翻阅了学员的学习笔记，详细地询问了学员的学习情况。

## 1961年

7月1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林业部副部长张昭和夫人王光美陪同下到达哈尔滨。刘少奇同志听取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指出：此次来黑龙江是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了解情况，不是享受来了。通知要去的地方，不要搞什么活动，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不准搞额外的招待。

7月20日 由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陪同前往伊春林区带岭林业实验局视察。到带岭以后，在专列上同前往迎接的伊春市委书记王钊、带岭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张子良等负责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刘少奇同志详细询问了该局生产、生活、职工队伍等情况。

7月21至22日 刘少奇视察带岭林业实验局凉水林场和寒月林场。22日晚，刘少奇召集带岭林业实验局各级干部和各方面的职工代表共3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当大家反映林区生活比较艰苦，衣服、鞋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等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刘少奇说：林业工人生活很苦，我这个当国家主席的有责任啊。现在国家还不富裕，又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努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刘少奇还对在座的张昭和范五说，林业工人穿衣、穿鞋有困难你们应该想到，帮助解决嘛。工人生活应该照顾一下，晚上喝点酒可以休息得更好嘛。

7月23日 刘少奇离开带岭林业实验局前往小兴安



岭腹地五营视察。在一次干部会上，刘少奇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烧荒”的学问及其利弊。他提醒大家说，一定要组织好，“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7月25日** 接见伊春市委、市政府及林业方面负责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

离开伊春之前，刘少奇应当地负责同志的请求，高兴地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7月26日** 刘少奇在佳木斯视察造纸厂。

**7月27日至30日** 刘少奇在镜泊湖期间，听取了东京城林业局负责同志的汇报。他非常重视该局人工栽植红松林的经验，并亲自实地察看。

**7月31日** 在哈尔滨接见中央召开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参加的林业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同志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同志时，他指出：林业工作一定要想到将来，想到子孙后代，给后代留下森林资源，做到青山常在。刘少奇还责成欧阳钦，黑龙江在发动群众造林方面先走一步。

**8月2日至6日** 刘少奇到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所属的根河、伊图里河、图里河三个林业局视察。

**8月7日** 刘少奇在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视察时，针对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说，要建立和坚持合理的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计件工资制，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精神。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他说，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了。不要怕人家卡脖子，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自力更

生。共产党员历来冲锋在前，现在也是考验。同一天，在视察大庆油田时，他高兴地说：这个油田很有希望。他鼓励干部和工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是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大庆要和全国一样，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共同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大庆会战很有成绩，祝你们胜利，祝你们成功。他又嘱咐油田领导说：工作和生活条件越艰苦，越要搞好职工生活，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农副业生产。将来 20 多万职工家属一来，就是五六十万人，吃的，烧的、日用品供应都要跟上。要盖点房子，会战初期“干打垒”解决了住房困难，将来条件好了可以盖点好房子。

**8月8日** 刘少奇回到哈尔滨以后，又一次接见东北三省、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同志，就林业工作讲了话。当天下午，刘少奇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陪同视察了东北林学院（即今东北林业大学）。他对学院领导说，要象培育树苗那样去关心、爱护和培养这些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的技术人员，是专家。有了他们，我们的林业事业就能更快地发展。他还告诉学院的领导，把东北地区的主要树种都引进来，一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见习。

**8月9日** 刘少奇视察了哈尔滨市香坊区的几个街办企业。对于家庭妇女参加集体劳动，解决城市多余的闲散劳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8月10日** 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的

全体同志，当天，他离开哈尔滨回北京。

## 1962年

6月17日晚10点50分 周恩来总理偕邓颖超（全国妇联副主席）、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同志乘专列到达哈尔滨。

6月18日上午 周总理在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剑白、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郭伟人陪同下，视察了国营哈尔滨松江电机厂和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下午，他在省委书记欧阳钦、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剑白以及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和市委书记郭伟人陪同下，视察了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和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总理在视察轻合金加工厂时，详细地询问了工厂的生产和他们的工作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提高技术。总理对厂领导讲了国家需要优质轻合金材料的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要有志气，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让他们（指苏联）封锁几年，我们就什么都造出来了。”总理在视察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的时候，鼓励他们利用很好的条件，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嘱咐大家，要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把工厂搞好，要扬眉吐气。晚上，总理在邓颖超陪同下，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召见学生中的几名烈士子弟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他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嘱咐他们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化，好好学习，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革命意志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成为有用之才。总理又嘱咐刘居英院长，把群众性体育活

动开展起来，增强学生的体质。

6月19日上午 周总理同省委常委谈话，下午在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李剑白、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等陪同下，视察了哈尔滨电机厂。晚11点半，在李剑白同志陪同下，周总理一行赴齐齐哈尔。

6月20日上午 周总理视察了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和齐齐哈尔钢厂。总理曾经说，第一重机厂是“国宝”，因此，他在视察过程中十分关心这个工厂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嘱咐厂领导搞点农副业生产，改善职工生活，并在工作中要相信群众。总理在视察钢厂时，对工厂的领导同志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地信任，更好地依靠。工人知道了他干的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意义，才会焕发出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干劲，才能动脑筋、想办法，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下午，总理视察了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和国营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他在和平机器厂同工人们交谈中，勉励工人们做好产品的检验工作，把好质量关，希望老工人培养出新一代。总理在建华机械厂参观工厂产品陈列室后，与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工人群众见了面。晚上，周总理听取嫩江地委常委、齐齐哈尔市委以及几家国营大厂党委书记的汇报，并同地、市领导、几家大厂领导和驻军部队负责同志座谈，又听取了石油部负责人余秋里、康世恩的汇报。

6月21日 周总理在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剑白等陪同下，视察了大庆。他

在大庆视察了一二〇二、一二〇三钻井队、北二注水站、北三排六十三井、西油库、新三站等处。他在同工人们交谈中，鼓励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要大家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祖国争光，甩掉我国贫油帽子。他肯定了大庆工人实行的岗位责任制。周总理深入到工人住宅，看到工人住的“干打垒”房子和“地窝子”房后说，大庆人值得学习，生活这样艰苦，工作照样干得好，又向有关同志嘱咐说，要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总理还深入到职工食堂，亲自揭开锅盖，拿起勺子搅了搅锅里正在煮的高粱米粥，又尝了尝菜汤，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里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总理在大庆又接见了大庆会战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在大庆工作的石油科学方面的专家、教授。

同日晚6时，周总理一行路经哈尔滨赴牡丹江。6月22日上午9时到吉林省图们市。

## 1963年

6月17日上午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等外宾，乘专机到达哈尔滨。下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外宾，在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五、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等陪同下，游览了市容和松花江。

6月18日上午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外宾参观

哈尔滨电机厂，出席了三大动力厂职工欢迎朝鲜贵宾的大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陪同外宾到兆麟公园，在李兆麟墓前献花默哀，深深地表示对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哀思。下午，周总理同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谈话。

6月19日上午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外宾乘车离哈赴大庆参观。在大庆，参观了一二〇二钻井队、四二七井的钻井工程、六排十七井的采油和喷油、中三转油站、中二注水站、采油三矿职工宿舍等地，在参观过程中，总理表扬了大庆工人坚守岗位，按时装油，不浪费一点一滴油的好作风，要求保卫干部们一定要保卫好油田的安全生产。下午6时，陪同外宾离开大庆返哈尔滨。

6月20日上午8时20分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外宾乘专列离哈赴长春。

## 1964年

7月14日 朱德、董必武以及王维舟经吉林省图们市到达黑龙江省镜泊湖。在这里停留三天。先后视察了湖泊水产养殖场、木材水运场和附近的人参种植园、养鹿场。乘游艇欣赏了湖光山色并分别题写诗篇。

朱德写道：“镜泊湖中共泛舟，清风款款过船头，山青树密有斑虎，水绿波平无白鸥，林局转输材木快，鱼场养殖鲤鲢优，殷勤利用天然境，事业新兴万古留。”

董必武写道：“舟泛南北两湖头，到处清幽不用求。水碧山青宜人画，游人欣赏愿勾留。众山环抱翠湖青，水溢泉流波自平。汽艇鼓轮微作浪，身无俯仰任纵横。”

7月17日 朱德和董必武等由镜泊湖到牡丹江视察。在一次汇报座谈会上，朱德对陪同的黑龙江省领导同志说：你们黑龙江的土地面积很大，等于好几个江苏。你们的农业、林业和煤炭条件都好，要好好利用起来。当牡丹江市的同志汇报到发动群众兴办小型电站时，朱德说：发动群众办电站是个好办法。董必武也说：你们这个地区条件好，可以多办一些。当谈到地方贸易时，朱德说：地方性的小额贸易可以长期坚持。多出口一些地方产品。要重视利用山产品创造财富。

朱德在牡丹江期间，同一些干部谈话中还指出：我们是7亿人口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把马列主义坚持到底。要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把接班人搞好。他要求年轻干部经常下到基层，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些人忘记了我们党是艰苦奋斗过来的，要经常教育人们，特别是干部注意到这一点。董必武也说：搞社会主义仍然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

离开牡丹江后，董必武作诗《别牡丹江》：“匆匆别去牡丹江，竟日深居听报忙。略识此区生产事，未能一览市容光。”

7月18日 朱德、董必武等由牡丹江前往虎林县境内参观访问农垦部实验农场（即八五〇农场）。这个农场地处乌苏里江边的红心村，是50年代在王震的直接关怀下创办的实验农场。

7月19日 朱德视察佳木斯造纸厂，对该厂以落叶松代替红松造工业用纸表示满意。在铜网分厂参观时说，

铜在我国属于稀有贵重物资，一定要管理好，用好，不能浪费掉。朱德十分关心佳木斯市的建设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游览市容后，对陪同的当地领导同志说，十几年不见，佳木斯发展很快啊！他还特别仔细地询问了松花江的水深、江宽以及利用情况。

**7月20日** 朱德和董必武视察伊春的带岭林业实验局，在森林小火车上听取了该局党委书记张子良的汇报，当汇报到试建营林村的情况时，朱德说：这个办法好，要好好办。又说，要把林区的人都组织起来搞林业，都关心林业，林业才能发展。

**7月21日** 朱德和董必武在哈尔滨接见了出席中共黑龙江省二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7月24日** 董必武视察了牡丹江、佳木斯和一些林区工作之后，同省及东北林业总局领导一起研究林业工作。董必武说：要加强次生林的抚育、改造工作。要把林业工人的家属组织起来，有种庄稼的，有采育的，有搞加工的，搞多种经营。要把山上的次材都运下来，你这个地方用不上，别的地方有用嘛。他还指出应该在“四旁”植树。

**7月31日** 朱德和董必武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视察时，听取了该厂党委书记李敏的汇报。朱德说：你们要更好地加强管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产品质量，支援全国的机械行业。在视察哈尔滨龙江电工厂时，朱德应工厂领导的请求，留下了“依靠群众，革新技术，精益求精，巩固国防”的题词。



同日，朱德和董必武专程前往哈尔滨郊区视察了新发畜牧场，听了汇报以后，朱德同志鼓励他们说：你们的事业办得很好，要继续好好办，努力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

**8月1日** 朱德和董必武等到大庆视察。当看到当年的茫茫草原，如今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时，朱德赞赏地说：大庆树立了一个艰苦奋斗的样板，要继续坚持下去。他还高兴地为大庆题词：“大庆是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兵，戒骄戒躁，永远前进。”

董必武对大庆油田组织家属开展农副业生产表示赞同，他说：把家属组织起来很好，农忙时搞农业，工业忙时还可以搞工业，还可以搞点牧业。

**8月4日** 朱德、董必武由齐齐哈尔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视察。

## 1965年

**7月31日** 贺龙副总理由镜泊湖来哈尔滨。他在镜泊湖休假期间，参观了镜泊湖鹿场。

**8月1日上午** 在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等省市党政军领导同志陪同下，贺龙观看了哈尔滨市人民“八一”渡江活动。

**8月2日** 贺龙乘车去大庆视察。在火车上，他听取了大庆负责人的汇报。他在大庆观看了油田生产流程、地质资料室，参观了油建红卫星生活基地、西油库、中六排十七井、龙凤炼油厂、石油管理局缝补厂等单位。在龙凤

炼油厂，他对康世恩、徐今强等同志说，你们搞得很好，大庆炼油厂比兰州炼油厂建设得好，是自己动手建设的，经验是自己的。现在机器用的油很复杂，有些油还要靠进口，你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把它搞出来。当他听说大庆研究员已有 1000 多名大学毕业生时，高兴地说，这个非常需要，要很好培养，这是个很大的本钱。并指示说，一定要在科研上舍得下本钱。

8月4日上午 贺龙又一次视察了国营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和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他看到两个工厂的进步，高兴地说，你们现在搞得不错，有很大进步，工人和干部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他要求他们产品要设计新的。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搞出自己的东西来。不要老跟着别人后面跑，搞人家搞过的，一定要并着跑，超过他们。当厂领导请贺龙对工作提出批评时，他笑着说，现在你们出了新产品，应当鼓励你们，表扬你们。并鼓励他们说：“你们要鼓干劲，挖潜力，争取做哈尔滨的先进厂，争取做部里的先进厂。”

8月5日 贺龙同志乘机离开哈尔滨去长春。

10月9日至13日 刘少奇、陈毅为迎接和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外宾访问黑龙江省，乘专机到哈尔滨。

10月12日 刘少奇、陈毅、李范五等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了哈尔滨电机厂。当日，刘少奇同志听取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全省农业情况和问题的汇报并作了指示。刘少奇说：要把副业生产搞起来，副业生产搞不起来，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你们这个地方有半年的农闲时间，可

以多干点事情，多搞些生产，多收入一些。重要的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积极性高了成本就降低了，收入就增加了。刘少奇又说，干部参加劳动，机关革命化了、干部革命化了，群众就高兴。有的干部不参加劳动，吃的又好，穿的又好，住的又好，群众怎么会有积极性呢？我们的共产党员硬是有不相信群众的，他口头上也说相信，一到实际工作中就忘了。没有和群众搞好关系，你要靠他，他也不让你靠。这些同志只有改正了缺点、错误，群众同他的感情才会改变。

## 1966年

**5月3日** 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亚党政代表团乘机到哈尔滨。上午，参观了国营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和国营哈尔滨东安机械厂。下午，在大庆参观了南二区六排丙三十二井、南Ⅱ—Ⅰ油库、一二〇二钻井队、石油化工总厂的二套常减压车间、催化裂化车间、铂重车间。在参观过程中，总理表扬一二〇二钻井队为争取年钻10万米，创造世界石油钻井史上年钻最高记录而苦干的劳动热情和科学精神。他在石油化工总厂鼓励工人们，“要努力工作，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晚上，总理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并对大庆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油田建设等问题作了指示。

**5月4日** 周总理参观了大庆油田模型、技术革新新产品和油田建设图表，接着听取了康世恩的油田建设规划的汇报。这天，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外宾，继续在

大庆参观了管道施工工地、井下作业指挥部丰收家属管理站、石油管理局缝补厂等地方。总理在丰收家属管理站察看了田间作业情况，又询问了管理站的组织机构、党组织和所经营的服务性行业等情况。然后到作坊、理发室、卫生所等处参观。同日下午4时，总理陪同外宾离开大庆回到哈尔滨，参观了国营哈尔滨龙江电工厂，并参加了1万多名职工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集会。在参观龙江电工厂时，鼓励他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在技术革新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晚上，总理陪同外宾参加联欢晚会。在联欢会中间休息时，总理接见哈尔滨亚麻厂部分职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厂子，全国只有一个，出口产品质量好坏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总理又嘱咐他们，先抓出口产品生产，狠抓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5月5日上午 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哈尔滨。

## 卢福坦其人

陆友山

有人说，卢福坦当过党的总书记。卢福坦是什么人？他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关于这些情况，迄今为止，尚很少见到介绍。根据我的了解，在这里谈点有关卢福坦的情况。

卢福坦又名李翼、李燕谋、李长有，外号老山东，山东泰安县人。1891年1月出生，文化程度私塾三年。1905年学做生意，1909年在山东宁阳县窑磁村矿山华丰公司学徒，1914年在山东淄川县大荒地的鲁大公司当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任支部书记。不久被鲁大公司裁减失业。1927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8年任山东省委书记。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在这次大会之后不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卢福坦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卢福坦任河北省委书记。不久被敌人逮捕入狱。1930年出狱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同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

政治局委员有的牺牲有的病故等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卢福坦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卢福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卢福坦化名李大有，由河南开封到达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当时尚留在上海的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的也准备从上海撤离。9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为常委，由秦邦宪负总的责任。在酝酿成立临时中央的过程中，卢福坦表示想继向忠发之后当党的总书记<sup>①</sup>。但临时中央决定不设总书记。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在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这些事实都说明，卢福坦并没有当过党的总书记。

1932年9月，卢福坦由于工作中的错误被停止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在全国总工会的会议上作了检查。同年12月，卢福坦在去铁路总工会作检查时，遭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旋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解押至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工总部。卢福坦叛变投敌，向敌人供出党中央书记

---

<sup>①</sup> 向忠发被捕后，中央发的文件中有的称向忠发为总书记，如1931年6月24日发的内部指示中有“本党总书记向忠发”。

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和秘密地址，致使我党干部多人被捕。之后，卢福坦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充任徐州特区行动股长、蚌埠分区区长、上海区情报副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京赣铁路调统室景德镇站站长、南昌区区长、赣州调统室指导员等反动职务，大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带领特务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人惨遭杀害，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1951年5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依法处决。